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87 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

目 录

【专题研究报告】

东南亚华人眼中的中国

——基于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调研的分析

梁茂春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18 期《水果小贩：洛杉矶的街头摊贩、非法行为和族群社区》

Rocio Rosales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19 期《分裂与安全：解释国家对分裂主义者的政策》

Philip Roessler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专题研究报告】

东南亚华人眼中的中国¹

——基于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调研的分析

梁茂春²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章节结构与内容提要

第二章 中国祖籍家乡观念

- 一、问题：东南亚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式微？
- 二、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认同与祖乡认同
- 三、印尼华人对祖先家乡的认识
- 四、泰国华人眼中的祖先故乡
- 五、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问题：海外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 二、泰、马、印尼华人眼中的中华民族
- 三、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与中国人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 四、本章小结

第四章 华人眼中的“中国梦”

- 一、问题：东南亚华人如何回应“中国梦”？
- 二、东南亚华裔学者的观点和回应
- 三、泰、马、印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
- 四、东南亚华裔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
- 五、本章小结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主要结论
- 二、政策建议

图表目录：

- 表 1-1 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华人人口特征
- 表 2-1 2015-2019 年部分马来西亚华人赴中国的寻根活动
- 表 2-3 2015-2019 年部分泰国华人赴中国的寻根活动
- 表 3-1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问卷调查样本分布

¹ 本文为作者 2020 年 8 月提交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项报告，经作者授权由本《通讯》介绍给研究者。

² 作者为暨南大学教授。

- 表 3-2 东南亚留学生在中国期间结交朋友的情况
- 表 3-3 影响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交友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 表 4-1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东南亚分会
- 表 4-2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问卷调查的样本分布
- 表 4-3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差异
- 表 4-4 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
- 图 4-1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的评分比较
- 图 4-2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形象各方面的评分比较
- 图 4-3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与其来源国发展密切关系的领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南亚华人眼中的中国”(15BMZ071)是2015年获得立项的,该项目开展研究至今已近五年,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两年。主要原因是本课题的研究需要首先收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课题组成员到东南亚进行实地调研需要大量的时间。原计划利用大学的学期期间和寒暑假期间赴东南亚调研,但因相关规定对学期期间出国调研有所限制,故海外调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寒暑假进行,从而使得调研时间被迫拉长。在这近五年的寒暑假时间里,我们按照课题研究计划(课题申报书)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三国重点开展了实地调查,并赴美国最大的东南亚研究和文献资料中心之一的康奈尔大学进行资料收集和学术交流活动,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口述资料、文字资料和数据,经整理和分析后撰写了本课题的结项报告。

第一章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海外华人如何看待中国?¹他们对祖国中国及其祖国地有着什么样的认知?他们是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认同?他们对“共筑中国梦”的号召是否积极地回应?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外交事务或软实力建设中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议。本研究课题试图通过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实地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的分析,粗略地展现东南亚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图景,解释他们中的不同部分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或渐行渐近缘由,并通过对调研所获得的经验事实的分析回应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人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的归属感,对其祖国——中国也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因此成为中国可资利用以扩大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与此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们发现许多海外华人已不同程度地融入住在国的主流社会,在参与各自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成为忠诚于住在国的成熟、理智的公民,他们对住在国的国家认同状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已不能与殖民地时代的情况相提并论。

在国内学术界,认为海外华人对中国具有深厚情怀的人不在少数,且这种观点占居主流地位,获得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广大华侨华人虽然身居海外,却永怀一颗中国心,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情感、文化认同和思乡恋土情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一心希望祖国统一、兴旺发达。”海外华人是“增进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积极传播弘扬者和促成中外文明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他们是中国形象的重要表达者与传播塑造者”,

¹ 海外华人一般是指拥有中国血统并已经取得住在国国籍的外国公民;华裔则是指在海外出生并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华人后裔。为了叙述方便,学术界往往将两者统称为华人,并未对之作严格的区分。

也是“向世界解释和宣传中国,发展中外国际民间友好事业,促进国际理解的最好的‘民间大使’”。¹ 海外华人“是中国软实力构建的独特力量,他们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也应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开展民间外交、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的宣传介绍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理解、支持和解释等方面,而机制在于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行为方式和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等发挥作用”。² “东南亚地区华人比其他族裔群体更为积极看待中国;而在华人群体当中,那些从小在家里使用英语的人则要比那些在家里使用汉语的人较少对中国有正面的评价”。³ 上述这些充分肯定海外华人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发挥正面作用的观点,已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

相反的声音主要来自海外和港澳地区的华人,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其中不乏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们认为当今海外华人并不必然具有对中国的深厚情感和向心力,在对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上存在着代际和阶层的差异,不一定能成为中国政治外交事务或软实力建设的支持者。关于华人对中国的情感问题,一位菲律宾华人的话语似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当然还是我们的故乡,但是那是由父兄承继而来‘籍贯的故乡’,而非我们感受中‘童年的故乡’,如果因此我们缺乏一份对中国深切的感情,这应该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在感受上觉得我们的‘家’在菲律宾,因为这是我们‘童年的故乡’,因为我们的父母兄弟都生活在这里。因此,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进步与繁荣。”⁴ 类似这种话语反映了一些海外华人对祖籍国中国的陌生和对住在国的强烈归属感。关于华人对中国的认同问题,王赓武、颜清湟、古鸿廷等著名学者早年就强调:华人并非一个整体,他们有阶级的区别、教育的不同、生于中国或居留地的差异,这些因素将导致不同类型的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存在差异;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不可高估,随着时间、事件、居留地情势、中国政局的变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也有所变化。⁵ 王赓武早年也曾分析过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认同方面存在“三个集团”的差异:甲集团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并总是关注着自己与中国的共同命运,政治色彩最为鲜明;乙集团由精明和讲究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常常给人予不问政治的印象;丙集团,则是一个小而不稳的集团,它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对马来亚的某种忠诚;他们不是静止的集团,甲集团与乙集团、乙集团和丙集团之间的界线往往难以划分。⁶ 在中国利用东南亚华人以提升中国形象和世界影响力的问题上,王赓武并不看好。他指出:“不管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东南亚的华裔都多半与中国无关,也不是可被中国利用的,相反,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是——如果还不是的话——一个相当大的负担。”⁷ 在谈及海外华人如何适应中国号召建设富强国家的新爱国主义时,他表示:海外华人已成为忠诚的当地国民,他们爱的是本国,而不是中国。他们对中华文化从尊敬到不否定,但却不会积极地去支持和维护。如果本国

¹ 陈正良、薛秀霞、何先光:《析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国软实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2009年第6期。

² 陈奕平、范如松:《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³ Zhengxu Wang, Ying Yang, “Is China’s Soft Power Dominating Southeast Asia? View from the Citizens”, *Policy Paper Series* 2008, Issue 44, pp.1-14. *China Policy Institute*, Nott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王正绪等人的观点仅来自于新加坡一国的数据,难以代表东南亚十国华人的看法。

⁴ 周鼎:《童年与故乡》,菲律宾《东方日报》1980年2月26日。

⁵ 李盈慧:《海外华人认同的三种论述:评颜清湟、古鸿廷、王赓武的三部著作》,台湾《东南亚学刊》2004年第1卷第1期。

⁶ 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第159-161页,中国友谊出版社,1987年。

⁷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Region in Relation to Chinese Minoriti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o.1 (1979), p.48.

与中国有冲突，他们可能会尽忠于本国。¹ 对于海外华人怀着报效祖国积极回中国投资的说法，马来西亚华裔出身的学者陈志明也不认同。他认为：“即使在经济事务上，如果中国成功地吸引了富有的海外华人去投资，那也是因为这些华人们像别的非华裔投资者（如韩国人、日本人）一样看到了那儿的商机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中国倾向，也不是基于他们的华人情感。”² 澳门学者王建伟、蔡怡宏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东南亚华人普遍对中国产生疏离感，而中国人“经常以经济优先、功利主义及违反伦理道德操守”的表现导致海外华人的心目中产生了负面的“中国形象”。当这两位学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谈论“中国崛起”的形象时，许多人的反应是：中国强大对海外华人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支持中国？

3

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我们追寻问题答案的兴趣：海外华人是否会基于其中华血统而对祖国中国存在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们如何看待其先辈的中国祖籍地？他们是否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他们如何回应中国大陆对海外华人发出的“共筑中国梦”的呼唤？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外交事务是否具有积极支持的倾向？上述这些认同意识或“中国倾向”是否存在国别、移民世代和社会阶层的差异？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1、主要研究命题

关于东南亚华人的中国认同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过许多争议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分析。因此，本课题不只是一项描述性研究，也是一项解释性研究，力图回应学术界的相关理论讨论。经过文献的梳理与思考，在此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命题以供实证检验：

命题一：东南亚华人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对中华血统、华文文化的认同，但与祖籍国的中国人之间的“泛华人认同”总体上较弱，同时因华人个体的移民世代及其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本国的华人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显著的差异。

提出这一命题的依据是，“泛华人认同”（pan-Chinese identity）其实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泛族群认同”（pan-ethnic identity）现象的一个部分，是海外华人的一种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对华人血统、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但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以中国大陆官方和学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全球华人是一家”，已形成了心向中国的全球华人共同体。另一方则以海外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华人由于经历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受到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已经形成各自不同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各国华人之间所存在的中华文化上的一些相似性，只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上的某些共性，但却不能说明他们存在跨国界的华人族群认同（Wang Gungwu, 1979；陈志明，1999）。为了检验这个命题，我们计划通过寻根意识与寻根行动、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华人认同、与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居民的交往状况、对中国语言的掌握程度和对中国当代文化的认知等多个维度来测量东南亚华人被调查者与祖籍国的中国人之间“泛华人认同”的状况，同时分析华人个体的移民世代及其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与“泛华人认同”各维度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至于本国的华人政策等其它因素对东南亚华人的“泛华人认同”的影响则通过历史分析和其它定性方法进行分析。

关于这一命题，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在祖籍国和先辈祖籍地认同感、“泛华人认同”感

¹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王赓武自选集》第3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² 陈志明著，冯光火译：《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³ 王建伟、蔡怡宏：“华人与东南亚国家对华形象——以新马为例”，载于《和谐与共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63页，广州，2012年3月。

方面，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人存在着移民世代差异、华人性强弱差异、社会阶层差异。举例而言，移民世代越晚近（如第三代比第二代晚近）、华人性越弱、职业地位越低，对祖国和先辈祖籍地认同感、对中华血统（或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越低。

命题二：东南亚华人参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建设的意愿与行为因华人个体的移民世代及其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本国的华人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显著的差异。

为了检验这一命题，我们借助了相关的理论观点。一些学者将移民群体对祖国政治、社会等重要事务的关注与参与视作“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现象。安德森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大规模跨国人口迁移在发达的远距离交通、通讯条件下衍生的一种新型的现象，是富裕的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产物，主要指向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因流亡、移民等原因离开这些国家的人群尽管已经定居于其他国家甚至已经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却依然认同自己的祖国或祖籍地，并积极发动或参与祖国或祖籍地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¹以研究“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而著称的学者席勒（Schiller）则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是一种认同态度与实践，是一种“政治跨国主义”，它将不同地点的人们联结到一个他们视为祖籍地的特定领土上。远距离民族主义者为了这个祖籍地而采取的活动将包括参与祖国的选举、在异国举行指向祖国或祖籍地的示威游行、游说、捐款、艺术品创造、战斗、杀戮和死亡等。²亨廷顿也发现，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国内少数民族也变成了跨国的移民社群，其祖籍国政府把他们视作自己国人的延伸，视作可加以利用的资产。移民社群与祖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合作，成了当今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³如果根据上述观点将远距离民族主义界定为移民对祖国政治、社会活动的关注与参与，那么无疑，在东南亚各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初始阶段，华侨华人指向中国的远距离民族主义现象是存在的，而且直至今天，这一现象似乎依然存在。本课题试图通过调查研究了解这种现象的表现方式与影响。

相应地，关于这一命题，我们提出的基本研究假设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关注和参与中国的政治外交事务的积极性等方面，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人存在着移民世代差异、华人性强弱差异、社会阶层差异。⁴

2、研究对象的界定

为了检验上述命题和假设，我们需要首先确定研究对象。尽管“东南亚华人”这个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似乎都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调查总体应该是东南亚各国所有具有中华血统的住在国公民的人，但在实际调研的设计和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在这个核心概念的操作性界定上遇到了困难。

何为华人？按国内学术界的定义，华人是指具有中华血统的、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人。这一定义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东南亚华人的构成比较多元，既有百分之百中华血统的华人，也有与当地混血的华人后裔，还有完全不具有中华血统但认同为华人的人。后一种情况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却值得特别说明，因为本研究涉及了印尼著名的华裔熊德龙。他完全不具有中华血统，但却强烈认同华人身份，并已经成为印尼华人社团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⁵。因此，在本研究中，

¹ Benedict Anderson, 1992.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The Wertheim Lecture, Amsterdam: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² Nina Glick Schiller,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in Carol R. Ember, Melvin Ember and Ian A. Skoggard edited, 2005.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Springer Publishing, p570.

³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70-17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⁴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上述命题和假设，其目的在于指导我们开展具体的调研工作。实际上，在对东南亚各国开展实地调研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命题和假设。

⁵ 庄国土对华人的定义是“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个定义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但显然也将印尼华

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操作化界定是：具有纯粹/部分中华血统或不具有中华血统但强烈认同华人身份并已取得东南亚住在国国籍的人。

我们在东南亚十国中选取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华人政策、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华人政策上印尼偏消极，马来西亚处于中性而泰国则较积极；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程度上，这三个国家则分别大致处于低、中、高的水平。我们认为上述三个国家的华人发展状况可以作为东南亚华人的三种不同类型，便于比较分析他们在对中国认同上的异同。

那么这三个国家的华人口总体数量如何？鉴于除了马来西亚有官方的华人口统计数据外，泰国、印尼两个国家均无官方的华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大致的推测（参见表 1-1）。

表 1-1 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华人口特征

	华人口	占该国总人口	华语使用状况	中文姓名使用情况
马来西亚	745 万（2019 官方统计数）	23%	几乎所有人都能使用	所有华人均同时使用中文、马来文姓名
印尼	1050 万（2019 推测数）	4%	少数能使用（一般为 60 岁以上的华人）	大多数人主要使用印尼姓名
泰国	678 万（2019 推测数）	9.81%	111,866 人在家里使用华语（2010 年泰国统计局），主要是老一代华人	大多数人主要使用泰国姓名

注：表中数据可参见正文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和文献引注；表中的“华语使用状况”以及“中文姓名使用情况”的文字描述为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和调研结果作出的粗略概括。

目前印尼官方并无华人口口的统计数据。Mary Somers Heidhues 在《海外华人百科全书——印度尼西亚篇》中指出，1998 年印尼华人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 2.5%~3.0%，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的规律并以 1.38% 的年增长率为计，到 2004 年华人口总数为 746.3 万人。¹ 若同样以 1.38% 的年增长率计算，则到 2019 年，印尼华人的口大致已达到 1051.3 万人。华人约占印尼总人口的 4%。²

同样由于无官方一致性记录的统计数据，泰国华人口数，若同样根据斯金纳在《泰国华人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一书中关于华人占泰国人口的 9.81% 计算，2019 年泰国总人口数为 6918.3 万人，华人为 678.7 万人。据泰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 年仅有 111,866 名华人在家里使用华语，约占全国华人总人口的 1.73%。³ 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因为在家里说华语是衡量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表明绝大多数泰国华人已普遍被泰国文化所同化并已缺乏中华文化认同的语言基础。

马来西亚官方的人口统计中一直都有族裔分类数据，因此数据比较一致。2019 年马来西亚总人口为 3240 万人，华人为 745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3%。

3、调研方法

以往国内学术界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华人调研和资料收集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走访当地的华社、唐人街，二是浏览当地的华文报刊资料。但这两种调研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华侨华

商熊德龙排除在华人之外了。

¹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各国华人口口专辑》（第二辑），第 97-98 页，2005 年版。

² 廖建裕并不赞同这样的统计方法，他认为应根据印尼官方的相关数据来推算。他认为整个印尼的华人总数就是 1,832,656（官方在印尼 11 个省的统计数）+ 636,082（对印尼官方未统计的 19 个省的数）= 2,468,738 人，即大约 247 万人，约占印尼总人口的 1.23%。参见廖建裕：“印尼华人的口数到底是多少？”，印尼《国际日报》2019 年 8 月 8 日 A7 版。

³ 参见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ailand: “Table 7 Population by usual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sex and area”, 泰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eb.nso.go.th/en/census/poph/data/090913_StatisticalTables_10.pdf.

人社团、唐人街的情况以及华文报刊资料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华人的情况，在有些国家甚至很可能只是少数或极少数华人的情况。例如，在印尼、泰国的有些城市或地区，大量的甚至是多数的华人并不参与华社的活动，与华社缺乏联系；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只是该国华人的少数或极少数；阅读华文报刊的华人在该国华人总体中同样也只是少数或极少数。通过这些渠道开展的调查以及资料收集的工作所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在较大程度上只反映一部分华人乃至极少数华人的情况，很可能与该国或该地区华人的总体情况相距甚远。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调研方法或渠道（也即判断抽样或立意抽样方法）难以反映当地华人总体情况的缺陷，我们认为应该在上述判断抽样的基础上采取新的方法途径，有意识地选取那些远离华社、不居住在唐人街、不会中文的华人（这些华人往往占当地华族的大多数）开展调研。因此，在印尼和泰国等国的若干华人聚居城市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与以往大多数调研不一样的做法，通过聘请当地翻译人员，访谈了一些不能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华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传统调研方法的不足。

鉴于华裔新生代是东南亚华人未来的主体，我们还对一份较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总样本为1189个，其中华裔学生514个）和70位留学生的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在中国留学的东南亚华裔学生是否因自己的中华血统而对当代中国形象有较高的评价，是否也同样因为其中华血统而与中国人产生亲近感和共同体意识。

三、章节结构与内容提要

本报告以上述研究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并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导言，解释本项目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命题、相关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方法，并说明对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三国进行调研的步骤与方法。

第二章主要描述和分析东南亚（主要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并重点解释：这些国家的华人心目中的故乡、家乡或祖籍地究竟是指向中国还是指向住在国；他们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是否已弱化；不同移民世代的华人或华裔在这些观念上存在怎样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三个国家多数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式微，对中国祖籍家乡有较强烈认同的主要是老一代（第一、第二代）华人以及其他移民世代的部分高龄者，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寻根意识并积极来到中国寻根问祖。而新生代华裔则多数已视住在国的出生地为故乡、家乡，其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十分淡薄。因此，我们认为，随着老一代华人的逐渐消失、从中国迁入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增量的缩小及所占比例极低，这几个国家大多数华人的祖籍家乡观念日益本土化并与祖籍国中国及其祖籍地渐行渐远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华文教育的复兴、“再华化”现象的兴起以及中国有关部门大力开展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及其他致力于拉近新生代华裔与祖籍国距离的活动，已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第三章首先介绍学术界关于“海外华人是否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争议，然后根据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描述和分析东南亚华人是否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探讨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其中涉及华人社团精英、普通华裔民众在认知和态度上的差异；最后根据问卷数据分析东南亚华裔学生是否因自己的中华血统而与中国公民产生亲近感和共同体意识。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学者多数将“中华民族”界定为中国的政治民族，仅包括中国公民在内，因此不赞同将海外华人视作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认为他们已经成为住在国民族的一部分；而马来西亚等某些国家的华人社团精英则将“中华民族”视为种族文化共同体，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因此他们自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并为此感到骄傲；东南亚的普通华裔民众多数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认知模糊，并对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缺乏兴趣；问卷数据分析结果则表明，东南亚华裔学生与中国学生（或公民）之间普遍缺乏亲近感和“同胞”认同，但却与

来自于本国的其他种族学生存在很强的共同体意识。

第四章主要描述和分析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以及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评价。首先我们描述和分析了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深具影响的几位东南亚华裔学者对“中国梦”的观点和回应。这些学者对中国向海外华人发出“共筑中国梦”的呼吁持有负面或消极的评价，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些华裔学者则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更多的只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政治方面的回应是有限的。

而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华人社团精英则积极地回应“中国梦”。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相关言论、开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以及支持“一带一路”的活动是他们回应“中国梦”的具体行动。不过，印尼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团精英则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言论或行动上回应“中国梦”易于触及政治敏感地带。

这三个国家普通华裔受访者大多对中国当前的发展动态缺乏兴趣，较少与中国社会产生互动，因此对“中国梦”缺乏了解或态度相对淡漠。“中国梦”给世人描绘了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国家形象），那么崛起后的当代中国给东南亚华人留下了怎样的形象？问卷数据结果表明，在中国留学的东南亚华裔学生对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等方面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中国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软实力的评价却明显低于对美国和日本相应指标的评价，甚至比其对住在国的评价还低。

第五章主要概述我们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政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我们认为，东南亚华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已经历了身份认同的根本性转变，他们积极地参与住在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并成为了合格和忠诚的国民。除了少数华人社团精英和老一代华人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新生代华裔，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显著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缺乏认同感，对“共筑中国梦”的呼吁态度比较淡漠，总之，他们已与中国渐行渐远。我们应理性地看待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并根据这些现实的变化和趋势对相关的侨务政策和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二章 中国祖籍家乡观念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实地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来展现东南亚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或“根祖认同”及其代际差异状况。

一、问题：东南亚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式微？

关于“中国是海外华人魂牵梦萦的故乡”的类似说法，主要出现在中国大陆部分学者、主流媒体和官员的言论中，他们一致认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在情感上认同中国。但这种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看法并没有获得东南亚当地华人和华裔学者的普遍认可。

那么，在东南亚不同的国家里这些认同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世代和具有不同“华人性”的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存在怎样的差异？由于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我们从调研伊始便带着这些疑问对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国的华人展开访谈，在对所有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后，我们将这些国家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认同归纳总结如下。

并非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像第一代移民那样视中国、先辈祖籍地为故乡或家乡。第一代移民往往不易摆脱对中国和家乡的思念，他们当初下南洋主要是出于生计的需要，开始只是打算暂居南洋，并准备告老还乡、叶落归根。受其先辈影响的一部分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对作为祖籍国的中国和作为先辈祖籍地的家乡的思念。就华人移民总体而言，随着移民世代的递进，也就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以后的华裔，他们对中国的故乡认同感开始呈现出逐级下降

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即便在“再华化”的影响下也难以逆转。因此，在故乡认同上，华人的代际差异十分明显。由于第一代移民人数日渐减少，他们的后裔人数（也就是第二代以后的华裔）占居绝大多数，从总体上而言，多数东南亚华人已经视住在国为祖国，视出生地或居住地为故乡和家乡。“中国是海外华人魂牵梦萦的故乡”这样的表述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东南亚华人。

总之，第一代华人的故乡认同普遍指向中国，随着移民世代的递进，指向所住国的故乡认同越来越强，甚至完全指向所住国；指向中国的故乡认同则越来越弱，乃至在许多新生代华裔中消失。在此，我们仅通过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田野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对上述的观点给予论证和解释。

二、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认同与祖乡认同

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观念，有一些概念是需要首先说明的。视中国为故乡或家乡的，往往是第一代华人，而华裔则较少有这样的观念，他们普遍视马来西亚为自己的故乡和家乡，而将中国和中国的先辈祖籍地称为“祖乡”，意为“爷爷的家乡”或“太祖的家乡”。根据有限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主要通过华人社团、华裔家族与家庭的认同教育和赴中国寻根活动这两个方面，描述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认同与祖乡认同的状况和特点。

1、老一代华人、高龄华裔有较为强烈的指向中国的故乡认同

在这里，“老一代”指的是第一和第二代华人移民，而“高龄”则主要是指第三代以后的60岁以上的华人群体，他们可能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甚至更晚世代的华裔。这两个群体对中国、先辈的祖籍地以及血缘宗亲都有较为强烈的归属感，相对而言，老一代华人比第三代以后的老龄华裔对中国故乡的归属感更强，而后者对中国故乡的认同大多是受前者的影响。

老一代华人对祖籍国中国及其祖籍地的强烈故乡观念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返乡寻根活动；二是他们时常通过对家族历史和自身移民经历的讲述，给下一代灌输思乡、爱乡的观念；三是老一代华人一直致力于将故乡观念的教育与传承加以制度化（如族谱的修订、地缘和血缘社团的建立以及开展定期的活动等），以期将“思乡”与“爱乡”的传统传承下去。他们不仅创建了大量的、以中国的先辈祖籍地认同为基础的华人社团，例如以中国的省市县乡命名的地域性社团组织——会馆、同乡会等，而且还创建了以姓氏认同为基础的、血缘性华人社团，例如李氏宗亲会、黄氏宗亲会等。这两类社团都旨在维系华人及其后裔对中国的先辈祖籍地和宗族的认同。由于宗族的源头在中国，宗亲网络与中国先辈祖籍地又密切相关，因此这种宗族认同也与故乡认同高度重合。

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马关系的中断，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也一度中断，与此同时，大多数华侨因加入马来西亚国籍而产生了身份的转变。尽管他们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联系，但这些地方并不属于绝大多数老一代华人的祖籍地，因此他们的故乡认同指向的依然是中国大陆。在中马关系恢复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这种故乡认同往往表现为赴中国大陆寻根的行动。一位祖籍福建古田的同乡会会长陈光良在年迈之际带领同乡返回古田寻根问祖。他说：

我有固执的时候，我坚持乡团的功能或宗旨就是团结同乡，凝聚力量，传承祖籍的“根”，把古田人先贤的历史，一代接一代传下去，让每名古田子弟都知道自己的先辈从哪里来，如何开创事业、如何开枝散叶的把古田人的“种子”，播向世界各个角落。我已老迈，肯定要退下来，因此我期盼接班的会长及团队一定要坚守使命，让会馆永远成为古田人传根的平台，让每名古田子弟都成为延续古田香火的火种传递者。¹

1980年代之后，人数已经非常稀少的马来西亚老一代华人对寻根最为积极。一位目前生活

¹ 陈世传：“福州古田人·传根使者”，《星洲日报》2019年6月22日。

在马来西亚檳城的 65 岁老华人自述自己虽然是第二代华人移民，但仍心念中国，几乎每年都要回到中国寻根。他说：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生活好，因为我们住了几十年了，所以习惯了，一回到中国就不习惯了。但是，我和家人每年清明节都会回去中国大陆，只是今年有事没有回。一般是回到琼海，那是我的家乡，回去寻根。我是第二代，是我爸爸妈妈先移民过来的。虽然我是马来西亚华人，但心还是在中国。¹

由于老一代华人人口的不断消失，近年来赴中国大陆寻根的队伍中极少有他们的踪迹。不少人生前念兹在兹却无法圆满的寻根之梦，是由其子孙后代替自己“实现”的²。

除了老一代华人之外，高龄华裔在寻根队伍中是最为热情高涨的一群人。几十年来，这个群体赴中国大陆寻根问祖的消息频现于报端³。相对而言，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赴中国大陆的寻根活动大多由中国政府或中国的各级政府财政资助，而他们的寻根活动却基本属于自发、自费，其寻根愿望之强烈可见一斑。根据我们以“马来西亚华人寻根”的关键词对百度网站进行搜索，在 2015-2019 年这五年间，马来西亚华人赴中国大陆寻根活动的共 46 次，而主要由高龄华裔群体自发、自费组织的寻根之旅活动就多达 26 次，占比达到一半以上（见表 2-1）。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自发、自费的寻根之旅活动次数占马来西亚华人的全部寻根之旅活动次数的比例之高，远远超过印尼、泰国华人在同期开展的寻根之旅活动（参见表 2-2、表 2-3）。

表 2-1 2015-2019 年部分马来西亚华人赴中国的寻根活动

年份	活动内容	主办、承办方
2015.1	马中福州十邑万里寻根团 49 位成员赴福建古田寻根问祖。	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
2015.4	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 22 名成员在广东梅州开展寻根之旅访问，期间部分访问团成员回到各自的祖籍地开展祭祖活动。	自理
2015.6	来自马来西亚的 30 多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枣庄营以“汉语·中华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山东枣庄侨办承办
2015.9	来自马来西亚怡保深斋中学、深斋商学院的 49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在著名侨乡福建省龙岩市举行的“中国寻根之旅”秋令营永定客家文化营。	国侨办、福建省侨办、龙岩市外侨办、龙岩市永定区外侨办联合永定区政府举办
2015.12	第二代华人、72 岁的马来西亚美里书艺学会会长陈乃豪先生带领十多位马来西亚美里书艺学会的学员们在铜陵镇寻根。	自理
2015.12	马来西亚华裔蔡松柏（68 岁）率兄弟姐妹三人及家族成员一行共 13 人回祖籍地福建晋江石东埕村谒祖。	自理
2015.12	马来西亚 32 名华裔师生参加在西安市举行的“中华经典文化寻根	陕西世钰嘉华文化传播公

¹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檳城市。

² 例如，马来西亚华裔第三代、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寰宇电视记者兼主播庄文称，他于 2019 年把爷爷带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泉港山腰街道锦山村。（参见谢育极：“一条寻根路，三代血脉情”，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16331996_695459）同是第三代华裔、马来西亚流行乐歌手、影视演员关德辉在微博道出，爷爷在上个世纪从为了生活从中国福建兴化（现莆田）到马来西亚，最后落地生根娶了当地娘惹，生下关爸爸，他未料自己竟然有机缘因为一部电影，回到了爷爷的家乡，“身为第三代大马华裔的我，居然在近百年后因一部院线电影，回到了爷爷家乡，真是太奇妙了！”。（参见黄佩娟：“关德辉《妈祖回家》·返爷爷家乡认祖归宗”《星洲日报》2018 年 10 月 7 日）类似的由华裔后代圆满先辈的中国故乡梦的例子并不少见。

³ 许多马来西亚政坛的华裔都曾到中国寻根问祖。例如，曾担任马华公会总会长的原籍客家大埔的拿督斯里廖中莱计划带同父亲访问广东省大埔，以尽孝心，实现父子寻根之旅。他在出任副部长时就已经想要到中国大埔一行，惟公务繁忙至出任部长，都还未有出访的机会。大马客联会前总会长丹斯里吴德芳不断告诉他必须回去寻根，而这次他也将安排时间，带同父亲与吴德芳一起寻根。（参见“计划带父亲访大埔，廖中莱想到中国寻根”，《星洲日报》2010 年 8 月 21 日）马来西亚华裔政界人士赴中国寻根问祖的例子不少，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陈述。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政坛华裔赴中国寻根问祖的现象似乎也比泰国和印尼更多一些，或许是因为相对于印尼，马来西亚政坛华裔对中国表示亲近并不会引起当地人的敏感反应；而由于绝大多数泰国华裔已丧失中文交流能力，故赴中国寻根问祖的政坛人物就比较少。

	之旅”国际华裔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与西安市庆安高级中学师生交流，探讨中国文化。	司、世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庆安高中、吉隆坡中华国中联合举办
2016.5	由 20 多名马来西亚侨胞组成的寻根团，在广肇会馆组织下来到“全国三大著名寻根地”之一的南雄市珠玑古巷寻根祭祖。	自理
2016.5	马来西亚 40 余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在韶关举行的“中国寻根之旅”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开启为期 10 天的文化寻根活动。	广东省侨务办、市外事侨务局共同主办
2016.6	受父母之托，45 岁的黄胤喜踏上了返乡（福建南安）寻亲之旅。	自理
2016.6	来自马来西亚的 80 名华裔青少年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展开为期 15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华乐春令营。	国侨办主办、 湖北省外事侨务办承办
2016.10	马来西亚美里廉律中学的 18 名学生、福建屏南县华侨中学 18 名学生在侨乡屏南县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 福建省侨联承办
2016.11	马来西亚华人罗官和率自己的 2 子 2 女、儿媳、女婿、外孙女等 9 人，首次踏上了回国寻根问祖之路。	自理
2016.11	68 名马来西亚参加在福建福清市举办的“玉融情·连根脉”冬令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 福建省侨联承办
2016.12	来自马来西亚的 69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在江西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开展为期 10 天的走进江西活动。	国侨办主办、 江西省外事侨务办承办
2016.12	戴祖亿与太太前往福建古田寻找祖父母家乡。	自理
2017.6	来自马来西亚新山市的林金亮家族 22 人到广东潮汕寻亲。	自理
2017.6	被誉为马来西亚“狮王”的舞狮界名师萧斐弘到鹤山市寻根，探寻冯庚长狮艺的源流和发展。	自理
2017.9	马来西亚华人后裔黄珺宸一家，在福建南安众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祖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成功认祖归宗。	自理
2017.11	马来西亚南阳叶氏宗亲总会会长叶国文的带领下，马来西亚一行 38 人莅临叶县寻根祭祖。	自理
2017.12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的 30 名华裔青少年在著名侨校——仙游县华侨中学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走进仙游侨中联谊活动”。	国侨办主办， 福建省莆田市外侨办承办
2018.4	马来西亚巴生市音乐协会、乐天联谊会的 20 位华侨老人（在大马称乐龄人），回到祖籍地泉州丰泽区源淮社区和云谷小区寻根。	自理
2018.5	马来西亚华裔九姐弟结伴寻根，制马来西亚版族谱。	自理
2018.6	谢承浩与其父亲 80 高龄的谢丕添一行七人到海沧石塘寻根谒祖。	自理
2018.9	马来西亚第四代华裔郑兆聪赴福建永春石鼓镇浣江村谒祖。	自理
2018.11	柔佛州新山 55 岁华人张星发，在其外甥女婿的陪同下第二次返乡（福建集美）省亲谒祖。	自理
2018.11	马来西亚的 135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在德州学院举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开启了为期 13 天的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 山东侨联承办
2019.1	马来西亚 33 名闽籍华裔青少年参加了在福建省晋江市举行的为期十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 福建晋江市侨办承办
2019.3	马来西亚刘氏总会总会会长拿督刘国泉先生率各属会一行赴徐州，开启“彭祖故国·高祖故里”中国徐州文化寻根·经贸交流之旅。	自理
2019.4	马来西亚砂拉越宁德公会寻根访问团一行 53 人，赴福建宁德市蕉城区等地参观考察，开展交流活动。	自理
2019.4	马来西亚华侨李权威、李权丰、李权隆三兄弟回祖籍国寻根。	自理
2019.5	马来西亚华裔第三代、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寰宇电视记者兼主播庄文杰，带爷爷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泉港山腰街道锦山村。	自理
2019.5	来自马来西亚的 45 名华裔青少年及 4 位老师参加了为期十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马鞍山营。	中国侨联主办， 安徽省侨联等承办。
2019.7	马来西亚的 24 名华裔青少年学生参加了为期十天的“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夏令营广东肇庆营。	中国侨联主办，广东省侨联、肇庆侨联等承办。
2019.7	马来西亚 20 位华裔青少年、教师参加为期九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甘肃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甘肃省侨联承办、甘肃芝诺研学协办
2019.8	马来西亚 30 多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广西玉林营。	中国侨联主办， 广西玉林市侨联承办

2019.8	今年 50 多岁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人池源瑞先生携妻女踏上故乡厦门，第四次漂洋过海来寻根终于如愿。	自理
2019.8	曼绒古田会馆青年团策划及举办的“中国古田寻根团”，成功协助 10 多名首次回到位于中国古田先祖祖籍村寻根的第三代至第五代的马来西亚古田后代，找回他们失联百余年的亲人。	马来西亚曼绒古田会馆青年团主办
2019.9	马来西亚华人黄素梅带着 87 岁的父亲黄观九及两个弟弟一行 6 人回到了阔别一百多年的祖籍增城小楼镇沙岗村乌石田寻根。	自理
2019.9	马来西亚华裔华侨柔佛洲侯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侯健文夫妇来到中华侯氏总祠（湖南安仁）寻根问祖，祭拜先祖。	自理
2019.11	18 位马来西亚华人来到福建南安洪濑镇葵星村寻根谒祖，感叹：“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故乡！”	自理
2019.12	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冬令营福建泉州丰泽营在黎明职业大学黎明报告厅举行开营。	国务院侨办主办， 泉州市侨办承办
2019.12	40 名马来西亚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海南海口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海南省委统战部、海南省侨联承办
2019.12	马来西亚民都鲁开智中学的 33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领队参加了为期 12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福建屏南营的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 福建屏南侨联承办
2019.12	马来西亚 30 多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冬令营在蕉岭开展的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 广东省侨联等承办。

注：本表信息资料主要来自以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寻根”对百度网站和马来西亚“星洲网”进行搜索，涉及中国侨网、中国新闻网和马来西亚中文报纸《星洲日报》等多家媒体，其中，国务院侨办主办的“中国寻根之旅”活动的信息仅限于完全由马来西亚华裔参与的活动，不包括多国华裔参与的活动。因有些马来西亚华人到祖籍国寻根的信息并不一定可以通过上述途径搜索到，因此难免有一些未被媒体报道的寻根活动未纳入本表。

与上述老一代华人和高龄华裔相比，华裔青少年对中国和祖籍地的认同感普遍较低。他们属于第三代及以后世代的华裔，有人称之为“华裔新生代”¹。这个群体普遍已将马来西亚称为故乡或家乡，而将中国以及祖先的中国居住地称为“祖乡”。华裔新生代青少年往往缺乏对中国祖籍地的原生性情感，他们的祖乡认同是需要“培育”的，家庭、家族首先承担了这种培育的角色。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华人社团在马来西亚本土开展相关活动也是“培育”华裔新生代青少年祖乡认同的主要途径。许多华裔新生代通过本地组织开展的活动来了解祖乡的情况。例如 2019 年，中文报纸《卫理报》在婆罗洲文化节期间，在诗巫举办了“寻根问祖——我的祖乡在哪儿？”活动，现场透过地图、故事及游戏讲述祖乡的故事。²

另一个增强华裔新生代青少年祖乡认同的途径则是赴中国寻根。马来西亚华社团体自主组织华裔赴中国大陆的寻根之旅活动，时间一般在每年的清明节和其他中华传统节日，活动内容有到祖籍地寻根，同时也有旅游活动³。一些地方华人社团非常活跃，在华裔青少年对祖乡认同的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曼绒县的古田华社就是一个典型。对于曼绒县的古田人而言，返回中国清明扫墓有两层意义，一是履行慎终追远及追忆先辈的文化习俗，二是带着儿孙们返回祖先的“家乡”认祖归宗，传承族群的薪火。根据星洲日报《大霹雳》社区报的非正式统计，在近 5 年才掀起的返回中国扫墓热潮，每年三月份，即清明节前夕，来自曼绒县返回中国清明扫墓的

¹ 按此界定，本报告中上述的“高龄华裔”也是华裔新生代，属于其中的老年群体。

² 星洲日报记者：“卫理报寻根活动·地图游戏讲祖乡故事”，《星洲日报》2019 年 7 月 19 日。

³ 一些华人社团将组织华人赴中国寻根作为自己的职责之一。例如 2019 年，马来西亚曼绒三山同乡会制订了当年的社团任务为：组织“寻根团”到中国福州寻根，加强本地年轻同乡对祖籍地的认识与认同，促进与中国的联系、乡谊及商业合作等。星洲日报记者：“江作汉：确保持续发展·乡团需年轻人注入活力”，《星洲日报》2019 年 10 月 12 日。森美兰泮江会馆经常办回乡拜祭祖先及旅游团，这是会馆的常年活动之一。近十年来，泮江会馆在会员要求下，隔三差五的，都有举办回乡旅游。一位华人邓天来说：“我已是第六次回去了。还有两三次我没参与”。（参见邓天来：“寻根祭祖游记（一）”，《星洲日报》2017 年 5 月 18 日）槟城市槟榔屿开平会馆为会员主办类似的旅行团，再呼朋唤友搭顺风车，一起了解华人的根和来时路，是很意义的活动。（参见“不忘祖先来时路！槟城开平人赴中国探亲寻根”，《星洲日报》2014 年 12 月 27 日）。

古田人不少，超过 200 人。¹ 一位华人记者感叹道：

60 年代被形容“连一只蚊子也妄想飞入境”的中国大陆，80 年代起可在“特殊情况”下到中国家乡探亲，到了今天，我国华人到中国探亲寻根已成风气，一些会馆甚至把回乡寻根列为常年活动，世事变幻可见一斑。²

2015-2019 年间，先后有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嘉属会馆联合会、广肇会馆、南阳叶氏宗亲总会、巴生市音乐协会和乐天联谊会、刘氏总会总会、砂拉越宁德公会、曼绒古田会馆青年团等多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华人寻根访问团赴中国大陆寻根问祖（详情参见表 2-1）。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对开展寻根之旅活动的积极意义表示肯定，认为：

我国有许多地缘性的会馆组织，这些组织都会举办返乡团，让后辈有机会回到中国故乡看看。但在我国，返乡寻根像是老一辈人才会做的事，年轻人对故乡没有太多的情感。以前我对祖籍地的印象只停留在一个地名，如今却多了一份故乡情。如果年轻一代的后辈我们不返乡与故乡的亲人联系，往后或许就会断层，甚至断根。³

自 1999 年中国国务院侨办开启“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后来还有冬令营）活动后，中国政府也开始扮演这个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政府在资金和组织上的大力支持，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海外华裔新生代每年得以来到中国寻根问祖。相对而言，中国政府资助和组织的华人寻根之旅活动，其人数、规模都远超华人的自发、自费的寻根活动。

旨在鼓励世界各地的华裔青少年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中国寻根之旅”系列活动作为侨务部门和侨联组织开展华文教育工作的品牌活动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华裔青少年来中国寻根的热潮。表 2-1 是我们根据百度网站的新闻信息整理的 2015—2019 年马来西亚华人赴中国大陆寻根活动的情况，其中华裔新生代的寻根活动约占一半，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和资助的。

这些寻根之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华裔青少年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祖籍国和祖籍地是有一定作用的。一位参与过寻根之旅活动的华裔女中学生写道：

说起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活动，是因为代表母校吉隆坡坤成独立中学，参与 2018 年第四十届全国独中华国英三语演讲比赛并荣获初中组全场总冠军，获得柔校友联奖励全免参与 2018 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活动。

启程前，我怀着满腹疑问，究竟冬令营是一项什么活动？什么是寻根？

至今，我还是忘不了刚抵达中国福建省的那种新奇的感觉，置身在那一片土地上，却有一种说也说不清的熟悉感，因为那里的同胞与我们有著共同的肤色、语言、文化，大家身上流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各位，不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作为华人，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的就是自己的根、母语和祖籍国。长大以后才能在各个领域合作起来，凝聚我们海外华人的精神，为世界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⁴

尽管“中国寻根之旅”活动每年都持续地开展，其人数规模比较庞大，但华裔新生代对中国和祖籍地的认同是否因此而得到实质上的提升？这需要以后逐渐去验证。毕竟这些寻根之旅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华裔青少年参加这类活动也有所谓的“免费旅游”这一因素的影响，而且能够有机会参加活动的只是极少数。对于寻根之旅活动带来的效果，一些马来西亚华人认为：“很多我国青少年虽然知道自己祖籍来自中国，但是慢慢对于中国这个祖籍地失去了感觉，因此一些青少

¹ 实兆远：“古田人携老带幼认祖归宗，清明回乡扫墓寻根”，《星洲日报》2017 年 3 月 28 日。

² 星洲日报记者：“马口乡贤沿续长辈情缘，回中国探亲真情流露”，《星洲日报》2014 年 12 月 27 日。

³ 庄舜婷：“返乡寻根”，《星洲日报》2017 年 11 月 15 日。

⁴ 吴嘉雯：“寻根”，《星洲日报》2019 年 7 月 19 日。

年对于这些活动都兴趣不大。”¹

2、新生代华裔不同程度缺乏对祖国和先辈祖籍地的认同感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正处在国民身份认同的转型时期，许多华侨纷纷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籍，成为该国的公民。从此华侨的身份转变为华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对故乡、家乡的认同开始慢慢地发生转变，尤其是华裔新生代对中国和先辈祖籍地的情感也开始渐渐地淡化。中马关系恢复之后，许多华社会团体纷纷开始组织各种形式的“探亲团”、“寻根团”，也常常选择在每年的清明节期间主办回乡祭祖的寻根之旅，并获得团体内部成员不同程度的响应。老一代和高龄华裔确实对故乡有着深切的怀念和强烈的寻根愿望，但许多新生代华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之视为一般性的旅游活动，其故乡、家乡认同实际上已指向马来西亚而非中国。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主流媒体中，甚至有人告诫马来西亚华人：不要忘记马来西亚是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一位华裔作家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华人只重视华族文化而忘却了作为祖国故乡的马来西亚：

是祖国不爱你，还是你本身不爱你自己，行使你的公民权力。若心存民族却全无爱国意识，那能怪他人不把你当公民看待。认为移民并没失根者，指出移居异乡的华族居民依然热爱母语（每星期一次送去接受母语教育），还是发扬中华文化（经常举办大规模的中华文化文娱演出），显然他们仅重视民族的根，而忘却了祖国故乡的根！²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祖国故乡”，指的正是马来西亚。这位华裔作家公开地在该国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星洲日报》上宣称马来西亚是华人的祖国、故乡和根，表明这样一种祖国故乡认同观念很可能已经在相当一部分华人当中获得认可。此文发表后也没有出现反驳的言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这种指向马来西亚而非指向中国的故乡认同，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似乎越来越强化了。近年来，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甚至已不能接受“中国是海外华人的娘家”的说法。201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六周年国庆招待会上，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发表讲话，他说道：“我再次重申，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侨，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³令中国大陆官方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句话引发了当地华人的不满，华文报纸在半月内刊登了数篇华人的异议文章，其中一篇文章便以“我家是马国，不是中国”为题，力图纠正黄大使的“娘家”说法⁴。另一篇文章则写道：

平心而论，许多华人至今都不曾踏入中国半步，对寻根也没太大兴趣……大马华人只有一个家，这家就在马来西亚。如果有天我再去中国也还是一样带着旅者的心情出游，而不是回娘家。

⁵

上一代人拎着行囊，漂洋过海落户南洋，行囊中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也装载着打拼的梦想，而筑梦的代价是把根从原生地硬生生的拔离。从此家乡是记忆中遥远的原乡，想家时，一张照片，一口家乡的食物，抚慰思乡的味蕾。而这一代，对祖辈的原乡，有的只是看似熟悉，其实陌生的疏离感。……打从心里，我们都深深认定多元和包容是这片土地的特色。跨出国门，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异地，大口吃着砂拉越辣沙，豪迈地吃起串串的沙爹，得到舌尖上的满足，心里清楚明白，

¹ 星洲日报记者：“福建寻根之旅冬令营·马口2女生膺最佳营员”，《星洲日报》2020年2月12日。

² 陈友信：“扎根与寻梦：祖国，祖国不爱我”，《星洲日报》，1988年10月3日。

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在2015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致辞”，环球网，<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QkVS>。

⁴ 郑钦亮：“我的家是马国不是中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5年10月4日。

⁵ 苏德洲：“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5年10月9日。

这份满足是来自于对家乡味的牵挂。¹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上文中的“家乡”、“家乡味”都归属于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作者认为：“大马华人只有一个家，这家就在马来西亚”，若将来有一天去中国，也只是当作到异地旅游。作者表示对“祖辈的原乡”也就是中国已经产生“陌生的疏离感”，那是因为许多马来西亚华裔已经是第四代或以后世代的移民后裔，他们的祖父甚至更早的先辈就已经扎根在马来西亚。我们在马来西亚遇到许多华裔，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说从未到过中国大陆的祖籍地寻根，有许多人即便到中国旅游过，但对回到祖先的居住地去寻根缺乏兴趣。一位数年前每年多次被公司派往中国大陆采购货物的四十岁左右的华人说：

我从来没有回去过祖先的中国家乡，我父亲他们一辈也是没有回去过。我也不知道我祖先的家乡在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也没有家谱。清明节扫墓已经是在马来西亚这里了。因为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我的爷爷就是在这里去世的。跟福建那边也没有联系了，如果去中国，也不知道去找谁了。究竟是哪个县，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什么村庄了。这个要去问我的爸爸就行了。²

从中国根祖文化的传统来说，祖先坟墓就是华人的“根”，人老了就要回到家乡认祖归宗。但老一代华人无法叶落归根回到中国，而是在马来西亚去世并安葬于当地，并成为其后裔每年清明节扫墓的地方。因此，华裔新生代对“家乡”和“根”的情感归属已经转移到马来西亚当地，而远祖的墓地、家乡、家族和宗族也已与他们渐行渐远。因此，把中国当作旅游地之一、对先前的中国家乡（祖籍地）兴趣不大，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新生代华裔中较为普遍。

我去过中国，去年就去过，主要是去广州比较多。我祖先的家乡是广东中山的，靠近珠海，具体是那个地方就不知道了。我去中国也主要是观光，并不是去走亲戚，因为都不知道那边有什么亲戚了。没有人带我们去找亲戚了，我们去只是观光而已。³

可能更多华人的情况是从未去过中国，他们对中国和祖先的祖籍地也并不感兴趣。

我的老家是万楼的，不是吉隆坡的，算是雪兰莪的吧。以前我的祖先就是从中国过来的嘛，中国惠安的，福建的。我是第一代（注：应为第二代），也就是说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爸爸是从中国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我没有回过中国的老家。只是知道在惠安，因为与那边没有任何联络了。也没有去过中国，因为没有联络了，所以就一直没有去。⁴

我是第三代华人，没有去过中国。是我爷爷那一代移民来这里的，我都没有见过爷爷，他是广东琼东县（海南）的。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不知道这些了。我父母去过，我大哥也去过，现在我们几个兄弟，都忙着找生活，没有时间去了。⁵

一位致力于编制余氏家族“大马版族谱”的华人余善恺认为：“很多 80 后对本身的祖籍认识和归属感趋向式微。身边同龄人士或 90 后都不太重视祖籍这回事。”⁶很显然，一些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虽然也希望到中国一睹祖先的祖籍地，但他们明确地指出那只是自己长辈的故乡，称之为“中国故乡”或“长辈的原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故乡在马来西亚：

对于中生代而言，他们的父母祖辈或许是华人移民。关于远在中国故乡亲戚的故事或历史，从小自有所闻，心中甚至会向往去当地看看，一睹长辈们的原乡。当踏入祖辈故乡…⁷

¹ 何俐萍：“没有外来者”，《星洲日报·砂拉越评论》，转自星洲网 2015-10-20，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055355.html。

²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7 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⁴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6 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⁵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5 日上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⁶ 林德成：“代父圆愿·9 姐弟结伴寻根制大马版族谱”，《星洲日报》2018 年 5 月 18 日。

⁷ 林德成：“根在树壮·传承祖籍文化，守护自己的根”，《星洲日报》2018 年 5 月 18 日。

另一位华人也说道：

当我跟同辈友人提起有意组织“寻根团”，回到先辈在中国的家乡寻根问祖时，大部份和我一样，属第三或第四代的友人却认为“这有意义吗”？是的，属于第三或第四代的年轻一辈，对先辈家乡的所谓归属感早已淡化，也没有了家族情怀的意识，因为在这一辈人中，国与家就是我们生长的马来西亚。¹

“先辈家乡”、“先辈在中国的家乡”等词的使用，反映了华裔新生代心目中的故乡、家乡与其迁居于马来西亚的第一代先辈是不同的。

三、印尼华人对祖先家乡的认识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印尼华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政治风雨和社会动荡要多得多，他们的故乡认同受到了来自于政府政策和社会排斥的双重影响。由于1966年印尼人民协商会议第31号和第32号临时规定作出了有关禁止和限制华文教育及华文报刊出版的规定²，此后又全面禁止了华人的传统文化活动，因此，1950年及以前出生的印尼华裔尚能完成基本的中小学华文教育，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华裔则完全失去了中文教育的机会。在这种强制同化的背景下，印尼产生了三个大致以年龄为界的、个人特征迥异的群体：1950年以前出生者大多受过系统的中文教育并普遍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故至今依然对中国怀有较为强烈的故乡认同感；1960年以后出生者则从小学开始全面接受印尼的国民教育，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³，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当代的华裔青少年都已经将印尼视为自己的故乡，对中国及其祖先居住地的归属感已相当微弱。而1951—1959年出生的华裔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或多或少接受过一定的中文教育并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其对中国的故乡认同的程度有强有弱。不过，无论是哪一年龄群体的印尼华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们对中国的故乡认同是难以表达和表现出来的。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最重要的故乡认同表达和表现场所——华人地缘、血缘性社会团体已被取缔，相关的活动也被严格禁止。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恢复之后，这种局面才慢慢改变。

以下我们将通过有关印尼华人寻根活动的报刊文献资料、网络数据资料以及我们在印尼田野访问所收集的口述材料，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印尼华人对中国的故乡认同状况进行简要的描述和分析。

1、1950年以前出生的华人大多对中国有较强烈的故乡认同

1950年及以前出生于印尼的华人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群体，他们大多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换过程，1960年代之前接受教材、师资主要来自中国的系统中文教育，在华文学校接受与中国同步的爱国爱乡教育，关心中国并心向中国。1960年代的归化入籍、政治效忠对象的改变造就了他们复杂而独特的心路历程，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人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对中国故乡的怀念和向往也是很难改变的。当1990年中国与印尼关系恢复之后，他们便成为重返故土寻根问祖的头一批人。

近年来，活跃在寻根之旅路上的印尼华人大多是1950年及以前出生的，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较少。这批老一代华人对中国故乡的深切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一些有成就的“侨领”重返中国的祖先家乡后十分慷慨地对家乡捐款捐物也反映了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在这里我们挑几个比较典

¹ 陈世传：“寻根不老土！”，《星洲日报》2016年7月10日。

² 李士君：“遭当局禁止三十载，华文报在印尼问世”，《北京青年报》2000年2月19日。

³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一部分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在强制同化的高压下仍受前辈的影响，在家偷偷学习中文和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礼俗的教育。我们在印尼调研时聘请的印尼语翻译出生于1970年，她说自己从小被父亲要求在家偷偷学习中文，并被要求牢记自己的祖籍国中国，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到祖籍地寻根。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恢复后，她多次回到广东梅州寻根，实现了向父亲许下的承诺。

型的例子罗列如下：

印尼《千岛日报》社社长张明开（1940年代生，第二代华人，2007年到中国寻根时已近七十岁）率该报国内记者站记者一行8人到家乡开平访问寻根。他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回到祖籍地莲塘里，找到了其父亲当年住过的祖屋。虽然祖屋早已破败，只剩下倒塌的墙壁，但张明开社长仍难掩内心的兴奋和激动，从没回过乡的他原以为能找到祖辈居住的村落，来这里瞧瞧就可以了，没想到还找到祖屋以及一些远亲，终于圆了多年的寻根梦。¹

2012年，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印尼闽南同乡会会长、印尼永春同乡联谊会会长许世经（印尼名Rachman Hakim，1950年在印尼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曾携11位家人返回永春谒祖扫墓。2014年，他又率领印尼永春同乡联谊会恩亲团86人回到家乡永春县探亲访问。“筹备已久的2014年寻根之旅使我们到达向往多时的祖籍国，回到了祖先的故土，浓浓的乡音、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多么的令人怀念。这里是先辈的家园，我们祖先的根源。”许世经说道。²

印尼侨领陈大江（1925年生，2018年赴中国寻根时已93岁）携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孙共15人回到祖籍地福建省漳平市，开展为期一周的返乡寻根活动。他说“此行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祖父常常谈一些国内的形势，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³

有些华人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重返家乡，只好托子女代自己圆满中国的寻根之梦。

2013年，出生在印尼的第三代福清籍乡亲UMIN姐弟俩回乡寻根问祖。在玉屏侨联分会，姐弟俩一口的印尼语，让工作人员不知所言。比比划划之中，姐弟俩拿出一张褪色了的、陈旧的小红纸，上面写着“福州府福清西门外修仁里坑底村”，大家才明白姐弟俩是回乡寻根问祖的。已经退休了的、原福清市侨联秘书叶诚慈懂得印尼语，被请来当翻译。姐弟俩告诉叶诚慈，他俩是土生土长在印尼雅加达的第三代华侨（注：应是华人），姐姐今年43岁，弟弟38岁，这次是受父亲的重托，回乡寻根问祖的。⁴

我们根据百度网、印尼《国际日报》电子版的搜索，2015—2019年间，自发和自费赴中国寻根问祖的印尼华人及团队共有13批次，大多数都是由1950年前出生的印尼老华人牵头的（参见表2-2）。其中，在2018年11月前来参加第三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第二十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的印尼仙谿总会约有100名印尼华人最小的也有五十多岁了，最大八十多岁。他们大部分来自印尼泗水，有回来探亲的，有回来寻根的，有回来好几次的，也有从没回来过的，其祖籍全部是福建莆田仙游的。⁵

¹ 关小琴：“印尼《千岛日报》社长开平寻根”，中国侨网，2007年9月20日，<http://www.chinaqw.com/zgqj/gxjx/200709/20/88325.shtml>。

² 胡福琼、梁白瑜：“许世经率86名印尼永春同乡联谊会成员返乡寻根”，今日泉州网，2014年5月15日，<http://www.qzcns.com/qznews/2014/0515/2946.html>。

³ 张金川：“93岁闽籍印尼侨领陈大江举家返乡寻根”，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25日，<http://www.chinaqw.com/gqqj/2018/04-25/187276.shtml>。

⁴ “仅凭一张百年前地址 印尼姐弟福建福清寻根圆梦”，中国新闻网，2013年7月3日，<http://news.sohu.com/20130703/n380559801.shtml>。

⁵ 刘燕钦：“印尼仙谿总会乡亲回仙开启文化寻根之旅”，莆田网，2018年11月21日，http://www.ptxw.com/news/xw/shjw/201811/t20181121_215674.htm。

表 2-2 2015-2019 年部分印尼华人赴中国的寻根活动

年份	活动内容	主办、承办方
2015	印尼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秘书处组织的 130 位师生分团在上海一些单位开展一系列活动。	国务院侨办、上海侨办主办，上海进华中学等承办
2015.6	60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印尼华裔青少年首次到广西参加为期 15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情系侨乡容县营活动。	国务院侨办，广西侨办承办
2016.1	印尼广肇总会副总主席、开平市侨联名誉主席胡建章与妻子、女儿、外孙女到广东开平市百合镇，为修缮同安村文化室慷慨捐资。	自理
2016.6	60 名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印尼华裔青少年学习了武术、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参观游览了湖南的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胜。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湖南省海外交流协会协办，湖南师大承办
2016. 6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来宾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 28 名，在南宁参观了广西科技馆、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来宾等地参加相关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广西侨办承办
2016.9	旅居印尼的蓝氏宗亲蓝宝罗一行 8 人回到祖籍地福建省漳浦县赤岭畲族乡寻根谒祖。	自理
2016.10	41 名来自印尼泗水惠潮嘉会馆访问团的华侨们齐聚惠州，此次活动旨在加强中国惠州和印尼泗水两地民众间的文化交流。	广东省惠州市侨联主办。
2017.6	42 名印尼华人参加首届海外客属社团中青年研习班、第二届海外华文教师培训班及“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梅州市外事侨务局承办
2017. 6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情系侨乡容县营近日在容县高中隆重开营，50 名印尼华裔青少年在容县开启为期 13 天的中华文化之旅。	国务院侨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侨办主办、玉林市外侨办和容县外侨办承办
2017.6	印尼雅加达的 70 多名兴安后裔组成“亲情中华”夏令营，在莆田各地寻根，参观交流学习。	中国侨联主办，福建侨联承办
2017.6	印尼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华文教育夏令营，开展为期 21 天的寻根之旅活动，在南安鹏峰中学举行闭营仪式。	国务院侨办主办，福建省侨办承办
2017.7	30 多位印尼华裔青少年到广东省陆丰市福山妈祖旅游区参加为期 10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广东省陆丰市侨办承办
2017.7	年逾古稀的印尼侨胞郑秋梅、郑建安回乡寻根。	自理
2017.8	印尼加巴贝卡集团创始人及董事汪和铭先生，加巴贝卡摩若台公司首席执行官钟万有先生等一行来梅考察、寻根。	自理，梅州市委统战部接待
2017.9	27 名来自印尼的华裔青少年到广西开展华文教育交流，开启为期 10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广西侨办承办
2018.1	印度尼西亚“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	不明
2018.4	印尼中华总商会创会主席、永久荣誉主席、友光集团名誉董事长陈大江（93 岁）携儿女子孙和亲人共 16 人到祖籍地福建漳平寻根。	自理
2018.5	印尼的 70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为期 15 天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山东德州营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山东省侨办承办，山东德州平原三中团委组办
2018.5	由印尼巴中校友会辅导主席、梅州市荣誉市民李世镰先生为团长率领的印尼巴中校友会寻根旅游团一行 168 人回到梅州观光旅游，寻根问祖。	自理，当地有关部门接待
2018.6	印尼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晋江营开营仪式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8 名营员参加了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福建晋江外侨办承办
2018.6	广东揭阳市外侨局助力印尼第四代华人林林返乡寻根，林林找到了堂兄并表示以后会常回家看看，把根留住。	广东揭阳市外侨局提供服务
2018.10	印尼第四代华人共 15 人前往祖籍地——福建南安老乡马头（西南），开展寻根之旅。	自理
2018.10	第六代印尼华裔翁桂香姐妹四人带同女儿和侄女一行六人来到梅城寻根和拜访罗芳伯故居。	自理
2018.10	印尼叶氏宗亲会回乡寻根团一行 28 人来叶县寻根祭祖。参加祭祖仪式的有平顶山市侨联。	自理，河南省平顶山市侨联接待
2018.12	印尼仙谿总会约 100 名印尼侨胞回到家乡莆田仙游，开启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	自理，当地有关部门接待。

2019.5	印尼拉森黄氏宗亲一行 30 多人回到家乡——福建泉州寻根。	自理，福建泉州侨联接待
2019.6	48 位印尼华裔青少年到福建南安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泉州市侨联承办
2019.6	印尼 16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亲情中华”夏令营仙游营活动，为期八天。	福建省莆田市侨联主办、仙游县侨联承办
2019.6	“寻源祖地看福清”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在北京师大福清附属学校开营。印尼新中三语学校 117 名优秀毕业生参与了相关活动。	福清市委统战部、海联会主办，印尼泗水新中三语学校、北师大福清附校承办
2019.9	梅州市荣誉市民、市侨联名誉主席、印尼梅州会馆会长陈志明等带领约 280 名印尼华人华侨“中秋寻根之旅”访问团欢聚在梅州。	自理，当地有关部门接待。
2019.12	印尼 40 多名华裔青少年，与容县都峤中学的 60 多名学生参加“寻根之旅”冬令营广西玉林营开展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广西侨办承办
2019.12	“寻根之旅”夏令营——印尼华裔青少年福建南安营在南安拉开帷幕，来自印尼的 28 位华裔师生来到泉州南安市参加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福建省侨联、泉州市侨联承办

注：本表信息资料主要来自以关键词“印尼华人寻根”进行的百度搜索，涉及中国侨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其中“中国寻根之旅”的信息仅限于由印尼华裔参与的活动。因有些印尼华人到祖籍国寻根的信息并不一定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到，因此难免漏掉一些未被媒体报道的寻根活动。

2、印尼新生代华裔大多缺乏对中国及祖籍地“家乡”的归属感

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裔新生代，印尼华裔新生代青少年对中国故乡的认同感更低，这是印尼政府采取强制同化政策的一个后果。尽管印尼华人社团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致力于恢复华文教育，但其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华裔青少年虽然接受了华文学校的中文教育，但其父母大多数是 1960 年后出生的，这一代人除了到台湾留学的一些华裔外基本丧失了中文的表达能力¹，因此目前大多数华人家庭中使用中文的很少，缺乏相应的语言环境，从而限制了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并与中国社会交流互动的能力，也限制了他们对祖籍国中国及其祖籍地的认知。相对于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而言，印尼年轻的华裔新生代对中国及先祖家乡的归属感要弱得多，一般也没有去中国寻根的动力，如果他们到过中国，往往是出于旅游的目的，而非寻根。雅加达一位十七岁（2001 年出生）的华裔少女说：

我弄不清我是华人第几代，没人跟我说过。我去过中国，去过上海等一些城市，但已经不知道祖籍地了，也没有去过。我与中国没有什么联系，我对中国也没有什么感觉。我是印尼人，这里是我的家乡。中国只是我的一个可选择的旅游地吧。²

在棉兰华人聚居区（当地人称之为“唐人街”），一位 1968 年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极其吃力地用普通话对我们说：

我们这个社区的华人一般都有中文名字，我姓陈。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代了，是爷爷的爸爸那一代移民到这里的。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祖籍地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广东还是福建，我们家也没有家谱。³

印尼的万隆是华人聚居之地，我们在印尼大学排名第二的万隆科技大学利用偶遇的机会，随意访谈了三位正在校园里休闲的一年级华裔学生。其中学生 A 说自己是华裔第四代，祖先来自潮州；学生 B 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广东的福建”（笔者注：该学生并不清楚广东与福建的区别），爸爸和外公都来自福建，不知道是第几代；学生 C 说自己不知道祖先从福建的什么地方来的，认

¹ 雅加达留台校友会的一位 1950 年代出生的女士说：“留台校友会全部都是华人，因为原住民也就是印尼人最近几年才开始去台湾留学，所以他们还没有开始进入我们的团体。以前去台湾的都是华人，没有印尼人的。一般从台湾留学回来的都会参加我们的这个校友会。至于有多少会员，也没有统计过。进入我们校友会的，多数是去台湾念大学回来的，去念中学的，没有在我们团体里面。一般去台湾念中学的，到最后都念了大学。我们那一代去台湾的主要是读本科，现在的硕士、博士都很多了，以前基本上是学士毕业。”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² 此次访谈有印尼语翻译陪同，受访者用印尼语口述。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9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1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为自己可能是第六代。学生 B 到过中国旅游，但却对中国祖籍地不感兴趣，且对中国环境卫生的印象不佳：

我跟我父母去过中国两三次，去过深圳、上海、香港，跟旅游团去的。有时一年一次出国，不光是去中国，我出国好多次了。（去中国的时候）没有去中国的祖籍地，我们都没有去过。我已经是印尼国籍了，只是我们的血统还是华人而已，我也与中国没有什么关联了。2016 年我到过中国的深圳广州上海桂林，张家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不清洁，没有印尼好。台湾我们也去过，它与中国不一样，它不是属于中国的（笔者注：此处为原话，反映了受访者的认知与态度），但香港是中国的。中国比较肮脏，洗手间很脏。中国人没有礼貌，没有规矩，不太好，我不喜欢。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也不好，很吵闹，印尼人在公共场所是很安静的。¹

这三位华裔学生都有将来出国留学的打算，学生 A 表示要去日本，学生 B 打算去德国，学生 C 打算去美国。三人都表示不想去中国留学，认为中文太难学了，学生 B 还表示不想去中国留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厕所太脏了，受不了。埋怨中国卫生环境差的华裔新生代不在少数，而且成为许多人对中国给予负面评价并放弃留学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

年轻的一代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不好。比如像我的三个孙子，我让他们去中国读书，他们都不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中国的厕所太肮脏了，中国排队坐地铁令人不能接受。我的朋友，他在印尼也做中医、气功的，出钱让子女去上海读书，但那孩子只去了一年就回来了，他说不习惯中国的那种生活。他也是说中国的厕所肮脏，说是早上出去一直憋尿等到回宾馆才小便，不敢小便在外面，在中国生活对自己变成是一种虐待。你看看，他说这样的话。印尼的飞机场与新加坡的一样，每个厕所都请了人工，很干净，有两个工人在外面，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人多，厕所又少。有一次，我在广州南站找地方小便，南站很大，一个厕所在这边，一个厕所在那边，差不多有一两公里这样，要走很远。人家新加坡飞机场 30—50 米一个厕所，中国又是很多人排队呀，火车站人山人海，排完队走进里面又是很肮脏，我们老人就算了，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要求高，单单这个原因他们就不要去中国读书了。我的孙女跟我讲，她跟我去中国很多次，去不少地方，很多地方的风景都很不错，但是就是厕所不行，她很有意见。到那个北京南站，哇！真是好可怕呀！她说南站高铁要挤那个火车我是不敢的，要叫我去中国读书，我是做不到的。²

可见，对中国卫生环境的印象差，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印尼华裔新生代对祖籍国中国和祖先居住地的荣誉感或认同感，从而压抑了他们学习中文、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寻根问祖的热情。

我们访谈了一些 1950 年代出生的印尼华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下一代已丧失中文交流能力，因此对中国故乡的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一位八十多岁、祖籍广东梅州的第三代华裔老太太说：

现在六十多岁的华人他们还能够让他们的孩子与中国产生一些联系，比如现在我的孩子们都可以，但确实有很多华人的子女或下一代已经与中国没有什么联系了。以后越来越少的华裔能说中文或学中文了。³

这位老太太在中国与印尼还未恢复外交关系的 1980 年代就来到中国，到过北京、上海、张家界，四川、九寨沟、黄山等地旅游，但却没有回到她的梅县（现梅州）老家。这是因为她作为第三代华裔，受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与印尼紧张关系的影响，一直无机会与这里的亲戚联系过，“也不知道有什么亲戚了”。后来她又多次到中国旅游，也没有到过梅州。类似这一代与祖先原居住地缺乏联系但仍对远祖的故乡心存念想的华裔往往也是这样：他（她）们把中国作为自己祖先的

¹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7 日下午，地点：印尼万隆市。这三位华裔学生均无法使用普通话交流，访谈过程主要使用英语，有时印尼语翻译也提供帮助。

²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8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4 日下午，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匿名）。

故乡，来到中国就等于来到祖籍地，这比回到祖先的原居住地更超脱一些。¹

我作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还是有家乡观念、族群观念和祖国观念的。但是再下去的第三代、第四代，这种观念就是越来越薄了。客观的层面来讲，他们也是印尼公民了，加上四十多年没有华文教育了，所以他们的这种意识已经越来越薄弱了。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前一段时间是因为政治问题，没有办法。2000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印尼也逐渐开放了，很多华人也在致力于恢复华文教育，我们也建立了双语学校。我们都希望给他们灌输老祖宗的传统观念和文化。²

上述这位受访者是第二代华裔，出生于1950年代，是印尼某市客家会馆的领导人、企业家³，1990年代曾多次赴中国大陆经商。他认为，在苏哈托时期，与共产党、华人有关的东西全部都要被封掉，包括商店也不能用华文招牌，公共场所也不能讲中国话，那时最可恶的是印尼政府把黄色书刊、毒品和华文书刊并列在一起成为被禁物品，华人聚在一起也会被怀疑是不是要聚众造反。在这种环境下，华人子弟也只能读印尼文学校，在印尼文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强制同化，1960年后出生的大多数华裔对中国祖籍地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几乎丧失了，现在要恢复起来困难重重。

雅加达留台校友会的一位女士曾到台湾留学过，其中文非常流利，她说：

现在不会华语的印尼华人很多，他们对中国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祖宗是谁。像我这个第二代，我的爸爸常常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所以我就知道一些中国的事情，但像我的孩子们，因为我本身没有住在大陆过，所以我也可能讲中国的事情给他们听。他们也去过中国大陆。我以前大学毕业时，也就是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爸爸带我们去梅县，以前我们有一个大家庭在那里。不是清明节去的，而是普通的日子去的。我的子女都没有去过那里了，因为我与当地的亲戚也不认识了。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叔叔那边就有人与我们联系，他们就到印尼来与我们见面了。我们在梅县住了一个礼拜，我们是住在旅馆里的，没有在村子里住。⁴

总之，随着华人移民世代的不断更迭，与中国祖先家乡联系的印尼华人和华裔正逐渐减少，越晚的一代华裔与中国社会及中国的祖籍地之间越是渐行渐远。

3、“寻根之旅”活动、家庭教育、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等因素对华裔新生代的影响

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等机构从1990年代开始启动的“中国寻根之旅”活动以及印尼华人社团开展的各类中国寻根之旅活动，对培养印尼新生代青少年的中国故乡认同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其作用可能并不太大。中国官方组织的寻根活动虽然从人数和规模上远超印尼华人社团的同类活动（参见表2-2），但由于每次活动时间较短（一般是一周到半个月左右），加上印尼华裔青少年的中文交流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是否能有效地提升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知和情感上

¹ 不少受访者反映，回到祖先原居住地的“压力”不小：因为有很多亲戚，所以要准备不少的钱物来送礼，这对经济状况不是太好的印尼华人家庭确实是负担比较大。一位印尼华裔企业家说：“以前，1980年代吧，我们回国去投资，就相当于‘抗美援朝’这样吧，回去时带很多钱，回来时只剩下几千块了。那时候旅行社赚最多的钱了，什么三大件五大件全部都可以带去，衬衫可以带多少我们就带多少，连肥皂我们都买了一堆带去中国。我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我带了十二件很大的行李，那是1982年。黄老先生是1972年回去的，他带回去的量可能比我的还多。如果船可以带回去，我们也会带回去的，哈哈哈哈哈。带电视、缝纫机回去送给亲戚。不过，现在家乡的他们还是不见得比我们有钱哦。”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上午，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匿名）。

²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上午，地点：印尼万隆市。

³ 目前在某市除了经营企业之外，也负责组织客家会馆兴办华文中小学，主要招收客家子弟和其他华裔子弟就读，也有当地一些穆斯林家庭的孩子入读。

⁴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的认同¹，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相较于中国官方和华人社团而言，家庭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教育可能对华裔新生代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们聘请的印尼语翻译说：

因为父母没有教他们（华裔青少年），所以他们对中国没有什么观念，（要是他们去中国）估计只是会说去中国旅游而已，这是万里长城，这是故宫，这样子。他们不会去关心祖籍地在那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了。²

这位印尼语翻译是第三代华裔，出生于1970年，正处于苏哈托上台后对华人实施强制同化政策的初始时期。在这个年龄段，印尼新生代华裔中极少有人有机会学习中文，然而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她成为了这类“极少数人”：

我呢，与其他同龄华人不同。（在苏哈托时期）我爸爸一直告诉我，我家乡是什么地方，一直让我写下来，一直写。我父母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们没有回过国内。我爸爸爱中国，不让我们读印尼书，要我们在家偷偷地学中文。我是1996年才加入印尼国籍的，这是因为我爸爸不给我入印尼籍。我也没有把名字改成印尼文名字，而是用拉丁文写的中国名字。³

类似印尼语翻译的这种情况，在印尼并不多见，大多数1960年代出生的华裔不仅改用了印尼文姓名，无法学习中文，也缺少了对中国和祖籍地的思念和向往⁴。客观地说，印尼官方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多数1960年代出生的华裔新生代将情感几乎完全投入了印尼，并视之为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的出生地视为家乡，很少对中国及其祖先居住地产生依恋或归属感。

一位居住在雅加达北部华人区近三十岁的第三代华裔小伙子，并没有纯粹的华人血统，爷爷从福建移民到印尼，父亲会说中文，母亲是混血的，不会讲中文，都是天主教徒。外婆是穆斯林，外公是印尼出生的华裔。小伙子不能使用中文进行交流，我们的交谈是在印尼语翻译的帮助下进行的。他去中国寻根的计划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产生的，他说：

我一直没有去过中国，我父亲去过两次，一次去香港，一次去中国大陆。上次他叫我和妹妹跟他一起回到福建家乡，但我们一直没去过。他已经68岁了，他知道家乡所在地，家乡是知道，但那边已经没有亲人了，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我父亲叫我们去中国家乡去看看，主要是想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但是几个人想找一个都有空的时间还是比较难的，大家都比较忙，因为工作上时间安排不过来，但我们是有计划要去的。因为我的生意在印尼目前是比较忙的，一时也不能离开。⁵

除了受先辈、家庭教育的影响之外，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往来关系，这个因素对华裔的中国祖籍家乡认同也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当华人和华裔实际上或可能潜在地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时，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认同与中国相关的身份，包括对中国祖籍家乡的认同⁶。这样的例子是有一些的。例如，印尼侨胞（中国）联合总会总主席钟家燕作为第六代华裔，尽管只有30%的中华血统，但母亲从小的教育使她对中国祖籍家乡的认同比起其他华裔更强烈，在香港及中国大陆获

¹ 这类活动有时公开宣称：活动旨在增进印尼青少年与祖国（笔者注：应为祖籍国）的文化情缘，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和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增进中印尼文化交流和友谊。参见：“印尼华裔青少年寻根陆丰”，《汕尾日报》2017年7月2日。

²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³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⁴ 不过，现在这位印尼语翻译也不再当初对中国和祖籍地的那种情感，甚至庆幸当初留在了印尼。她说：“还是在印尼为好，我的小姨六十年代回到中国受了很多苦，我们当时没有回中国还是正确的选择”。

⁵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19日下午，地点：雅加达市北华人社区。

⁶ 这类认同在学术界被称为“随状况而定的认同”，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8-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得事业上的成功以及个人事业与中国之间的密不可分也强化了其对祖籍国的情感认同¹。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完全无中华血统的印尼华裔熊德龙²。在百度网里，对熊德龙是这样介绍的：

在一次美国洛杉矶上万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庄严仪式上，一个身材伟岸、高鼻大眼、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丝一毫中国血统的男子汉，眼含热泪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他，就是美国熊氏集团主席、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熊德龙。

熊德龙先生，美国、印尼国际日报总裁、熊氏集团总裁、印尼中华总商会主席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印尼客家华人。熊德龙 1947 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当他快两岁的时候，一对旅居印尼的梅州籍侨胞熊如淡、黄凤娇夫妇收养了他。熊德龙怀着无比热烈的报恩之心，以自己的胆识和毅力创出了一番事业，崛起于印尼工商界，进而建立起遍布全世界的熊氏企业王国，成为饮誉国际社会的著名爱国侨领。德龙先生事业有成后，虽身居海外却心系父邦，频频彰显其百分之百中国心的爱国爱乡情结，热心祖国和家乡的公益事业。³

据一位与熊德龙曾经有过较密切来往的华人的回忆，熊德龙曾在中国云南从事香烟生意挣到了一桶金，他把钱捐献给云南大学建了一个礼堂，并获得了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此后事业飞黄腾达⁴。1993 年，他斥巨资收购了美国华文报纸《国际日报》，后来又承印和发行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中国日报》（英文报），然后投资中国西南，其个人事业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密不可分。熊德龙身上同时兼备了长辈（养父母）教育、很强的中文交流能力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等三大要素，这是他对（其养父母的）祖籍国和祖籍地产生强烈认同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官方举办的大规模“中国寻根之旅”活动、印尼华裔家庭长辈教育及自发的寻根活动、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等因素对于增进华裔新生代对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强化其对祖籍国与祖籍地的情感认同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泰国华人眼中的祖先故乡

与印尼华人相似，泰国华人中仍怀有中国祖籍家乡观念的只占少数，主要集中在老一代华人、泰北华人这两大群体。而大多数泰国华人已经完全融入泰国的主流社会，他们既不会中文也缺乏华人认同意识，主观上认同为泰人而非华人，这一定程度影响他们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这个大约占泰国华人总人口 90% 左右乃至以上的庞大群体虽然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中国，但对中国及祖籍地的情感认同是相当弱的，老一代华人、泰北地区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则较强。以上观点来自于我们对相关研究文献和实地访谈资料的分析。在此略为展开，作如下论证。

1、大多数泰国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普遍较弱

泰国华人大多已不能使用华语进行交流，也不会说普通话。据泰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 年仅有 111, 866 名华人在家里使用华语，若以泰国华人总人口为 679 万计，则约占全国华人总人口的 1.73%。⁵当然，如果将能够使用华语但不在家里使用的华人统计进来，泰国华人中能够使

¹ 钟家燕不仅与中国的女企业家有广泛的交往，还担任中国十余所高校的客座教授，2015 年担任在北京成立的“国际丽人汇”全球总会荣誉主席。参见杨凯淇：“印尼女侨领钟家燕：双重文化背景让我拥有双重责任”，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15/03-22/7148472.shtml>。

² 熊德龙的例子尽管只是一个个案，但是从理论上或逻辑上足以推翻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对华人概念的定义，即将华人界定为“具有中国血统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人”是错误的。

³ 这个简介与正规刊物的介绍基本一致。参见张开龙：“我有百分之百的中国心——访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总主席熊德龙先生”，《海内与海外》2000 年第 11 期；李富根：“‘我是客家人’——记美国著名侨领熊德龙”，《今日中国·中文版》2001 年第 1 期 50 卷；简陌：“侨商熊德龙：异邦血，中国心”，《全球商业经典》2014 年第 10 期。

⁴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某日，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⁵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ailand: “Table 7 Population by usual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sex and area”, http://web.nso.go.th/en/census/poph/data/090913_StatisticalTables_10.pdf。

用华语的人数要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另外，这个数据是否包括了泰国北部的华人，不得而知。泰北的华侨华人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¹，几乎都能阅读中文并使用普通话，但我们无法弄清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成为华人（即加入泰国国籍）。据当地人称，大约只有一小部分加入了泰国国籍。因此，即便泰北华人有十多万，整个泰国能够使用中文的华人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只占泰国华人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与印尼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泰国大多数泰国华人中文交流能力的丧失，可能首先起因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官方的强制同化政策，其后则是自然同化或自然融入泰国社会的结果。中文交流能力的丧失使得大多数泰国华人难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不再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对中国祖籍家乡的认同感也逐渐消散甚至荡然无存。

完全融入泰国社会、已不认同为华人身份的华人，也就是他者认定为华人（如中国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以中华血统的标准来认定）但其本身却不认同华人身份的究竟有多少？由于泰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不存在族裔的分类数据，因此无法根据确切的统计数据来回答。不少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大都只是用诸如“占大多数”之类的词模糊地下结论。有人认为：“华侨移民泰国，在泰国植根繁衍后代生下来的子女他们的法定身份是“华族泰籍人”，到了再下一代，即子女子女，则变成‘泰籍泰族人’了，虽然他们有的仍具 100% 的华人血统，但已不再具有华族的名称，而是泰族一分子了。”²在泰国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得出这样的初步判断：中国官方和学术界所认定的“泰国华人”，在泰国无论是他者认定还是自我认定，其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成为“泰人”而不再是“华人”。

在泰国从事田野访问期间，当我们问到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时，从泰国华裔新生代那里得到的回答往往都是：“我不是华人，我是泰人”，或者“我的父母是华人，而我不是”。这是我们在曼谷一个华人家庭里与一位 1979 年出生的华裔的简单对话：

Q: Are you Chinese? (问：你是华人吗?)

A: No, I'm Thai. But my Ancestors were from China, 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also Chinese. (答：不，我是泰人。但我的祖先来自中国，我的父母也都是华人。)

Q: Do you think China is one of your homelands? (问：你认为中国是你的家乡之一吗?)

A: No, Thailand is my only homeland. (答：不，我的家乡只有泰国)³

在泰国实地调查期间，我们除了有意识地访问一些华人社团之外，大多数访谈是在各地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进行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仅仅访问华人社团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即华社一般会有意识地挑选那些普通话流利、有较强祖籍国认同的华人来接受我们的访谈，这将带来很大的分析误差，调查结果很可能与当地华人的总体状况相距甚远。上述访谈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所进行的大量偶遇抽样调查的案例之一。访谈是在曼谷的一家华人家里进行的，这个家连着临街的、由两位七十多岁的华人夫妇经营的中药店铺。我们进入中药店铺与他们交谈，受到热情邀请并进入家里喝茶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上述的受访者是他们的女儿，不会普通话，曾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毕业，目前是自由职业者，已生育两个子女，其丈夫是该市的警察，纯粹的泰人血统。夫妇俩对女儿上述的回答是赞同的，老太太说：

我们两个一九五几年的时候都去过中国读书，他是去武汉大学，我是去中山大学。当时年纪还很小，我们去汕头住，然后我到中山大学读书。我们两个不是华侨，是华裔。我们第二代就叫

¹ 在我们的田野访谈中，受访者有两种说法，一说是 10 多万，一说是 30 万。另有人撰文称有 60 多万，参见黄启庆、吴雁江：“泰北华人村汉语普通话状态及教育情况调查报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关于泰北华侨、华人口的数量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² (泰国) 江白潮：“二十世纪泰国华侨人口初探”，《东南亚》1992 年第 4 期。

³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华裔了，华侨是上一代了。我女儿说她是泰人，不错！她这样回答没有错。因为我们两个是华裔，所以我们的后代就是泰国人，所以她们不是华裔。¹

一位在中文报社做主管工作、约 50 岁左右的华裔对许多华裔新生代不承认自己是华人的现象给出如下的解释：

这里的华人第三代一般都已经不说他自己是华人了，都会说自己是泰人。他们最多会说自己有中国的血统。如果你问他们的父母亲，他们会说自己的父母是中国人。泰国有中国血统的人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泰国人，最多只是认为自己是泰国的华裔而已，他们不会自视为华人的。²

对于泰国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祖籍的家乡观念问题，他谈了自己亲身感受和对华裔下一代的印象：

老一辈的华人几乎已经死光了，第三四代已经是同化的了，你们上街去看看，没有几个会讲普通话了。他们也还有一些中国祖籍家乡的观念，但留恋是不会有。我的家乡观念比较深，但我没有去过家乡，也没有回去中国祖籍家乡的那种渴望。我在中国有个表兄弟，他来过泰国几次，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早期我父亲自己回去过几次，给家乡汇款，也带很多东西回去过几次，但我没有去过。因为工作比较忙，所以没有去，我倒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去过北京、上海几次。中国的电视台我没时间看了，我哥哥还看，他的观念比我的强一些。我大哥和弟弟们是不想去的，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

我太太是第三代，连潮州话都讲得不太像样了。我与她认识的时候是讲泰语，到目前为止都是讲泰语，与孩子交流也是泰语，在家里基本上也讲泰语。第三代有中国人血统的意识，但没有中国家乡的观念了。我们这里也有坟场，清明扫墓，这里也有土葬，像我这一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习俗了，下一代更加不会了。他们也不会关心中国的事情了，他们有中文名，但他们并不用的。

3

这位华文报社主管的普通话相当标准流利，他的父母并不会说普通话，八个兄弟中只有他和二哥可以使用普通话，这是他们早年去华文夜校学会的。中文表达能力成为他在泰国谋职的重要工具，因此他曾获得台湾驻泰国代表处和某华文报社的长期聘用。

另一位在泰国某市华助中心的负责人也解释了华裔新生代的华人身份认同与对中国认知问题：

如果父亲是中国来的，而母亲是泰国当地人没有中国血统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们的后代不会认为自己是华裔。因为泰国不像中国那样有那种传宗接代的思想，他们也没有中国的姓氏，也不知道自己的中文姓氏是什么。如果他们与华人有交往的，可能会有华人（身份）的意识，这种情况在泰国应该是很多的。他们基本上对中国的事情是丝毫不懂，而不是不感兴趣的问题。⁴

我们认为，华裔的中文交流能力、实际上或潜在地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因素（自变量）都与他们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华人身份认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仅中文沟通能力强作为单一的因素（自变量 1）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而且“实际上或潜在地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这个单一因素（自变量 2），即便缺乏中文交流能力，也同样对因变量产生正相关的作用。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可以说明上述的论断或假设。在这里我们暂举他信、英拉到中国祖籍家乡祭祖、任职于中国企业为例。作为第四代华裔、曾任泰国总理的他信与其妹妹英拉兄妹两人

¹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7 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²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6 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6 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⁴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此处不列具体城市名称）。

先后于 2005、2014 和 2019 年三次来到广东梅州祖籍家乡丰顺寻根祭祖¹，英拉又于 2018 年底出任中国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法人代表。可见，他们都不会中文，并自视为泰人，但却表现出不一般的中国祖籍家乡意识。按上述假设，很可能“自变量 2”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内有学者将这两兄妹高调地到梅州祭祖以及在中国企业任职的行为视为“打中国牌”，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在泰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²。也就是说，中华血统、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筹码，对泰国华人华裔是有利的，因此泰国的华裔精英会利用这个筹码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道理，泰国国内也有类似的解释。泰国中华总商会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认为：

泰国对于华裔的政府高官并不忌讳，因为历任的总理、不少高官都有中国血统。可以说，主要是分不清谁是华人了。他们都是用泰国的姓名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也是泰国公民了。在选举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祖宗请出来，说自己是第几代华人了，是从中国哪里来的。因为这里的华人势力大，因此反而中国血统能成为拉票的一个有利因素了，他们要到华人的圈子里去拉票的。³

这种祖籍地认同是一种“随状况而定”的工具性认同，尽管他们对祖籍家乡可能并不存在从亲属那里继承而来的、先赋的（givens）的原生性或根基性情感，但他们的这种认同策略对其自身是有益处的⁴。

总之，在曼谷、普吉等地调研期间，我们采取偶遇抽样方法去访谈一些华裔，但遇到能够使用普通话的华裔极少，大多需要用英语进行交流，只有进入会馆、同乡会等华人社团才会比较容易遇到能够使用普通话的华人。所遇到的那些不能使用中文交流的华裔，绝大多数自视为泰人，认为泰国就是自己的祖国、家乡，他们与中国之间也缺乏实际的或潜在的利益关系，因此对中国并不关心，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淡薄，也没有去祖籍国和先祖居住地寻根的欲望。

2、老一代华人、老年华裔仍有一定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

如上文所述，老一代华人主要指第一、二代华人。当前，泰国第一代华人已极少，二代华人的数量也已经不多，而第三代以后的老年华裔已经成为维系中华传统文化、主持各种华人社团运营的重要力量，这些人中许多都能使用中文、普通话或祖籍家乡的方言（如潮州话、闽南话、粤语等），其中国祖籍家乡观念依然比较深厚。在实地调研中，一般都可以在华人开办的企业、华文报社以及各种地缘、血缘性社团如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找到他们。参与各种华人社团活动的华人、华裔多数也是六十岁以上的高龄者，新生代青少年基本不阅读华文报刊，对华社活动感兴趣的也不多。

泰国老一代华人大概有多少？很难有确切的统计。但从华文报纸的发行量、各种华人社团的活动规模上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推测，因为一部分有中文阅读能力的老一代华人有订阅华人报纸的习惯（由于老花眼等原因，通过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来阅读新闻信息不方便）。

从泰国华文报纸的发行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目前泰国有六家中文报社：《世界日报》、《星暹日报》、《中华日报》、《亚洲日报》、《新中原报》（前身为《中原日报》）、《京华日报》。《星暹日报》的历史是最悠久的。根据星暹日报社的常务总经理介绍，《世界日报》的发行量最大，大概在 2 万多份左右，其次是《星暹日报》的 1.2 万份。若这些数据是准确的话，那么据此

¹ “他信英拉回梅州祭祖”，观察者网 2019 年 1 月 5 日，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c31603b9c780b9f4b0271b8>。

² 余海秋：“‘影子家族’：他信兄妹卷土重来？”，《世界知识》2019 年第 3 期。

³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4 日上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⁴ 有关族群认同的工具论与根基论，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18-2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推测其他报纸的发行量事实上大概在 1 万份以下，所有的报纸加总后的数字则在 7-8 万份左右。而《星暹日报》的读者中有 40%是来自中国的游客，60%是“老华侨”，这些“老华侨”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持有的是中国护照，他们并不是华人¹。因此，实际上订阅华文报纸的华人很可能只有 4-5 万左右或更少。如果订阅华文报纸的只占老一代华人总数的十分之一，那么据此推测这个华人群体大约有 40-50 万人。

至于第三代以后老年华裔人数就难以估计了，若以泰国近八百万华人总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占 20%计之，则这个群体的数量多达 160 万人。但由于第三代及更晚世代的华裔融入泰国社会的程度较高，他们多数已丧失中文交流能力并自视为泰人，因此我们据此判断，在这些移民世代的华裔中，有中国祖籍家乡观念的比例只占少数。

第一代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是最强的，即便在 1960 年代加入泰国国籍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牵挂着故乡和故乡的亲人，每次回到中国祖籍家乡都尽可能带上一些东西送给故乡的亲戚朋友。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泰国华人商业精英也纷纷来到中国并向家乡捐款捐物。泰国中华总商会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对我们说：

有大量的华侨在 1960 年代时加入了泰国国籍。解放前出来的人大多都有过落叶归根的想法。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听到中国大陆的情况后，谁都不想回去了，觉得好可怕，又穷又管制得很严，又不自由，动不动就被抓起来挨斗挨批，他们对这个非常害怕。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人问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是中国大陆来的，总是说是从台湾或香港来的。有人在六十年代回到中国，那时有灾荒，没有饭吃，所以给当时的华侨华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很穷，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包括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凭粮票购买粮食感到很恐惧，没去过中国的华人也感到中国很可怕。每次带东西回去，被亲戚分光抢光，有时分得不均匀还争吵、打架。泰国的华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发财的，都是省吃俭用的。他们回来的时候连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全都送给亲戚了，全脱光了。这种情况时常是发生的：他们住在华侨大厦，临走的时候，用过的牙刷、毛巾呀都被亲戚们等着全收了。所以给他们的感觉是中国当时的物资好紧张呀！特别是老一辈的那种华侨，他们的家乡情结是很浓的，都想设法回去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指泰国华商）也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这些华人在海外，他们还是心系桑梓。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开始到家乡去捐赠，当时还不叫做投资，主要是建学校、修路等这些公益事业。后来，中国开始吸引外商投资就慢慢有些华商去那里投资发展了。²

从 1990 年代开始举办、由中国官方资助的“寻根之旅”活动大多是面向华裔青少年的，由于大多属于全额免费，因此泰国华裔青少年都比较积极参与。而泰国华人和上年纪的华裔的寻根之旅则有許多是自费的，这似乎更体现出这些华人和华裔内在的、对祖籍国和祖籍地的思念（参见表 2-3）。

表 2-3 2015-2019 年部分泰国华人赴中国的寻根活动

年份	活动内容	主办、承办方
2015.6	泰国前国会主席披猜·拉达军回汕头市澄海区寻根谒祖。	自理
2015.7	泰国温氏宗亲总会一行 27 人赴河南华温县寻根祭祖。	自理
2015.12	来自泰国孔敬市的 40 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了在南宁举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活动，为期近 15 天。	国务院侨办主办， 中国广西海交会承办
2016.4	17 位泰国华裔旅游观光团（老年人为主）到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	自理
2016.6	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会常务副会长，丁乍仑钢管接头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文志等一行三人应邀出席在中国湖北随州市隆重举办的《丙申年世界华人寻根拜谒炎帝神农大典》。	自理， 湖北随州市有关部门接待

¹ 此资料信息来 2019 年 1 月 16 日下午的对《星暹日报》常务总经理的访谈。

²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4 日上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2016.7	书山祠萧氏家族第十九代孙裔、泰国工业部安察卡·诗文良部长率萧氏诗文良基金会家族一行16人回祖籍地福建南靖寻根谒祖。	自理
2016.10	数十名泰国华裔青少年在福建泉州参加为期13天的“中国寻根之旅”汉语秋令营活动。	福建侨办主办，泉州侨办承办、泉州师院协办
2016.12	泰国海南会馆乃组织一庞大代表团，由理事长陈文秋先生率领436人，分三批出发联络乡谊，赴中国寻根问祖。	自理
2017.3	55名泰国华裔青少年参加“2017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广西华侨学校营”，开展为期近2周的寻根之旅。	国务院侨办主办，广西侨办和广西侨校承办
2017.3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考察团一行40多人来到广东梅州，开展“寻访吴继岳足迹”活动。	自理
2017.4	来自泰国清迈崇华新生华立学校的40余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安徽营活动，为期13天。	国务院侨办、安徽省侨务办公室主办，安徽大学、马鞍山市侨办承办
2017.10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泰国华泰教育交流中心组织的近12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厦门举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国务院侨办、中国海交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
2017.10	“中国寻根之旅”秋令营在山东郓城圆满结束。在郓城宋江武术院和水浒好汉城景区等地的5天时间里，书法、剪纸、面塑、传统武术等课程的学习。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山东省海外交流协会承办
2017.10	泰国9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2017泰国华裔青少年协议营”，此次寻根之旅为期约15天。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广西侨办承办
2018.4	来自泰国曼谷的80余名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鹰潭营，开展为期10天的“寻根问道之旅”活动。	国务院侨办主办、江西省鹰潭市外侨办
2018.4	来自泰国的21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汉语短训班）活动，寻根、学习汉语，为期28天。	国务院侨办、福建省侨办主办，闽江师专承办，泰国福州会馆协办
2018.4	近110名集美学校泰国校友会、曼谷第二女子中学的泰国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华侨大学中华语言文化营，为期15天。	国务院侨办、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华侨大学承办
2018.4	泰国的近70名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广西华侨学校营在南宁开营，在广西壮乡开启“寻根之旅”。	国务院侨办、中国海交会主办，广西外侨办、广西海交会承办
2018.4	泰国81名华裔青少年在扬州参加为期8天的“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的文化寻根和中文学习之旅。	国务院侨办主办、江苏省侨办承办
2018.6	泰国华人代表团一行30人参加戊戌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暨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	自理
2018.10	来自泰国的55位华裔青少年参加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语言文化营—西北师范大学营，开启甘肃寻根之旅。	国务院侨办主办，西北师大华文教育基地承办
2018.10	来自泰国36名华人华侨青少年和领队老师参加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亲情中华泰国营。	国务院侨办主办，福建省政府侨办、漳州市外侨办和闽南师大承办
2019.1	泰国前总理英拉和哥哥他信，再次来到高祖父的家乡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塔下村探亲、祭祖。	自理
2019.10	来自泰国5所学校的73名华裔青少年和7名领队老师参加“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秋令营（汕头营），为期10天。	中国侨联主办，广东省侨联、汕头市侨联承办
2019.10	“中国寻根之旅”泰国华裔青少年秋令营海南万宁营，56位泰国华裔青少年开启了为期10天的海南寻根之旅。	中国侨联主办，海南省侨联承办
2019.10	“中国寻根之旅”秋令营—甘肃丝绸古道营开营仪式在兰州启动，40位泰国参营华裔青少年及领队沿着古丝路，一起感悟“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的辉煌。	中国侨联主办、甘肃省侨联承办、甘肃芝诺研学文化产业公司协办
2019.10	泰国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160人参加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秋令营——广西南宁营、广西华侨学校营活动。	中国侨联主办，广西侨联承办

注：本表信息资料主要来自以关键词“泰国华人寻根”进行的百度搜索，涉及中国侨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其中“中国寻根之旅”的信息仅限于由泰国华裔参与的活动。因有些泰国华人到祖籍国寻根的信息并不一定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到，因此难免有一些没有被媒体报道的寻根活动未纳入本表。

以下是中国大陆媒体对泰国老年华裔来到中国寻根的报道，根据该报道的图片可以看出，这批到山西寻根问祖的华裔年纪大多在六十岁以上：

这批来自泰国的旅游观光团由 17 名华人后裔组成，他们的祖辈自清末跟随劳工移民浪潮来到泰国后就一直定居泰国，但从祖辈们的口中得知，他们的祖先是从大槐树迁出来的，因此，大槐树一直是他们所魂牵梦绕的地方。此次有机会回到祖国，他们便把第一站定在了山西，希望能在大槐树找到自己的根，找到先祖们的影子。因此，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仔细的聆听大槐树移民故事，观看移民实景演出，拜祭移民先祖，有的还跟同伴讨论自己的脚小趾甲是不是两瓣等等。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作为华人老家，根祖圣地，圆了这 17 位华人后裔的思乡情、寻根梦。

1

我们发现，有中文交流能力的第二代华人，虽然受已加入泰国国籍、个人经历、家庭和家族已扎根泰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也有较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只是总体上不如第一代华人罢了。我们在曼谷一家潮州会馆门前遇到了一位 66 岁操一口台湾普通话口音的第二代老华人。由于在上世纪中国与泰国外交关系的中断，他在青年时期曾到台湾的淡江大学就读，因此数十年来更多地往返于泰国与台湾之间，但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很快与中国祖籍家乡进行了联系。他说：

我是第二代，是（广东）潮州来的。我老爸是华侨，他是第一代，我是在泰国出生的，所以就是泰国人了。我是华裔，第二代开始就叫华裔。我经常去中国，做生意啦，也去中国的老家，那边还有一些人（亲戚）。我孩子会讲中文，我在家里和老婆讲国语、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讲。我与儿子讲什么话都有，泰国话也讲，我们家每人都会几种话。有些人的孩子不会，那就是各家如何教育了，我们不会都被归化的。我去过南宁，那时是去帮几个华侨到那边搞投资，去了北海，那时还有一个节叫什么“珍珠节”的，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²

第二代华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对中国祖籍家乡的认同有强有弱。有的第二代华人是第一代华人与泰国当地人混血的后代，有的则与泰国当地人联姻并很快融入泰国社会、很少或不再使用中文，因此这个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在中国祖籍家乡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们在普吉遇到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华二代”，她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华血统（母亲是泰国当地人与华人的混血儿），从未学习也不会中文，但可以使用不太标准的英语进行交流。她去过祖先的家乡福建泉州，但没有到过祖先原居住的村落，也没有与那里的亲戚有过联系。这位华裔女士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相对于上述的华二代男士就显明弱得多了³。

3、泰北华人村的老一代华人普遍对中国祖籍家乡有强烈的认同感

泰国北部的清迈府、清莱府、夜丰颂府和达府等沿泰、缅、老边境一带地区的 91 个村落居住着约三十万华侨华人，共有 100 多所华文学校⁴。这些华侨华人部分来自于云南和 1950 年代由

¹ 张东明：“泰国华人后裔大槐树寻根圆思乡梦”，搜狐网，2016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sohu.com/a/71955302_246318。

² 我们正在闲聊之间，有一华裔老太太走过来，用泰国话与他交谈了几句。我们问他为什么潮州人之间不说潮州话？他回答：“因为她习惯讲泰国话了，她可能也不一定会讲潮州话。”据他说，华裔不说中文和中国家乡方言的现象已很普遍，大多数华裔已经不会华语（包括普通话、中国家乡方言）了，由于语言的因素，许多人回到中国寻根的意愿也并不强烈，毕竟语言的障碍会给寻根问祖带来不少困难。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0 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0 日下午，地点：泰国普吉市。

⁴ 有关泰北华人村总人口的问题，目前众说纷纭。一说是 30 万；一说是 60 万；一说是 10 万；还有一说为 23 万多。参见杨文安：“泰北云南华人社会及华文教育探析”，《思想战线》2011 年第 37 卷；禹志云：“对泰北华文教育的思考和建议”，《侨务工作研究》2009 年第 2 期；魏国彬、周伦：“泰北华人村华文教育的发展变迁”，《保山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据我们 2019 年初在泰北的调研（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2 月某日上午，地点：泰国某市；注：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当地一位华文学校校长称泰北总共有 65 个华人村、66 所华文学校。

于历史的原因滞留于这里的原国民党军人及眷属，他们从中国大陆溃逃到了泰、老、缅边境地区，避难于深山野岭，形成了一个主要由华侨华人聚居的“华人村”。¹这三十多万人中不少人已成为加入泰国国籍的华人。

泰国北部华人村是泰国汉语教育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地区²，几乎所有的华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大多数华裔青少年都能阅读和书写中文。老一代和上了年纪的华人大多有较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而华裔新生代青少年虽然一般认为自己是泰国人，自己的祖国就是泰国，对中国祖籍地家乡情感也不如长辈那样强烈。泰北某“华人村”的村长讲述了他父亲对祖籍家乡的深厚情感：

我爸爸十八岁出来当兵，六十多岁回到云南家乡，结果没有人认得他了。到七十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和我妈妈再去中国，他最希望我们一定把他们带到他们的根，他们出生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回到了临沧，到了他的家乡。在回泰国的路上，他跟我说：我在云南老家那边，每天晚上我都流眼泪，因为很多当年出来的人都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啊！³

但泰北华人村中的一些老一代华人尽管思念中国的祖籍家乡，却不一定能像其他地区的老华人那样将这种思念表现为行动。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某“华人村”的一所华文学校的负责人目前已近七十岁，尽管数十年来频繁地往返于泰国与台湾之间，但却一直没有到中国大陆寻根问祖，他说：“我的祖父祖母是云南的，从缅甸过去是很近的，我们老祖宗的祖籍是浙江那边的。但我一直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在泰北地区的华人村，自1950年代多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与台湾来往密切，而与中国大陆的交往直到1990年代后才开始。泰北地区华侨华人在政治上的冲突只是海外国共两党之争的一个缩影，随着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些曾经亲台湾的老一代华人的观念也开始慢慢转变。在我们参观由“台湾侨委会”及台湾各企业捐助扩建某华文中学的仪式上，该校的一位管理人员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区块（指泰北），1949年国共内战，当年在云南两军兄弟相残，血流成河啊。结果我们的最高领导蒋公不忍手足相残，我们战略性地退守到这一区块。五十多年来，也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救助总会以及侨务委员会对我们给予了辅导和协助，包括教育、基础建设和农业辅导，等等。所以我经常说，泰北的华人村的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政府功不可没。对我们的小康生活获得、对我们村的繁荣给予了大量支持，所以这一段情感，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把它淡忘，更不允许任何人把这一段历史磨灭掉。人要面对历史，才能改变现状。⁴

这位学校管理人员说出这番话，足见其对台湾的情感不浅，也很可能是他（以及与他情况类似的老一代华人）过去与台湾官方比较亲近因而至今一直没有到中国大陆寻根问祖的重要原因。而由于上个世纪泰北地区在华文教育主要受台湾方面的影响，大多数第二代华人也与台湾往来较多同时极少与中国大陆有联系，因此指向祖籍家乡观念并不强烈，他们把故乡的情感大多投入到了泰北地区这个生养之地。许多走出泰北地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无论到哪里都对这个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有很强的归属感。

五、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三个国家华人华裔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即老一代（第一代、第二代）华人都有较强烈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而华裔新生代这种观念则明显淡薄。

到中国寻根问祖是华人祖籍家乡观念的外在表现，是值得观察和分析的。自发自费赴中国寻根的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华人、华裔，他们一般都会以寻找或拜访姓氏、家族的“根源”或

¹ 参见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² 泰北地区的华文教育自1950年代至以来的数十年间主要是亲台湾的华人主持和管理。

³ 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某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⁴ 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4日下午，地点：泰国清迈市。

祖先的家乡（祖籍地）为目标，而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寻根活动并不以此为目的，其活动内容由中国方面安排，主要有浏览中国名胜、学习中华文化等。自发、自费的寻根活动相对而言更能体现海外华人华裔对祖籍国的怀念与期盼，赴中国寻根已成为这些人发自内心的需求；而由中国方面安排和资助的“中国寻根之旅”活动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受资助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尽管一些华裔青少年开始时只是带着免费到中国旅游的心态，但经过十天半个月的寻根活动后，他们对中国的“祖乡”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很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加深。华人或华裔的中文交流能力、实际上或潜在地受益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因素都与他们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比较淡薄，尤其是华裔新生代已将住在国出生地视为自己的故乡、家乡，对祖籍国中国和祖籍地的寻根意愿较低；对中国祖籍家乡有较强认同的主要是第一、第二代等老一代华人以及部分其他移民世代的高龄华裔；在赴中国寻根问祖的活动中，华裔精英的表现比普通华裔民众较为突出，或许是因为新闻媒体对前者的关注更多。相较而言，马来西亚华人比泰国、印尼华人具有较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在泰国、印尼华人中占较大比例的大多数华裔新生代由于缺乏中文交流能力和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其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荡然无存。

我们认为，由于老一代华人人口的逐渐消失以及东南亚国家华人新移民所占比例极低，因此这几个国家大多数华人的祖籍家乡观念逐渐本土化（将住在国出生地视为故乡、家乡）并与祖国中国和中国祖籍地渐行渐远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华文教育的复兴、“再华化”现象的兴起、中国有关部门大力开展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及其他致力于拉近新生代华裔与祖国——中国距离的活动，已难以改变这一趋势。

第三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海外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否应该或如何动员这个群体加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业中？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一直存在相互对立的回答和解释，相关经验研究的开展也并不充分。我们认为，如果基本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基础理论缺乏经验事实的检验，不仅有碍于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可能给侨务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问题：海外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将海外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学者为数众多。虽然由中国大陆权威机构组织编撰的大型辞书已将中华民族界定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¹，并没有将已加入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包括在内，但国内许多学者不认同这个定义。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主要生活于中华地域里的以中华文化为纽带而构成的包括 56 个民族以及世界华人在内的民族共同体，不仅包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也包括台湾地区的中国人，还包括祖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根系中一条跨洋越海、绵延不绝的特殊分支”；中华各民族、港澳台同胞及爱国华人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²。《中华民族

¹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定义是：“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总人口 133774.3 万（2005 年），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出版。同时可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版。

² 林其铤：“孙中山‘建设一大中华民族’的理想与廿一世纪华族的团结与联合”，《近代中国》1991 年第 2 期；萧君和：《中华学初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张磊、孔庆榕：《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中

史》的作者史式认为：“在外籍华人中，绝大多数都自认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虽然由于某些现实原因而接受住在国的国籍，但身居海外，魂系中华，只要有机会，总愿意为祖国效力。对于这些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和他们一刀两断，不承认其为中华民族！这不仅缺乏依据，也太不近人情。”¹

上述学者的观点显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采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2014 年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讲话：“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继而又在 2015 年的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广大旅美侨胞一定能够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作出独特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 2015 年在会见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全体代表时也提到：“六千万海外爱国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显然，中国国家领导人已把海外侨胞（即华侨华人）都纳入了中华民族的范畴中，并号召构建一个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球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同样，中国政府的侨务机构不仅视海外华人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将已成为他国公民的华人纳入侨务工作的对象之中。2014 年，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裘援平认为：“国务院侨办作为中国政府专门从事侨务工作的部门，我们的工作对象包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海外的华人华侨虽然有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在我们看来，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²从近年来中国政府侨务机构改革变动方向、工作动态以及相关学者的活跃度和影响力看，此类观点在中国的官方和学术界均占有主导地位。³

然而，持相反观点的国内学者也有不少。早在 1999 年，周南京就曾批评一些国内学者将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不顾华人已从属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客观而仍然希望海外华人永远凝聚在中华民族这个母体上，永远为中华民族服务。”⁴长期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庄国土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书中明确：海外华人已经成为住在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例如新加坡民族、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⁵。两位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周平、任剑涛则把“中华民族”定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民族，前者指出“民族乃一国国民的统称”⁶，后者则具体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严庆：“国家建设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民族报》2018 年 6 月 8 日；王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其构建路径”，《中国民族教育》2018 年第 4 期；冯育林：“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考察及其建设析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孙宜学：“海外华侨华人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搜狐海外网，https://www.sohu.com/a/215703640_115376。张小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¹ 史式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一辑第 40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² 参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zxft/2014dh/node_23957.htm；裘援平：“华人华侨与中国梦”，《求是》2014 年第 6 期。

³ 尽管台湾权威的三民书局版《大辞典》也明确中华民族“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但由于台湾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其编纂的《华侨总志》甚至将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华裔归入“华侨”的范畴中，也视之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自然就是台湾官方的观点，因此也与中国大陆一样，其侨务机构也将已加入他国国籍的华人作为工作的对象。参见（台）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华侨总志》1978 年版。

⁴ 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载于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版。

⁵ 庄国土指出“为了避免因当代民族概念的多重规定性引发的困扰和敏感，在一般情况下，我将华人群体和汉族称为华人或华裔族群（ethnic Chinese group），从而与当代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相区别，尽管再者在空间上是交叉并在的，如：华裔族群既是跨国界的种族文化群体，但在国家民族的意义上，各地华人又构成其国家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新加坡民族、美利坚民族。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华民族是在现阶段是多元民族的总称，是由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国家民族意义组成的。”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 10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⁶ 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1 年第 5 期；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 年第 1

指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境内 56 个已经识别完成的社会民族与 400 余个有待识别的准社会民族¹。马戎则反对将海外华人称为“中华民族成员”，认为“如果中国的使领馆和报刊宣传仍然称他们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华儿女’，鼓励他们参与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如中国国庆日升国旗），那显然是不适宜的，也一定会引起住在国政府和民众的疑虑。”²

综上所述，当前无论是在学术概念界定上还是在侨务实践领域都存在许多已引发争议的模糊地带，亟需我们进一步辨析基本概念、完善理论逻辑并加强相关的经验研究。尽管中国政府已将海外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并进入了实际操作，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已不能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尤其需要探究的是，这种界定以及相应的侨务政策及其操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何去防范其中的负面影响并调整相关的应对策略。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基于大量的研究文献和我们从东南亚一些国家收集到的有关当地华人对中华民族、中国的认知资料。对“中华民族”等核心概念的辨析需要参考来自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 and 经验研究文献。近年来，我们围绕这些问题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开展了调研，获得比较一些口述史访谈资料、华文报刊资料和侨社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和文献资料是我们开展相关经验研究并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的基础。

二、泰、马、印尼华人眼中的中华民族

东南亚华人是否认为华人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哪些华人自视为中华民族成员？经过对相关研究文献和实地调研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东南亚华人对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否定、肯定和不关心。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来自于学术界精英，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各国华人社团的精英，而对这些问题不关心的主要是大多数华裔普通民众。

1、东南亚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在海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王赓武一直以来并不赞同将海外华人纳入中华民族之中。王赓武早在上世纪末便开始在有关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著述和演讲中，多次强调应关注海外华人身份认同及其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他“反对‘大中华’一词把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包括在内”，反对将华侨与华人混淆³，而且明确指出“海外的中华民族”只包括华侨在内⁴。他批评中国某些政府官员，认为他们错误地将华侨与华人、华人与中国人“混淆”，并习惯用中国血统、炎黄子孙的种族符号来试图将中国与海外华人联结成一个跨国的共同体：

官员们很专业地忙于邀请炎黄子孙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想要用有华人血统即是中国人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将会逐渐销蚀他们使自己的华人社区完全忠诚于他们移民去的国家的努力。……很多外国政府对这一政治联结非常敏感，他们认为自己国内作为炎黄子孙的公民不像别的移民，因此不得不加以区别对待。⁵

马来西亚籍华裔、曾担任世界华侨华人协会主席的著名人类学家陈志明也直接回应了海外华人是否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问题，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华裔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生活经验塑造了他们的态度与认同。这些经验曾经并将继续引导他们远离“龙”的认同。与力图统一各地黑人的泛非洲运动不同，华裔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已远离大中华的种族认同。他们可能仍旧是华人，但只是作为国家社会中的一个族群，而不是中国民

期。

¹ 任剑涛：“从‘民族国家’理解‘中华民族’”，《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² 马戎：“如何认识‘跨境民族’？”，《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³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载于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社会与经济》，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丛书第八种，1994年。亦可参见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第267-28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⁴ 王赓武、刘宏等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第131页，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

⁵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第351-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族（原文为“Chinese nation”，笔者认为应译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¹

在相关著述中陈志明多次提及不同国家的华人并非同一个族群（ethnic group），更非同一个民族（nation），也不存在全球华人的共同体（community）²。他分析道：

族群的产生和族群的认同鲜明地与国家以及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相关联。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马来人由于与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各自的认同，也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因而成为不同的民族。

新加坡的华人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区分是另一个可以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中予以考虑的有趣的事例。由于他们与不同的国家形成了认同，马来西亚的华人和新加坡的华人今天都自视为不同的人。他们是不同的群体，其差异源于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参与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的形成。

不同国家存在的华人群体并没有组成一个族群，他们也不属一个统一的民族。但是，作为与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联系的人，不同国家的华人可以在人际关系的层次上找到某种认同的文化基础。笔者已提议将这种不以国籍为依据的族群划分称为“文明性族群现象（civilizational ethnicity）”³。

另一位在印尼出生、同样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廖建裕也对官方将华人纳入中华民族表示质疑和批评。在近年出版的《中国崛起与海外华人》一书中，他用较大的篇幅对中国官方的侨务工作提出了批评。他列举了许多因中国各级政府某些官员的“不当言行”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引发的负面事件，认为中国官方有意模糊了华侨（Chinese nationals）与华人或华裔（foreign citizen of Chinese descent）的区分，并将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华人纳入中华民族成员（member of Chinese nation）之中而不顾及他们的国民身份，从而导致了住在国官方和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弹以及部分华人的不安⁴。

总之，上述对华侨华人问题有深厚研究的东南亚华裔学者对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用中华血统或华夏种族来把海外华人与中国人、与中华民族联结在一起的做法十分敏感，认为这种做法会误导中国的政策、影响华人对住在国的忠诚乃至引发外交纠纷并可能对国际关系造成不利的影响。

不过，持有“华人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的东南亚学者还是有的。近年在台湾留学过并受台湾官方和学术界观点影响的马来西亚青年学者李慧易就持有这种观点，她在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领袖如何回应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将马来西亚华人称为“仍是中华民族的马来西亚华人”。⁵由于台湾官方承认“双重国籍”，无论台湾官方还是学术界都把海外华人当作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她受台湾学术界的影响在所难免，但这种观点并非东南亚华人学者群的主流观点，相较于上述学者而言其在东南亚学术界的影响甚微。

2、东南亚华人社团部分精英人士的观点

¹ 陈志明（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第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版。

² Tan Chee-Beng, 1997.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M. Jocelyn Armstrong, R. Warwick Armstrong, K. Mulliner, 2001.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dentities,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Routledge; 陈志明（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

³ 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6期。

⁴ Leo Suryadinata. 2017.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⁵ 参见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86页，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15年。

或许是因为东南亚学术界的相关观点对各国社会舆论的影响并不大，华人社团精英的观念与学术界的观点迥然不同。泰、马、印三国的华人社团中一些老一代精英人士不仅丝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而且还在公共媒体中表示华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曾是新加坡反对党领袖、新加坡华文促进会秘书长的邓亮洪认为：“我坚决认为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都属中华民族。”¹这位新加坡政治人物曾激烈反对李光耀的“去华文化”政策，大力主张发扬中华文化，因其作为反对党言行过于激烈，在新加坡政坛引发巨大争议，并多次遭其国内媒体指为“反基督教、危险人物、大汉沙文主义者”。声名显赫的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星洲日报》社长和华人社团领袖张晓卿也在自家的华文报纸上撰文宣称：

我们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和苦难之后，我们渴望的，是民族的强盛和文化的复兴。虽然我们散居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但是不管我们身在哪一个国度，只要我们的血脉紧紧相连，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是团结一个族群最有力的依据。²

泰国老一代华人中也有许多人自视为中华民族成员。泰北地区一位华文学校的校长在谈及泰国华人与中国政府、台湾当局的关系时说：“大家都是同种同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要向前看，中华民族只能团结，不能分裂”³。在泰国某市，一位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主任对我们说：中国周边国家华侨华人的影响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如果我们去将他们动员起来，把他们都纳入中华民族里面去，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会是比较快的⁴。长期在中国广东生活并接受过中国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相关培训经历很可能影响了这位第二代华裔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与许多马来西亚、泰国的华人社团精英人士的观点迥异，我们访谈过的印尼华社精英大多认为华人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是印尼民族中的一支。这很可能是因为印尼经历了比许多东南亚国家更严酷的官方的强制同化政策和全国性排华运动，印尼华人对国家认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位第二代华裔、某华人社团的精英说：

我认为我们华人是印尼民族中的一支——华族，我们也要为印尼国家做出我们华族应有贡献，这也是我们义务。我们的孩子可能想法与我们不一样，但我们对于中国的事情，我们也有义务做一些贡献，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加入印尼籍了，但我们的祖籍国还是中国。⁵

某华人社团的一位负责人则说：

我们已经是印度尼西亚国籍了，我们确定我们的国家政府就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是印尼的华族，是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华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我们所传承的中华文化是符合印尼的国家需要的。⁶

而另一些印尼华社精英人士的反应就显得十分谨慎，有些甚至有意回避。以下是我们与印尼某姓氏宗亲总会的会长的一段对话：

¹ 史式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第一辑第4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² 张晓卿：“塑造新民族气质内涵·华裔须具新思维”，《星洲日报》2015年3月8日。

³ 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某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⁴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某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是国务院侨办8项惠侨计划之一，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于2014年3月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对媒体表示将在全球侨胞人数十万人以上的聚居地建立60个“华助中心”，自同年9月在北京揭牌以后，已在海外各地陆续落地，包括加拿大、美国、日本、菲律宾、意大利等国挂牌，在海外华侨华人聚集地落地开花。其目的是为海外侨胞提供更多雪中送炭的服务，让更多侨胞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https://www.chineseciviccenter.org/ocsc_index.html。

⁵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晚上，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⁶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晚上，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问：您是否认为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答：中华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等这些少数民族，但炎黄子孙却不包括他们了，后者主要指汉族。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基督教，如果写佛教的话是不能做企业家的。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为了做事。为我们子孙后代，做这个宗亲会。有人说我是笨蛋。人啊，做好事就有好报。¹

这位宗亲总会会长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与印尼之间，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也深刻体会历史上印尼排华对华人带来的伤害。因此在面对这个“敏感问题”时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这种对身份认同问题的高度敏感，也表现在赴中国寻根问祖的华社精英中，“中国人”、“祖国”以及“中华民族”，这些在他们作为印尼华侨的时代所避讳的词语，一些印尼华社精英十分谨慎，不再使用，而且会有意识地表明自己的作为印尼人的国民身份：

世界福清社团第一常务副主席、印尼新中校友基金会主席何文金从2012年就开始组织印尼华裔青少年来福清开展文化游学，至今已第8个年头。作为出生于海外的福清人，何文金此次带着自己创办的印尼新中三语学校的117名优秀毕业生们，再一次回到福清，他表示心里非常兴奋与满足。“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印尼，我更爱我的祖籍家乡福清，我要通过我的努力，让我们海外的子孙‘寻缘祖地’，让他们真正深入了解我们的福地——福清。”²

印尼雅加达龙岩同乡会会长黄志祥伉俪、理事长刘善强伉俪、陈达民伉俪、张南山、邓策榕、郭志辉伉俪、卢泗川伉俪及团长黄新强伉俪等一行在参加2016年11月4日至7日在龙岩新罗区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龙岩同乡垦亲联谊会后，由龙岩博物馆馆长张兆声陪同参观了龙岩华侨历史博物馆。黄志祥表示，我们现在已是落叶归根，热爱印度尼西亚，祖籍国已是我们的婆家，我们已是嫁出去的女儿，今是回娘家，探望祖籍家乡人。³

但当身处中华大地、在祖籍地家乡热烈的氛围下，一些印尼华裔精英的身份认同表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将自己视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成员或将中国称为祖国的情况时常出现在寻根活动中：

孙秀源是山东省旅印尼山东同乡组织中德高望重、备受拥戴的老侨领，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侨务事业发展和家乡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爱乡情怀。他说，由于历史原因，自己的儿女大都不会说中国话，现在祖（籍）国强大了，海外华人的地位也高了，都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更以中国的繁荣富强而感到自豪。我不想再让第三代不会说中国话，这次带儿孙回故乡，就是想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亲身感受中国的发展、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明白自己永远是中国人。⁴

（印尼华人陈腾安说）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坚守着“家国一体”的情感传承。作为华侨，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来处，我们要明白自己“根”在哪；放眼未来，我们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⁵

综上所述，泰、马、印三国华人社团部分精英人士对“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这一问题的反应存在很大的差异。据我们访谈的情况看，印尼华社精英人士大多否定了“华人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说法（而据上述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另一些印尼华社精英人士在中国寻根问祖时却有不同表述）；而马来西亚、泰国的华社精英人士则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回答，反映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当然，我们在每个国家访谈的华裔精英人士一般只有十多个，因此这些访谈的情况只能作为我们作出相应判断的参考，不足以推论到总体。

¹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晚上，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² “印尼华裔青少年福清‘寻根’”，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21450508_120046962。

³ 明光：“热爱印尼 饮水思源 寻根问祖”，印尼《国际日报》2016年11月19日A2版。

⁴ “印尼侨领回山东寻根：不想让第三代不会说中国话”，中国新闻网，2011年7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1/07-11/3173105.shtml>。

⁵ 齐思、黄寅生、陈薜薇：“印尼华侨陈腾安：追寻家国情怀，促进民心相通”，2019年5月22日，海外网，<http://qiaojie.haiwainet.cn/n/2019/0522/c3543460-31561785.html>。笔者注：这几位中国记者误将陈腾安视为华侨，其实陈腾安已加入印尼国籍，应为印尼华人。

3、普通华裔民众的看法

具有中华血统的马来西亚公民极少有人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而这种情况在印尼、泰国则不同。如果按廖建裕推测的印尼华人人口只有 247 万计，具有中华血统的印尼公民中仅有五分之一左右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¹。不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公开地将自己视为中国人或中华民族成员。泰国华裔的情况更是如此。

问题是，当对那些不能使用中文交流的印尼和泰国华裔新生代进行访谈，问及他们是不是“member of Chinese nation”（中华民族成员）时，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否定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少能够领会“nation”一词的国家指向或政治涵义。而对于那些中文能力较强的华裔而言，“民族”的概念意义就太过于宽泛了，因此他们的回答就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华人，但并非中华民族成员，因为自己已经是住在国的公民；而另一些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涵义并不十分清楚，并将它与“炎黄子孙”等同，因此自然认为自己就是中华民族成员：

置身在（中国）那一片土地上，却有一种说也说不清的熟悉感，因为那里的同胞与我们有着共同的肤色、语言、文化，大家身上流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²

将“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联系在一起甚至将它们等同起来进行理解，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普通华裔民众中是常见的，这种看法也时常出现在报端：

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姓氏，搭配上父母为我们取的名字，就变成了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姓名！姓氏对我们华族而言无比的重要，是我们寻根念祖的“指标”，但马来西亚部分的华人在时代的变迁下已逐渐“变质”，连自己的姓氏与名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不论我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们都是华人，这点身为“龙的传人”的我们都必须清楚明白！倘若你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怎么写，又怎么能配得上华人的身份！³

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华裔头脑中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有中华血统，那么就是中华民族成员。一位现年五十多岁的马来西亚第三代华裔对“中华民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人”、“祖国”等概念是这样理解的：

在潜意识里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马来人老是叫我们华人滚回唐山去。他们这么一叫，让我们潜意识里就有了我是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与我是什么关系呢？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祖父祖母从中国来，我父亲在马来西亚出生，我算是第二代（笔者注：应是第三代）。中国强大我也是感到骄傲的，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血统是中国的，我父母亲都是中国人，我是纯正的中国血统，所以中国就是我的祖国。⁴

东南亚那些有较强华人身份认同的普通民众自视为中华民族成员，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等概念混淆在一起，没有弄清“中华民族”的真正涵义。倘若我们把“中华民族”的概念用“Chinese nation”或“中国的国族”来替代，或明确地将它定义为中国人或中国的政治民族（这是中国权威辞典和国内外许多知名学者的界定，见前述），那么绝大多数东南亚华裔将会否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以下是一段由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撰写的文字，可能表达了许多东南亚华裔在身份认同涉及到中国、中国人或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时的顾虑，也表达了自己在政治上忠诚于住在国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

近日中国媒体来马邀请多位老少大马华人参与拍摄纪录片，我也参与其中。该纪录片主题围绕大马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文化和传承，以不同的角度来陈述大马华人繁衍发展，并为大马的经济与和平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¹ 廖建裕：“印尼华人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印尼《国际日报》2019年8月8日A7版。

² 吴嘉雯：“寻根”，《星洲日报》2019年7月19日。

³ 陈孔炎：“是华人就要懂华文！”，《星洲日报》2016年8月13日。

⁴ 访谈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槟城。

在结束拍摄前，制作团队要每人口说“我来自中国”，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毕竟在整个拍摄过程，纪录片所陈述是大马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没忘记本身的祖籍，更没有淡忘本身祖先飘洋过海下南洋的艰苦。

“我来自中国”这5个字给许多参与拍摄者是一种我们的血脉和文化都来自中国，我们是龙的传人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大马人，而不是在表达我们是中国人，因此大家都才觉得没不妥。但后来觉得这容易引起误解，和一些大马极端政客或网民会断章取义，我要求重录这一句话变成“我曾曾祖父来自中国”。

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些后裔已是道道地地的大马人。虽说是大马人，但也不能忘却自己的根，因此大马一些籍贯会馆每年都会主办寻根之旅，去到祖先的出生地，以了解自己的祖籍和历史背景。

在最早期的华人下南洋，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大马，当时他们对身份的变迁，是难以适应，心还是向着中国，但新一代华人在大马土生土长，也早已不存在这问题，反而却带着承传中华文化与习俗的使命，以让这精神可以保存。

目前新一代华人扎根在大马，也已把这国家当作是家园，并不存在身份认同的质疑，对这国家已是一片效忠与贡献。从独立前后，到大马今年能够走到独立60年，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大马华人与其他友族携手走过这艰苦岁月。大马华人有国家认同，也手持公民权，也是土生土长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大马人，这已是不容质疑的。因此当大马极端政客一再挑起大马华人身份认同，和大马华人应该回中国，这是荒唐的事。¹

从理论上说，马来西亚华人效忠于马来西亚，这是一种国家认同或“国族”认同（national indentity），即是对马来西亚民族共同体（Malaysian national community）或马来西亚人的认同。只要明确“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政治民族的定义，那么他们大多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或中国人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经过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观念和理解差异较大：有人将中华民族视作中国的政治民族或国族（nation），而另一部分人则视之为华夏种族或炎黄子孙（race），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些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华裔大多是老一代华人、华裔新生代中中文能力较强者和具有较强烈华人身份认同的人。而那些具有中华血统者但“华人性”（Chineseness）却严重弱化的²，则往往已不认同华人的身份，也不会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成员。

三、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与中国人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具有中华血统、同为炎黄子孙，自然使人们认为“全球华人是一家”，意即全球华人实际上已形成一个跨国界的、以共同血缘和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不少中国学者将之称为“包括世界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详见前述）。在这里，我们不妨撇开学术界关于是否存在这种跨国界共同体的争议³，探讨一下在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不同群体的观念与行为：东南亚华裔如何

¹ 苏德洲：“马来西亚华人”，《星洲日报》2017年8月11日。

² 所谓的“华人性”是指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族裔所没有的特性。王赓武认为：华人从未有过认同的概念，而只有华人属性的概念，也就是身为华人和变得不像华人；有些华人中国味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³ 如前所述，陈志明认为并不存在全球性的华人共同体。参见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6期。Tan Chee-Beng, 1997.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M. Jocelyn Armstrong, R. Warwick Armstrong, K. Mulliner, 2001.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dentities,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Routledge; 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

理解自己与中国人的关系？他们是否有与中国人积极交往的动力？他们是否与中国具有共同体的意识？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对 2012 年的一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¹，结果发现东南亚华裔学生将来自于其住在国的非华裔学生视为共同体，并与之交往密切，而与中国大陆学生之间则存在明显的疏离，并被视作“他者”。这一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华裔新生代很可能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缺乏跨国界共同体的认同。

表 3-1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问卷调查样本分布

国别	人数 (n=)	回答是否华裔样本					
		回答是否 华裔人数 (n=)	占该项总 样本量的 比例 (%)	华裔		非华裔	
				人数 (n=)	占本国样本量 的比例 (%)	人数 (n=)	占本国样本量 的比例 (%)
文莱	5	5	0.4	3	60	2	40
缅甸	56	52	4.7	41	78.8	11	21.2
柬埔寨	30	25	2.2	8	32.0	17	68.0
印尼	250	223	20	180	80.7	43	19.3
老挝	67	41	3.7	18	43.9	23	56.1
马来西亚	120	119	10.7	117	98.3	2	1.7
菲律宾	27	27	2.4	21	77.8	6	22.2
新加坡	15	15	1.3	15	100	0	0
泰国	219	177	15.8	82	46.3	95	53.7
越南	400	326	29.2	29	8.9	297	91.1
合计	1189	1117	100	514	50.9	496	49.1

注：表中未明确是否华裔身份的有 72 人，占总样本数的 6.05%。

该调查问卷设置了一张表格要求东南亚留学生填写他们在中国院校就读期间交往的十个最好朋友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朋友的国籍、性别、与自己的关系、交往方式与频率等。通过这个表格的信息，我们试图了解他们朋友圈的一些具体信息，更重要的是了解在其列举的十个朋友中是否有中国大陆人。“十个最好朋友”中，中国大陆人人数越多，就表明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的交往越广；反之，如果“十个最好朋友”中无一或较少中国大陆人，则表明他们与中国大陆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往障碍（参见表 3-2）。

表 3-2 东南亚留学生在华期间结交朋友的情况

被访者来源国 (样本量)	您在中国留学期间结交的十个最好朋友中，是否有下列国家或地区的朋友？							
	本国		中国大陆		中国港澳台		其他东南亚国家	
	有	%	有	%	有	%	有	%
文莱 (n=5)	1	20.0	1	20.0	1	20.0	3	60.0
缅甸 (n=56)	41	73.2	20	35.7	4	7.1	38	67.9
柬埔寨 (n=30)	20	66.7	9	30.0	2	6.7	19	63.3
印尼 (n=250)	199	79.6	65	26.0	20	8.0	136	54.4
老挝 (n=67)	52	77.6	21	31.3	10	14.9	57	85.1
马来西亚 (n=120)	99	82.5	36	30.0	15	12.5	56	46.7
菲律宾 (n=27)	19	70.4	4	14.8	0	0.0	15	55.6
新加坡 (n=15)	7	46.7	6	40.0	0	0.0	12	80.0
泰国 (n=219)	185	84.5	74	33.8	12	5.5	148	67.6
越南 (n=400)	289	72.3	124	31.0	33	8.3	154	38.5
十国合计 (n=1189)	912	76.7	360	30.3	97	8.2	638	53.7

注：因每位留学生可能同时拥有多位各国朋友，所以表中的百分比不应按100%进行总加统计。

鉴于问卷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调查组还从问卷填写者中选取 70 多位东南亚留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同时还访谈了一些担任学生干部的中国大陆学生、相关老师以及对东南

¹ 这项问卷调查选取了两广东南亚留学生较多的 15 所学校作为样本院校。收回有效问卷 1189 份，来自东南亚 10 个国家的留学生。有 1149 名留学生填答了性别，其中，男性 479 人占 41.7%，女性 670 人占 58.3%（参见表 3-1）。

亚留学生有所接触者等人员，通过适当追问的方式收集更详细的资料，以增加统计数据分析的解释力。

在对问卷数据进行的统计模型中，因变量为“十个最好的朋友中是否有中国大陆人”，由于这个因变量属于二分变量，因此我们选择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客观交往条件限制（主要通过“是否与中国大陆人同住”来测量，“同住”赋值为 1，“不同住”则赋值为 0）、来华时间长短、来华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等因素成为制约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之间交友的主要因素，而华裔学生更倾向于与中国大陆人交友的假设没有获得数据的支持（参见表 3-3）。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者常常认为，尽管东南亚华裔与中国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仍能够将他们联系起来，使其对中国人存在“血脉相连”的华夏族群认同的潜意识。因此，华夏血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世界各地的华人与中国居民存在“血浓于水”的亲近感。¹但问卷数据和个案访谈资料均表明，东南亚来华留学的华裔学生并未明显表现出这种情感，相反，他们所认同的群体主要是来自于其住在国的非华裔学生，并不包括中国大陆人在内。

表 3-3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是否华裔”在统计检验中并不显著，表明华裔留学生在面对本国非华裔学生、其他国家学生和中国学生等多个不同群体时，“更倾向于与中国人交往”的假设没有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个案访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一位具有中华血统的泰国学生谈到，自己在泰国并没有被他人看作是华人或华裔，实际上具有中华血统的人大多数已经与其他泰国主流群体融为一体，即便到了中国，他们仍自称为泰国人而非“华人”。他认为自己与中国人之间实际上并不是同属于一个群体，因此更倾向于与本国学生交友。而尽管印尼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在印尼时并不经常往来，但到了中国后却往往成为好朋友。暨南大学一位印尼华裔学生对笔者说：“我在印尼时从来没有和土著孩子一起玩过，也没有土著好朋友。可是来到中国后，却与印尼土著居民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印尼人呀。”一位暨南大学外招生学生会干部对笔者说：“在暨南大学，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东南亚留学生都喜欢同本国同学玩在一起，并在 QQ 群里发布各种信息，讨论相关问题。印尼同学，不管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很团结，经常一起活动。”由此可见，各国留学生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已经超越了对华人群体的认同，或者说，海外华裔学生与中国大陆学生、居民之间并不明显地存在跨国界的华人群体认同。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不少东南亚华裔学生在评价中国大陆学生或居民时，常将“你们中国人”挂在嘴边，并表示“中国学生与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我们与留学生更谈得来。”中国大陆学生也并不把华裔学生与其他东南亚留学生明显地区分开，而是将他们都看成外国留学生。显然，中国大陆学生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群体边界。

这种国民认同使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形成了某种凝聚力，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对本国同胞产生认同，将本国的非华裔成员看作是他们“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的一部分，而华人血统或华裔身份并未使他们将中国大陆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东南亚留学生在华期间积极参加母国社团活动。有 1174 位留学生回答了在华期间是否参加母国社团活动，其中有 494 人（42.1%）参加了母国留学生会，52 人（4.4%）参加了母国商会，71 人（6.0%）参加了母国的其他团体，共有 52.5% 的留学生参加了母国社团活动。东南亚各国留学生会经常举行联谊活动，有利于同一来源国的留学生相互认识，结交朋友，从而通过本国人的互动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

两广地区的东南亚留学生不仅成立本国留学生会，经常开展活动，而且来源国使馆也经常召集本国留学生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训话和聚餐，一些国家还资助本国留学生出版留学生会刊，刊

¹ 韩震：《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认同的特点》，载《扬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登母国新闻和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凝聚本国留学生。越南驻广州领事馆就经常召集在广州的越南留学生举行各种活动，资助留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并有相关的纪律约束。有一次我们曾想请一位越南学生帮助发放问卷，她却说：“老师，很抱歉，我不能帮助您，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帮中国人做事。”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留学生协会干部中国梁同学说：“学生会搞活动时需要中方组织者直接到留学生宿舍楼下接人，留学生一般不会单独赴约，联系一个东盟同学通常会来好几个。越南同学的政治敏感度较高，来华后都想到中国各地旅游，但很少一个人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东南亚国家相关机构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这种民间交往中的“国家在场”，主观上是为了凝聚和管束本国留学生，但是在客观上却阻碍了留学生与中国人的交往，不利于他们与中国人交朋友，不利于他们尽快地了解中国社会。

“是否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这一变量同样不显著，说明东南亚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并不会促使他们更愿意亲近中国人并积极地与中国学生交友。这个变量与“是否华裔”的变量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绝大多数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都是华裔。

表 3-3 影响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交友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B	Sig	Exp (B)
性别 (男=1)	-.325	.125	.722
宗教信仰 (信仰伊斯兰教=1)	-.059	.925	.943
华裔身份 (华裔=1)	-.070	.770	.932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 (是=1)	.220	.363	1.246
与中国大陆人同住 (是=1)	.498	.075	1.645
加入学校或院系学生会 (是=1)	.485	.028	1.624
来华时间 (以来华学期数为计)	.184	.024	1.202
汉语水平 (以高、中、低为计)	.137	.406	1.147
来华后对中国大陆国民素质的评价 (0-10 分)	.107	.020	1.113
常数项	-2.382	.000	.092
Chi-square		28.011	
-2 Log likelihood		571.804	
Cox and Snell R Square		.056	
样本量		1189	

注：因变量为“十个最好的朋友中是否有中国大陆人”。

“汉语水平”也在统计检验中不显著，说明汉语水平并不影响中外学生之间的交往。虽然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汉语水平明显高于非华裔学生，如马来西亚华裔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他们大多并不喜欢与中国大陆人交往。实际上，由于中国大陆学生和东南亚留学生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外学生之间的交往大多使用跨国界的“公共语言”——英语。因此，中外学生之间的交往并不受汉语水平的影响。

其次，是否参加学校学生会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是否参加学生会组织” ($p=0.028$)、“是否与中国大陆学生同住” ($p=0.075$)、“来华时间” ($p=0.024$) 以及“来华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 ($p=0.020$) 等变量均比较显著。前两个变量主要测量的是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学生之间的客观社会交往条件，参加校级或院系级的学生会组织意味着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学生将在共同的学生组织合作，比其他未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大多数学生有更多的跨国交往机会。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是否参加学生会组织”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485，发生比率为 1.624，表示加入校级或院系级学生会的东南亚留学生有更多的与中国大陆人交友的可能性，与中国大陆人交友的发生比是没有加入学生会的东南亚学生的 1.624 倍。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留学生都愿意加入学生会，其中也只有很小一部分学生有机会成为学生会干部，绝大多数学生缺乏这样的机会，这也是导致中国大陆学生与东南亚留学生之间交友比例较低的原因之

一。

中外学生生活习惯存在显著差异，也可能是制约他们之间社会交往的因素之一。不过，由于问卷设计的疏忽，漏掉了这方面的问题，无法进行定量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做一些补充性解释。例如，当访谈中问及为何所填的十个最好朋友中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学生时，一位在广州就读的马来西亚华裔女留学生解释说：“因为我们留学生在生活习惯上差不多。而与大陆同学没有共同的话题，看法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比如，我们留学生喜欢聊天，有时中午聊天，会有笑声，但是隔壁的大陆同学就来敲门，很凶地说‘你们安静一点，别影响我们睡觉。’可是中午我们是不睡觉的呀。还有其他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们与港澳同学就有一些共同语言，还谈得来。”这个访谈个案提示我们：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影响中外学生之间社会交往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需要今后进一步调查和探讨。

通过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东南亚华裔学生在中国期间有多种社会交往圈，不同程度地构建了相关的跨国社会网络，主要有东南亚留学生与本国之间、东南亚各国留学生之间、东南亚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之间、东南亚留学生与其他境外留学生之间等的跨国社会网络，其中，留学生与本国之间构建的社会网络最大，而留学生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汉语水平高低、华裔身份等因素与东南亚留学生是否更倾向于与中国大陆人交友之间没有相关关系，换言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并不比非华裔留学生更喜欢与中国大陆人交友。而且，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也并不会促使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更愿意与中国大陆人交友。两广地区院校的东南亚各国留学生人数大多以国别为单位开展活动，各国驻华使馆经常举行的本国留学生活动，也有利于增强其本国留学生群体的内聚力。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和通信的便捷也使留学生能够随时保持与母国的联系，客观上抑制了他们与异国学生构建新的社会网络的需求。而中外学生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抑制了东南亚华裔学生对与中国大陆人的交往意愿。上述多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东南亚华裔学生与中国大陆人的深入交往。

我们认为，东南亚华裔不会因为具有共同的中华血统而产生与中国人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意识，他们对“我群（或我族）”和“他群（或他族）”的建构主要受民族（国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影响。即便是具有相同血统、文化同源、风习相近的种族群体，由于身处不同的国家，也会由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产生我族（群）与他族（群）之分。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疆域、边界的界定往往能够产生身份认同。获得共同治理、接受共同教育、参与或应对相同的权力中心，单单这一事实便超越了共同归属的表象，产生并强化着一种共同身份的情感。还有什么比西方殖民者在非洲任意划分的、切断族群归属的边界更加人为呢？然而，当新独立国家依照此边界获得独立之后，无论其内在不稳定性如何，仍然都维持了下来。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总有国土稳定完整萦绕于怀，还因为联合国也希望其成员国保持长期稳定，更因为一种国家归属情感也随着时间同样发展出来。”¹这与陈志明所认为的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分属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的情况也是相似的。具有相同血统的人群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其身份认同或共同体认同也处于变迁之中，他们之间很可能会因民族国家疆界的分隔而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形成在心理归属上截然不同的群体。

四、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在海外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问题上，东南亚华人的理解和观念差异较大。有人将中华民族视作中国的政治民族或国族，而另一部分人则视之为华夏种族或炎黄子孙，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些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华裔大多是老一代华人、一部分华裔新生代中文交流能力较强者和具有较强烈华人身份认同的人。而那些具有中华血统但华人身份

¹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第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认同意识较弱与不认同华人身份的人，也没有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成员。泰、马、印三国的华人社团中一些老一代精英人士不仅丝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自豪感，而且还在公共媒体中呼吁华人凝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精英表现最为突出。在这三个国家中，多数普通华裔受访者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认知模糊，并对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缺乏兴趣。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则表明，东南亚华裔学生与中国学生（或公民）之间普遍缺乏亲近感和“同胞”认同，但却与来自于本国的其他种族学生存在较强的共同体意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华裔新生代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一些在东南亚国家深具学术影响的华裔学者与不少华人社团精英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东南亚华人已经成为住在国民族（如马来西亚民族）的一部分，而中华民族仅包括中国公民（含海外华侨）在内，海外华人并非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第四章 华人眼中的“中国梦”

本章主要根据我们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实地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描述和分析，展现东南亚华人眼中的“中国梦”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评价，进而探讨在中国崛起的新时期东南亚华人对当代中国以及对自身与当代中国关系认知的转变。

一、问题：东南亚华人如何回应“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2012 年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4 年，他又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¹

这些讲话引发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海外侨胞（包括华侨华人）被认为是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2014 年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裘援平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

要以中国梦引领侨务工作，必须促进中国梦与侨胞梦有机结合。中国梦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福祉和共同追求，是最能激起华侨华人强烈共鸣的精神旗帜。要把华侨华人振兴中华的强烈意愿与实现中国梦更好地对接起来，以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为主线，深入阐释中国梦丰富的时代内涵，最大限度地唤起华侨华人的爱国爱乡热忱，最大限度地增强华侨华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最大限度地激励华侨华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把华侨华人过上美好生活的个人愿望与实现中国梦更好地对接起来。积极引导华侨华人深刻认识中国梦与个人梦、国家梦、民族梦的内在关联。²

显而易见，从国家首脑到侨务机构，中国官方已掀起了一场动员海外华侨华人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潮。而这些海外的“中华儿女”（海外侨胞）中的大部分已经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理应在政治上效忠于各自的国家。以这样的特殊国民身份，海外华人将采取何种态度与行动回应中国方面的“中国梦”呼吁？曾放弃印尼国籍回国任职的北京大学退休

¹ 习近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63-64 页，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

² 裘援平：“华人华侨与中国梦”，《求是》2014 年第 6 期。

教授、海外华人研究专家梁英明在 2016 年受访时指出：中国向东南亚华人招手时，应对他们的国籍和政治归属有一定的敏感，也要理智看待华人的立场，不能要求拥有外国国籍的华人和中国公民有一样的立场和观点¹。而曾是印尼华侨，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南京先生尽管没有直接谈及“中国梦”的话题，但他在上世纪末早已发表了相关的评论：

这个理论（“中华民族重要宝库论”）认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人才资源宝库，应予十分珍惜。面向新世纪，中国要把华侨华人作为民族振兴伟业的一个富贵民族资源加以培养。……如果局限于华侨（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这个理论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就政治和法律而言，华人已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是不同国度的少数民族（只有在新加坡是多数民族），是美利坚民族、菲律宾民族、马来民族、泰国民族等等外国民族的组成部分。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华人少数民族是各该国的富贵财富。于是自然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华人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是哪一个民族的重要宝库？华人究竟应该为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民族服务？华人应该效忠于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民族？……外籍华人由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宗教背景不同而十分复杂，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与中国的距离远近也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原本就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笼统化、模糊化，而不去考虑别人的利益和感受，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呢？这些做法不免使人隐约地感觉到，有些人期望着乘中国崛起的东风，重新建造全球华人大家庭，以利于国家飞黄腾达于世界民族之林。²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刘宏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可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道路）、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国精神）、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国力量）的三个重要领域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强调了华侨与华人在践行“中国梦”时的区分：

华侨是中国公民，政治上认同并效忠中国；“中国梦”代表了他们的祖国的强大、富强和统一，他们是华侨华人践行“中国梦”的主体。而海外华人已经是外国公民，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效忠对象是其居住国，他们与“中国梦”的联系主要是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他们可能是“中国梦”理念的接受者（主动或被动），小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出生成长的新移民）可能成为实践者，但不可能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践行者。此外，还有一部分海外华人，虽然在种族上是华人，但其政治、文化和族群认同已完全在地化，对中华文化并不认同。我们既要承认这一现实，同时也要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这部分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会增强，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文化分子。³

在中国官方、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大多将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并统称为“侨胞”的背景下，刘宏将华侨与华人分开论述他们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这确实耐人寻味，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海外华人为什么不可能成为“中国梦”政治领域的主要践行者？即便在“中国梦”的经济和文化领域，也有一小部分华人可能成为实践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读和分析东南亚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了解他们以及其他东南亚华裔精英、普通华裔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二、东南亚华裔学者的观点和回应

中国官方对海外侨胞发出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呼吁后不久，著名学者王赓武便公开就“中国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结合在 20 世纪后半叶他对中国动员海外侨胞参与国家建设的一系列分析和评论，我们能从中了解这位对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深具影响的学者的思想。

¹ 游润恬：“北大教授梁英明：中国要理智看待海外华人立场”，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 年 2 月 22 日。

² 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载于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版。

³ 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梦’”，《公共外交学刊》2013 年秋季号第 2 期。

2014年1月1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在“东亚展望2014”（East Asia Outlook 2014）论坛上做开场发言时，从中国与中国梦开场，启动一整天关于“中国梦”、“习近平梦”、“安倍梦”以及东亚形势的讨论。在此，我们摘取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他发言的复述的部分文字：

2012年，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上台后不断见诸报端的“中国梦”，其要素是一个既不太久远，也不太新的“梦”，关键要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即中国”。他（王赓武）解释说，所谓“中国共产党即中国”，与“中国即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不尽相同，而且会引向不同的梦。中国现领导层是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即中国”这个很古老的梦。当然，这种梦也不专属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掌权时期，国民党领导层也曾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掌握了中国的未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之一——即谁主掌国家，谁就代表了中国。

王赓武以法文引述法国历史上的一句政治名言：“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来说明这一概念，在历史上并不新，他的疑问是：“在信息互通如此发达的全球化时代，继续保留这种信念，是否务实与现实？它可能维持很久吗？”他认为，正因为这个梦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才有必要拥有这样的“梦”。中国的中国梦，与日本、韩国的梦一点都不像，中国领导人的任务是让“中国共产党即中国”维持越久越好，他预见这个“梦”将进入一段极具挑战的时期。……中国本身已经是完全否决了中国传统中的帝制，但传统帝国主义的部分观念，仍存活到今天。¹

可见，王赓武对“中国梦”的评价似乎是比较偏负面的。这与他1980年代以后多次阐明的有关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论点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在上世纪后半叶一系列的著述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东南亚华人已经“乖离同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

我们应当注意本区域以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多大的变化。他们已经乖离同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救国运动的认同，他们也没有返回中国定居的念头。假设东南亚华人有意移民的话，他们往往选择美国、加拿大及大洋洲的移民社会。不论他们到哪里定居，他们都谋求成为中产阶级人士和现代专业分子。其中有些仍然愿意帮助中国家乡的亲戚，并从事某些慈善工作，但他们大体专注于经济和专业方面的联系，彼此互惠互利，以贸易和投资来说，做生意纯粹为利，第一次被公开承认为他们同中国建立联系的首要目的。²

这是出自王赓武所著《华人与中国》一书的观点，他否定海外华人对中国存在政治倾向，同时指出东南亚华人积极到中国投资并非出于报效祖（籍）国，而是“纯粹为利”。正如本报告的导言中所曾引述的，王赓武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指出“东南亚华裔多半与中国无关，也不可被中国所利用”，他们对中国的投资主要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

我们阅读了数十年来王赓武关于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论述，并将那些与当前“中国梦”相关的观点摘取如下。尽管这些论述均发表于2012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梦”之前，但却宛若对中国向海外华人发出“共筑中国梦”的呼吁作出了超前的预判和评论。

第一，中国不应将“侨居在外”或“散居在外”等具有政治内容的词汇用在华人身上。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目前广泛使用“侨胞”一词来指称海外华侨华人，在他看来也是具有政治意味和不恰当的：

我不同意把这个字眼（侨居）应用在华人身上，因为它所具有的含义，也许在某些方面适用于过去的侨居华人，但却不适用于今天的华人。在许多方面看来，“侨居在外”这个字眼所含有

¹ 韩咏红：“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中国梦’等于中共即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1月20日。

² 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第3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的政治内容，可以同华侨一词相比拟，其实后者也具有不少政治意义。众所周知，要把某些政治涵义从华侨一词除掉，是很困难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东南亚不应用华侨一词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中国却依然照用不误，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北美洲，这个字眼仍旧被广泛应用。我们应当抱着异常谨慎的态度，以了解这个字眼的含义和真实来源，才能够正确地应用。我们尤其应该设法确保这个字眼的政治内容，不会遭误用、滥用和曲解。¹

第二，海外华人、华裔在面对中国富强而号召爱国主义时，他们都不会产生指向中国的爱国主义，他们爱的是本国。如果本国与中国有冲突，他们可能会忠于本国：

他们（华人）所谓的爱国，爱的是本国而不是中国。他们已成为忠诚的当地国国民，但仍旧坚持中华文化，尽力地保护华人少数民族的权益。

他们（华裔）接受本地文化，参入本地一切的社会、政治、经济集团的活动。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已从尊敬到不否定，也不积极地去支持和维护。将来，如果本国与中国有冲突，他们可能会尽忠于本国。²

第三，部分华人保留“中国情结”，在中国崛起之后，这种“中国情结”是否会使他们慢慢地接受中国新的现代文化包括中国新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这是存在疑问的：

“中国情结”能够使他们（华人）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将来中国崛起了，中国新的现代文化能够形成了，成为一种很可爱的、很值得尊敬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化，那么这种“情结”还是有可能使他们渐渐接受新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是会这样，我不敢说，我只是提出问题。³

第四，中国可以通过民族主义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并奋发图强，但要使用邻国钦佩和尊敬，就不能怂恿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而是要让自己的大众承认和接受普世价值观：

当今重获自信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新发现的民族自豪感。这对于激活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能量来奋发图强是大有益处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股新力量。但是，现代的民族主义与外国入侵所激起的仇外不同，它也成为一把双刃剑。如果民族主义怂恿了狭隘、狂热的集团变得过于自信和自大，这将会减损中国在其他方面的杰出成就。这种东西非但不会带来钦佩和尊敬，还会激起中国的邻国过度的恐慌，不管中国领导人如何阐述他们和平发展的意图。

我相信，领导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重点转移到更软的文化价值观以表明中国作为正在发展的新的现代文明，它与别人拥有的文明是和谐的。但是，他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去约束民族主义并允许它只支持特定的防御需要。他们不可以让它变成怪兽，别国的现代历史已经表明，当民族主义未加抑制时，就会变味。我相信，中华文化能够让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变得柔和。这是一种能够让大众赞同别人的价值观因此也愿意承认存在普世的价值观的能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别国，人们都以此为目标。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就会意识到，这种价值观不必一定反映力量和财富。这些价值观将真正来自人类的本性，也许会无处不在。最后，中国将承认他们的文明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属于现代文明的一部分。⁴

以上只是摘取了王赓武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其与海外华人关系的部分论述，因其著述颇多，难免挂一漏万。我们认为，这些论点与王赓武对“中国梦”的回应与批评是一致的，反映了他对中国崛起后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期待。

¹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王赓武自选集》第26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²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王赓武自选集》第3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³ 这段文字来自于2011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主办的“费孝通纪念讲座”上的主题讲座——“中国情结、华化、同化和异化”，载于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第343-3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⁴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王赓武的访谈录”（访谈时间为2010年5月），载于王赓武：《华人与中国》第353-3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出生于印尼、目前任职于新加坡的著名华裔学者廖建裕也对中国领导人向海外华侨华人发出的“共筑中国梦”呼吁进行了回应和批评。他认为中国崛起以及新一代领导人就职后，海外华人作为中国应对国外事件与国内需求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重要性在增大，但一些措施和言行模糊了华侨华人的国籍界线并有重新承认双重国籍的嫌疑，这很危险，也不一定对海外华人有利。这些措施有如：2011年中国国务院侨办推行“大侨务”政策、2015年6月在北京举行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2015年底传出北京中关村启动“华裔卡”试点计划等。一些中国领导人也在公开演讲中把“华裔”说成“侨商”、把海外华人说成“海外侨胞”。他判断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华侨华人首先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其次是共赢，最后才是打造“新形象”与住在国人民和睦共处。由此，廖建裕质疑道：“当局势相对稳定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可以各取所需，但一旦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出问题或因南海问题与中国起冲突而引发排华暴乱，当地华人对住在国的忠诚会不会受到质疑？华人会不会成为替罪羔羊？”¹

廖建裕还专门就中国崛起与海外华人的问题撰写了一本著作，其中就涉及了“中国梦”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呼吁海外华人共筑“中国梦”给华裔提供了更多商机，一些华裔因中国将他们纳入伟大的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华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纳入中华民族的政治涵义。而许多华裔则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居住的东南亚，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忠诚将会受到土著民众和住在国政府的质疑，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越来越明确，由此引起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将影响族群关系。²

廖建裕在书中对中国政府大力呼吁海外侨胞加入中华民族大家族共筑“中国梦”以及相关的侨务政策和举措表示极大的担忧，并提出了批评，我们进行了如下简要的、可能并不全面的归纳：

第一，东南亚的排华情绪本身就因族群政治、华人相对土著人占据较高经济地位等因素而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南海主权争端日益强硬的主张，加上同时呼吁海外华人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做法很可能会使东南亚反中国运动和排华骚乱再次发生。

第二，中国官方在呼吁海外华侨华人共筑“中国梦”和践行跨国主义而参与中国建设时，对“华裔”与“华人”不作区分的模糊处理，很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正在进行的民族（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刚刚归化入籍并希望成为接收国忠诚国民的华人新移民的影响更大。

第三，尽管在中国一系列措施的动员下，海外华人对中国发展的内外需求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软实力建设等方面，但海外华人利益却只被中国排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土整合、经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存亡等其它更高利益之后。有些观察者误读了中国的政策，以为海外华人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恰巧一致就是中国当前已经将海外华人利益摆在中国国家利益之首。³

陈志明的看法也与王赓武、廖建裕类似，如前所述，他并不赞同将全球华人视作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不赞成将华人视作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与中国政府将海外华人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并呼吁共筑“中国梦”有些格格不入。不仅如此，他也不赞同将世界各国的华人称为“海外华人”，认为多数华人（裔）已经认同和忠诚于各自的国家并引以为豪。在评论廖建裕有关“东南亚华人”称谓问题的论文时他写道：

¹ 沈泽玮：“本地学者：“模糊华侨华人界线，中国力推侨务政策未必有利海外华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2月19日。

² Leo Suryadinata. 2017.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pp.222-223.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³ Leo Suryadinata. 2017.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A Study of Beijing's Changing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pp227-228; 235-236.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我同意廖建裕的论点，东南亚华人并不喜欢被称为“海外华人”。身为个别国家骄傲国民，不论被称为或指为“海外华人”，我们都觉得受到侮辱。……东南亚以外的一些学者并不了解我们的感受，他们无法体会东南亚华人的感觉。身为本地人的骄傲感既非新颖，亦非起于政治考量，而是一种本土意识的自然发展……。¹

中国人民应当理解，华裔（除种族意识华人之外）以各自的国家认同为荣，他们因被视作从属于中国而感到不悦。他们访问中国也不应该被描述为“归国观光”。就短期而言，与中国进一步的互动可能引发一些种族意识华人“回归文化祖国”的表述。另一方面，访问中国也可能改变其对神秘中国的观念。同样，一些华人可能恢复其与中国亲属的联系，但这并不一定使之更倾向于中国。总之，占绝大多数的华裔效忠于各自的国家，并引以为豪。²

这些最先于1989年以英文发表的文字，尽管并没有直接回应“中国梦”概念以及中国领导人对海外华人共筑“中国梦”的呼吁，但上述的言论似乎是在预判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人不会愿意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身份来参与“中国梦”的建设³，那些愿意接受中华民族成员身份的可能只有那些“种族意识华人”。何为“种族意识华人”？陈志明将这个在华人中占少数的群体与占多数的“族群意识上的华人”进行了区分：

我们应区分族群意识上的华人和以更大范畴之华人“种族”视角进行思考的华人。因此，“菲律宾华人”与“马来西亚籍华人”乃由族群意义上的华人，亦即那些仅以华人社群而非更大范畴之国家社会视野为其世界观的华人组成。而种族意义上的华人则是指那些以“广义之华人种族遍布全球，但其种族认同却以中国领土为中心”为其世界观的华人。由于没有一个特定的称呼，我们或可称后一范畴的华人为种族意识华人（racial Chinese）。这一称呼意味着大中华“种族”之认同及与之相伴的态度。这并不是指种族主义者对其他族群态度之表达，尽管在此意义上华人种族也趋向于种族主义者。种族意识华人是超越族群认同（如民族国家内部某一具体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更为广泛之种族认同。⁴

陈志明指出，种族意识华人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笃信者，他们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象征并相信“龙”将世界各地华人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个华人中的少数群体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态度“更加接近于中国领土之内中国人的想法”，但却给住在中国的大多数华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种族意识华人视自身为“纯华人”及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守护者。他们在华人社群中颇具影响力，尤其是在华人抱有族群不满的马来西亚。由于其中一些华人声名卓著，他们的文化认同与种族表达经常被作为华人对其自己的国家缺乏忠诚的表现。像马来人这样的非华人公民很难看出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界限，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乃至东南亚政府需要注意的观念是，尽管他们的声音突出，但种族意识华人只代表华人人数的少数，仅凭种族意识华人的行为来质疑多数华裔的忠诚非常不公，在政治上也不可取。⁵

综上所述，以上三位东南亚华裔学者的主要论断基本相似，他们都认为东南亚大多数华人已

¹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翻译、陈鸿瑜审订《华裔东南亚人》，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4月。

²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第146页，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版。

³ 陈志明在此使用的是“华裔”一词。鉴于第一、二代华人人数的减少，实际上华裔已占海外华人中的绝大多数。

⁴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第140页，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版。

⁵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第144-145页，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版。

完成了国家认同的转向，已经将住在国视为自己热爱的祖国，他们关心本国的政治事务，并不在乎中国政治外交事务的发展。这些论断应该是他们个人亲身体会和长期田野观察的结果，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学者的著述那里获得更具体的、支持这些观点的论据。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华裔学者崔贵强的著作《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叙述了1950年代许多新马华人开始“扬弃中国国籍，转变国家认同”的过程¹，可以说为上述的论断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何国忠也认为，自从独立以后，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时事开始疏远。现今的有超过90%的华人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他们对中国时政毫无兴趣，也觉得那是与自己不相关的范围。²他认为，“中国梦”号召对马来西亚华人虽有影响，但他们受到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却不可能接受“中国梦”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今马来西亚华人面对中国崛起、“中国梦”号召，也就是看到中国对外展现其实力，做为海外的华人的他们几乎都欣然接受这个事实。“中国梦”在中国大陆包含了政治层面，而对于海外华人“中国梦”的界定倾向于贸易、争取华语市场等的途径。³

何国忠还认为，“二位一体的中国”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当下的历史格局已并列呈现不完全重合的“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文化中国则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以中华文化为生活基础的华人世界。无疑的，马来西亚华人一直压抑对于民族及公民的情感，如此一来，由于文化遗产的持续，“文化中国”的情意结一直强烈地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遇到在地政治敏感的情况时，许多人都会小心翼翼地以“马华”定义自己的文化，将这个情意结回归于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公民身份，以免文化中国和政治搅和以后会引起无谓的“不效忠”议题。但是，当遇到言论空间更具弹性的时候，文化的概念便会跨越到它原有的政治场域。⁴

何国忠还举例说明“中国梦”在文化层面对马来西亚华人所产生的影响。马来西亚华团积极推广的“光盘运动”，是一种呼吁华团组织在办活动的时候，避免浪费食物。何国忠指出，这恰是一种文化仿效，出自于习近平上台后打击铺张浪费的新作风，这项改革便使中共领导阶层，延伸到社会大众，如同现在很多餐厅和机关团体，都推动“光盘运动”，呼吁人们摆酒席，或在餐厅用餐时，不要点很多菜，显示有很多钱，而是应该少求节省，少点些菜，而且要把盘子里的菜吃光，不能浪费。从华团举办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即是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响应及展现。⁵

但在马来西亚大学任职的何启良教授却不赞同何国忠的观点。他认为，在文化上，马来西亚华人不会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的文化经过本土化后已经转变成“马华文化”，马来西亚华人也已经具有某种“马华性”，并失去“中华性”。包括何启良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和扎根的过程中使其具有多元化和在地化的元素，这是中华文化在海外异化的结果，但这不一定是负面的。⁶

而马来西亚华裔青年学者李慧易则认为，中共主席习近平积极推崇儒家思想，同时自他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人共同走向“中国梦”，在彰显民族主义同时也使华人自身的民族性受到了启发。⁷他还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本来就一直继续中华文化的传统以并维护自身的尊严，由于政策压制沦为“二等公民”，因而更加“促使他们认同自己祖（籍）国的民族与文

¹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版。

²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第236页，马来西亚华研出版，2002年。

³ 何启良：《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马来西亚华社资料中心1994年版。

⁴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团（华裔）领袖与文化中国”，ICS 2007 Working Paper No.2007-12。

⁵ 同上。

⁶ 何启良：《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马来西亚华社资料中心1994年版。

⁷ 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83页，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15年。

化”。中国崛起与“中国梦”引发华人的回应结果，无异于再度掀起双向的冲突：或向马来西亚主流民族政治认同靠拢，或“彰显对强大祖国的文化认同？”¹

三、泰、马、印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

东南亚华人、华裔对“中国梦”的回应是否与上述的学者相似？对于这个问题，东南亚当地的一些学者曾做过相关的研究。近年来，我们到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调研，在每个国家的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分别探访了一些华人社团和普通的华裔民众。在此我们根据东南亚的实地调研资料并引用东南亚华裔学者的一些研究文献，描述东南亚华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梦”的反应。

（一）华人社团精英眼中的“中国梦”

东南亚各国华人社团的领袖或负责人大多拥有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都有着很深的情感，恰如陈志明笔下所描绘和分析的“种族意识华人”。他们对“中国梦”的回应大多是比较积极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非常钦佩并大加赞赏。

1、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精英的态度

身为马来西亚最大中文媒体集团执行长兼华社领导的张晓卿就是陈志明所说的“种族意识华人”的典型代表。由于他每次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论调，从而获得了“中华魂”的称号。²他在自家开办的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大力宣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梦”：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一个民族，再辉煌傲人的经济成就，如果缺少文化的辉映，缺少文化的铺垫，它终究不是一种圆满。虽然骄人的经济成就和财富可能赢得别人的羡慕，却不能换来别人对我们由衷的尊敬。因为文化记载了一个民族伟大的智慧和优秀品质。所以，失掉了文化，历史就会变得苍白，民族就会变得无根。因为文化是作为传统与民族的价值体系，它所代表的，不仅是民族的尊严，也代表了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思想和信仰。所以，不论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珍惜尊重自己的文化，并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重新塑造、重新找回那些已经渐渐被人遗忘的文化和传统，至于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其实就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梦”。³

张晓卿曾多次通过自己主办的媒体宣传自己与中国、中华民族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我要垄断报业，我最希望就是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力，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⁴张晓卿目前担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安徽省海外交流协会荣誉会长。他曾任马来西亚国会上议员，现任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创会会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首席会长、世界张氏总会创会会长、世界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马来西亚常青集团执行主席、世华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也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等四报的社长；香港明报企业集团董事主席。曾荣获砂拉越州元首颁赐“拿督”勋衔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颁赐“丹斯里”勋衔殊荣。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发起创立“冰心文学奖”，设立了“常青怀恩基金奖学金”等，曾荣获“中国儿童慈善家”等美誉。2009年，获得世界张氏总会颁给的最高荣誉特级勋章，同年获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爵士勋章。可见，这位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东南亚文化学术界名流和社团领袖，与中国之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2001年张晓卿出任世界华文报业协会主席时，他就在演讲说：“我们华人应该建立和拥有一个以全球华人为主体的媒体和网络世界。我们必须依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去表达我们的感情和声音。在目前的世界舆论中，迫切需要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文媒体文化传播力量，来为东方

¹ 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114页，2015年。

² 唐南发：“同床异梦的‘中华魂’与公民身份”，《东方日报》2007年6月17日。

³ 张晓卿：“塑造新民族气质内涵·华裔须具新思维”，《星洲日报》2015年3月8日。

⁴ “报人雄心烈，不惧留言急”，《亚洲周刊》2001年6月11日第15卷第24期。

的新兴大国铺垫一条文化的通道。”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民族”情感驱使下，张晓卿在2012年出资2000多万人民币，给中央电视台《故宫》纪录片团队拍摄首部关于南洋华人的纪录片，长达十集的《下南洋》。而在南海国际仲裁正热之际，《星洲日报》也以整版篇幅转录中国新闻社的专题报导，确保在南海议题上，马来西亚华人主流舆论跟着中国的主旋律。马来西亚槟城研究院研究员黄进发评论道：“他是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出口商，把海外华人读者卖给中国，也把中国梦卖给海外华人。”¹

张晓卿也与中国政府一样，将全球各地的华人视为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大声疾呼，在他的眼里，海外华人与中国人不仅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利益相关的种族共同体。1998年印尼的“五月暴乱”发生后，他在《星洲日报》上刊文，对在此事件初期中国方面“噤若寒蝉”的反应提出了婉转的批评：

印尼华人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势衰下的历史悲剧的延续。今天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就犹如出嫁到远方的女儿，她们当日含泪挥别故乡，在惊悸与不安中踏上异国的土地，那是她们在不由自主之下，对生命与幸福下的一种赌注。今天，眼看着出嫁的女儿因被抢夺和欺凌而伸出她们无助的双手时，作为一个有长远文化渊源并自称维护正义的“娘家”，难道在这个时候可以漠然关上家门吗？我们不能只期待女儿的孝敬与回报，却忘了对她们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祝福。²

古润金则是一位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梦”呼吁的马来西亚华社领袖。他生于1959年，祖籍广东中山，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清贫家庭的第三代华裔，先祖是广东长乐县（今五华县）人。1990年代古润金就开始积极加入到赴中国投资的海外资本大军中，现在他的事业已与中国密不可分，今天已是马来西亚企业家，也是中、马两国颇具知名的慈善家。他所开办的完美公司已经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也将产品销售及服务扩展至马来西亚、香港、泰国、印尼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同时，他在大陆投资经商的20年间，捐款总额近5亿元，除了华文教育外，还包括希望工程、抗洪救灾、医疗救助、体育卫生、文化文艺等多个领域。他说：

马来西亚的广东人没有忘了自己的家乡，他们不仅成立了各种联谊会、组织或社团，不定期聚在一起联谊论商，甚至还看能不能为家乡做出贡献。虽然（中国）不是我们的国家，不过，像我们这些侨民，还是有情意结在里面，一旦中国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帮一帮，看我们能不能为家乡做出贡献。³

这位担任众多与中国相关的各种社会职务的马来西亚华裔富豪⁴，在不同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说：

20世纪初，我的祖父和同乡们从广东中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靠给人做苦力艰难度日。后来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这些身居海外的华人才感觉腰杆子硬了一些。但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我的根，完美（公司）要扎根中国，回馈社会。⁵

古润金参与“中国梦”实践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更主要是体现在政治领域——

¹ 林怡廷：“张晓卿：南洋华裔的中国梦（三）”，端传媒 Initium Media，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12-mainland-tionghiewking3/?utm_medium=copy。

² 张晓卿：“印尼暴民排华事件的启示和省思”，《星洲日报》1998年7月5日。

³ 古润金：“大马广东人愿意贡献家乡”，《星洲日报》2013年11月23日。

⁴ 古润金担任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署理会长、马来西亚中山会馆联合会总会会长、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中委会常委兼文化总基金委员会主席、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副会长，中国禁毒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名誉会员、广东省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特聘委员、广东省侨资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山市政协委员、中山市工商联副主席、中山市侨联名誉主席、中山市侨资企业商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⁵ 王小龙：“古润金：我为什么要扎根中国？”，《财富》2019年第6期。

热衷于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2020年3月，他荣任“马来西亚一中促进协会”会长，该会同时更名为“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大马一中和统会”），在新一届理事会中，原“大马一中促进会”创始会长钟廷森改任常务副会长，陈凯希、何国忠担任副会长（该会共有六名副会长）。该会称，将坚守大马的一个中国立场，广纳贤才，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大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刘东源与一等秘书兼领事王志民也出席了大马一中和统会的首次理事会议，可见该会与中国官方有着公开而密切的关系。¹

另一位祖籍福建省安溪县、1937年生于马来亚居銮的著名华商陈凯希，更是高调地响应“中国梦”，他目前所从事的商业经营大多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梦”有关。2013年5月，作为马来西亚海鸥集团董事经理的陈凯希在与人民日报记者畅谈“中国梦”时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极大提高让所有海外华人倍感欣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不仅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海外华人的梦想！”²

陈凯希在童年时就随父母奔波逃难。抗战胜利后，其父遭英殖民当局拘捕，后又被驱逐出境，其母只好带着6个子女随丈夫回中国，留下陈凯希姐弟三人在海外。1973年，陈凯希就集股成立了专销中国商品的海鸥公司。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在华人圈中很受欢迎。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氛围，陈凯希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一家洋溢着旧上海滩情调的“百老汇歌舞厅”。歌舞厅的生意十分红火。陈凯希还与中国陕西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联合投资，在马来西亚建成“大唐山庄”酒楼。2003年，他在吉隆坡把蕉赖一座名叫“Ue3”的商业大厦承接下来，建立“中马商城”，尽管这座商城经营不过三年，但去过的人都知道，与其将中马商城看作一项商业投资，倒不如说是陈凯希是为了圆他的文化中国梦。³

陈凯希曾在吉隆坡对《人民日报》记者说：“我一辈子就在做一件事：担当中马友好的纽带和桥梁。”1991年，中国华东发生特大水灾，海鸥集团率先捐款40万林吉特。1996年云南丽江发生大地震，陈凯希和马中友协会长乌斯曼阿旺又火速将5万美元交给云南省。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马中友协和马来西亚各大社会团体举办大型赈灾晚会，筹募800万林吉特。在晚会上，海鸥集团捐赠了100万林吉特，此外，陈凯希及海鸥员工也各捐赠了20万林吉特。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希望在中国！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繁荣富强与和平的中流砥柱，这就是我心中的中国梦！”⁴

在维护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陈凯希与马来西亚的其他华社领袖与中国政府步调一致，开展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底，面对激烈的“中华民国”选举以及陈水扁提出映射台独的防御性公投，在前马华公会李三春和陈凯希的带领下，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建立了“马来西亚一中促进协会”，史无前例地公开发表反台独立场。作为一中促进会秘书长的陈凯希，更是高调地透过媒体报章来展现对中国大陆的情感。⁵

马来西亚华裔学者李慧易认为：

以“中国情意结”来形容有亲中倾向的人，而这些人个人生命经验中对中国或许真的抱有精神或文化上的情感，他们在中国的与在马来西亚的亲身经验，形成这种情结再自然不过，但是

¹ 杜晋轩：“中共统战部分部？为什么马来西亚会有个‘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The Lens News 关键评论，<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250>。

² 王大玮：“大马华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海外华人的梦想”，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05-09/4802926.shtml>。

³ 何国忠：《全球化华语下的中国与马来西亚》，马来亚中文研究所，2007年出版。转引自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93-94页，2015年。

⁴ 暨佩娟：“担当中马友好的纽带（中国梦·赤子心）”，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520/c1002-21547220.html>，2020年5月18日浏览。

⁵ 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95页，2015年。

引起争议的是，这种身份意识及其伴随的利益关系，遭外界冠上戏谑性的“中华胶”称谓。……在国家认同上，出生地是一个关键，许多第二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想像或认识有限，一部分华人也会抨击其他那些情感倾向中国的华人，而华团领袖是他们首选的攻击对象，称华团领袖为“中华胶”。华团领袖之间无形中存在着一种焦虑感，因为他们无法因此就必然获得中国的资源，却已经也无法走入马来西亚体系的中心。事实上，中国的强大是一种威胁的印象，正在华人中蔓延开来，在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圈子中，不断的提醒着马来西亚的华人，时时刻刻要摆脱自己民族的身份……。

中国崛起的印象与实践重新联系了本已分疏的华人群体，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身份概念如“炎黄子孙”、“中华文化”、“中国梦”均获得华团领袖不吝使用，而最近的“一带一路”等词汇使用益加频繁，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报道，或者华团领袖的言论中更为明显。¹

在东南亚的实地考察期间，这些华社领袖或负责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共同的印象：中文表达能力很好，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都有着很深的情感，恰如陈志明笔下所描绘的“种族意识华人”。他们对“中国梦”的回应都是比较积极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都非常钦佩并大加赞赏。

在这里需要附加说明的是，上述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织主要是指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宗教组织、校友会、乡亲会、宗亲会及其他文化及慈善组织等，不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政党，即由马来西亚华人和具有华人血统的公民组成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²。

2、泰国华人社团精英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华人社团曾经一度恪守“在商言商”的宗旨，试图尽力回避国共两党在海外的政治斗争，之后因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泰外交关系的中断而长期断绝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来往。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华人社团对中国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中国梦”的响应非常积极。关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泰国是东南亚各国中最早建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分会”的国家，而且也是在住在国内设立最早地区分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两个和平统一促进会：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泰国泰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见表 4-1）。

表 4-1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东南亚分会

名称	成立时间	首任会长	现任会长
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	2001年2月	王志民	王志民
泰国泰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2010年1月	马剑波	马剑波
马来西亚一中促进会 (后更名为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	2003年12月	钟廷森	古润金
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2001年4月	杨启秋	杨启秋
老挝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2003年9月	张贵龙	张贵龙
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2001年12月	戴宏达	曾福应
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宿务分会	2010年12月	何安顿	何安顿
印尼(东爪哇)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	2007年3月	吴俊亮	吴德辉

资料来源：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作为海外华人社团组织之一，也可以说是最有政治倾向的华人社团，与

¹ 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 115-117 页，2015 年。

² 马华公会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和对华事务委员会，派专人收集整理“一带一路”的剪报和信息，供该中心领导和成员随时翻看；该中心还出版“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刊物，刊登“一带一路”政策与信息、马来西亚参与“一带一路”情况以及该中心举行的相关活动。但该政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并非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代表”而对“中国梦”进行回应，而仅仅是响应马来西亚政府的号召以促进中马双边的贸易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宗旨是反对分裂，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类组织的活动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意为离散族群指向祖籍国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¹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而言，联络和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是“中国梦”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泰国华人社团在这一政治领域的实践中走在了东南亚各国的前列。

2001年2月，泰国华商王志民创办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任会长。他不仅把嘉乐斯大厦的两层楼捐出作为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办公室，而且一直以来所有的活动经费都由他本人无偿支持。近年来，该会活动频繁，社会影响巨大，获得了泰国官民各界和泰国中华总商会等其他华人社团的广泛支持。泰国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华商社团——泰国中华总商会就非常积极地回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筑“中国梦”的号召。2013年3月，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刘锦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在泰国侨界引起广泛共鸣，在泰华侨华人愿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将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一面旗帜。泰国中华总商会愿动员泰国数以百万计华侨华人的力量，鼓励侨胞们多多与祖（籍）国加强经贸往来，回国投资兴业，成为连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桥梁，为“中国梦”早日实现添砖加瓦。²

2014年春节之际，时任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的李桂雄也通过人民日报记者向中国父老乡亲拜年并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中国梦”：

我是一位在泰国生活了30多年的华侨，在2014马年新春之际，感谢人民日报给我一个机会代表我们泰国的华侨华人向全中国的父老乡亲们拜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商会认真学习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和相关文件，我觉得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新政策非常切合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实际，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多少年来心中的梦。

……让泰中两国文化相融，人民相亲，经济双赢，就是我心中的中国梦！³

李桂雄目前是泰国泰宝集团董事长、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泰国工商总会副主席、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列席代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侨联委员、中国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国际潮青联合会会长、泰国环球集团董事长、泰中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泰国中文电视台董事长等众多商业和社会职务，在中泰两国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这位华商17岁才从广东潮州移民泰国并加入泰国国籍，至今仍公开地将中国称为“祖国”，立志为“祖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东盟经济一体化”做出贡献⁴。

2019年1月，由泰国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泰国华人社团主办的“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伟大意义座谈会”在泰国曼谷潮州会馆举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欣出席并讲话，中总、潮馆、和统会、华人青年商会、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青年企业家协会等泰国华人社团及媒体代表等150余人与会。⁵

¹ 参见梁茂春：“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² 黎黎、明大军：“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愿为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03-21/4664493.shtml>。

³ 施晓慧：“泰国华人心中的中国梦”，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207/c1002-24290179.html>。

⁴ 参见泰国泰宝集团网站李桂雄董事长的介绍网页，http://www.thailandbao.com/index.php?route=bossblog/article&blog_article_id=39。

⁵ 付志刚：“泰国华侨华人：做中国和平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新闻网，http://news.gmw.cn/2019-01/27/content_32420618.htm?from=search。

2019年8月,中国统一论坛暨亚洲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统促会”)二届三次全体理事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会会长王志民及夫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参杨欣,泰国皇室席琳亲王,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泰国潮州会馆主席黄迨光等嘉宾,各国统促会代表以及台湾同胞等数百人出席会议。¹

泰国主要华人社团的精英公开回应“中国梦”,并呼吁华侨华人积极响应。泰国统促会会长王志民表示,海外促进会将始终如一、牢记使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秉持“中泰一家亲”理念,扩大、深化两岸交流、交往,凝聚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促中国和平统一,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在会上致辞时说道:

纵观世界发展历程,和平统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中国一直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大团结;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两岸三地的同胞都是中国人,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共同历史文化,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竭动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是一个中国,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是全体海外侨胞的心愿。²

泰国潮州会馆主席黄迨光在致辞中则表示:“尽管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国才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和平统一,并且海内外同胞要共同担负起和平统一大业的责任,任何国家及其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华儿女和平统一的心愿!”³

即便是曾经被人们误认为支持“台独”的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华人社团——中华会馆,其实也支持祖籍国的和平统一。中华会馆的高层管理人员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会馆与中华民国走得很近,后来民进党之后,也被人误会成中华会馆也搞“台独”,其实刚好相反。我们中华会馆是旗帜鲜明反对“台独”的。而和平统一促进会是倾向中国大陆的,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是很多,不过,有时我们举办活动他们也有来的。我们每年都主办一个“中山讲坛”,在大酒店举行,到今年已经是第24年了,这个讲坛既是座谈,也是演讲,演讲者主要是中国大陆、台湾的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例如海峡两岸协会的副主席唐树备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华会馆也不再有国共对峙的内容了。所以现在中华会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与台湾中华民国驻泰国代表处都有了政党往来了。中华会馆的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中文教育,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和传承,我们就有一个学校。每年我们也有鼓励招收泰华青年学生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去交流,去学习语文和中华文化。二是学术研究,主要就是“中山讲座”了。主要学习国父的精神理念。当然我们的听众几乎都是泰国的公民了,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学术活动推动华人贡献祖籍国,促进祖籍国的统一。⁴

3、印尼华人社团精英的态度

根据在印尼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印尼众多的华人社团精英中,像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精英那样公开地发表文章,积极地回应“中国梦”的并不多见,但不少第一、第二代华人在内心里还是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并期待中国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印尼某市的一位华人社团领袖说:

¹ “中国统一论坛暨亚洲统促总会理事会于泰国召开”,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hnwtchdt/201908/t20190814_12192660.html。

² “中国统一论坛暨亚洲统促总会理事会于泰国召开”,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hnwtchdt/201908/t20190814_12192660.html。

³ 同上。

⁴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5日上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我们这些华人眼中的中国是很美的，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这是国家给我们的感觉，也是我们对国家的感觉。¹

印尼某市华人社团的一位精英则说：

我们已经加入印尼国籍，但这并不可以说我们就不能热爱中国了。只要我们不犯法，不超越底线，我们还是可以的。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为中国做贡献，主要在为中印尼友好关系做事情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们已经加入印尼籍了，但我们的祖籍国还是中国。我们受的是一百巴仙（即百分之百）的华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只受二十五巴仙的华文教育，但是在家里还是潜移默化地受我们的影响，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嘴上不会说自己是华人，或者我自己倾向中国，因为这会引起别人的质疑了。但是呢，在内心中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还是有把握的，我们也懂得怎么做，不会做出对不起中国的事。比如像刚才廖先生说的美国的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或者什么时候南海受到侵略这样的事发生，我们都会站在中国的一边的。我们都很支持习近平，他做得很好。他很英明，很懂得做事。比如南海问题的处理，比如“一带一路”，如果没有“一带一路”，那么，中国的很多资金，很多成熟了的技术，已经在中国不能再发展了，如果你不拿出来投资，你要放在哪里？那不是白费吗？既然可以帮到我们这些国家，又可以帮到自己，这是双赢的而且是多赢的嘛。其实，哪一个国家不懂得抓紧这个机遇啊，那就是傻瓜。²

在印尼众多的华人社团精英里，公开并积极地响应“中国梦”的，《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是其中的一个，尽管他并不具有中华血统，但却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并以宣传中国为己任。2013年9月，熊德龙谈到第七届世界华文论坛的主题“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时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利益息息相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与和谐文化，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他认为，华文媒体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在宣介“中国梦”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读者方面。³

在访谈中，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无论是印尼的普通华裔民众还是华人社团精英，在谈及祖国、祖籍国和中国的相关话题时都比较谨慎，这无疑与印尼的排华历史和当前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印尼华人聚居的某城市，一位华人社团负责人在与我们谈及对中国的“华裔卡”问题以及印尼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时说：

“华裔卡”会影响到印尼华人的命运，这对印尼是不合适的，这会被说成收买印尼人的心，这是很敏感的，是很危险的。印尼华人如果拿了中国的“绿卡”就可能违背印尼国籍法的要求了，因为印尼要求国民忠诚，而你却领了祖籍国的优惠，这个忠诚会受到怀疑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祖国统一的想法，但印尼的华人可能不一定有。我们印尼的华裔总会主要是保护华人的，如果要搞出“和平统一促进会”，那么就变成搞出了两类不同组织了，这是危险的，这是自己制造定时炸弹。印尼与其它国家不一样，其它国家没有排华，印尼不同。新移民与老华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有这个“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般是中国新移民比较多的国家，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而作为全世界老牌的华人聚居地，全世界华人最多的国家印尼，这个组织反而是没有的。⁴

作为印尼华裔总会的成员之一，这位华人社团领袖并不知道“印尼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早

¹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下午，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²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下午，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³ 顾时宏：“熊德龙：让世界人民深刻了解‘中国梦’”，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09-05/5248260.shtml>。

⁴ 印尼也是有这个组织的，只是名称上没有“中国”二字，该组织名称为“印尼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某日晚上，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已在 2007 年于印尼的另一个华人聚居的大城市——泗水成立并开展了一些活动。由于这个组织属于印尼华人的地方性组织，因此其影响力并没有波及到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关于印尼许多地方一直没有建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问题，另一个华人社团的一位领导人也有类似解释：

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这样的组织？说到这个我要说的是，这是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是印尼籍了。不过，我们嘴巴上虽然不敢乱讲，但是心里呢还是不喜欢“台独”的。讲到政治、法律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是印尼公民，如果我们公开地参与促进中国统一的事情，就是干涉他国内政了，因为我们是印尼人，我们在官员面前都讲我们是印尼籍的，我不能再说我是中国人了。我的护照里写的是“印度尼西亚居民”，身份证里都是印度尼西亚籍嘛，所以，就不方便来说什么“祖国的统一大业”了，但是心里希望中国统一。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遇到的生意人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我们不想让政治的东西渗入其中。¹

印尼华裔总会作为印尼最大的华人社团，对涉及中国的事务也一直保持高度的谨慎，尤其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中国产生政治性的关联。这个组织主要的任务是促进华裔尽快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在政治上认同印尼，而与中国的联系则是次要的，因此它甚至会接纳非华裔加入组织，尽管实际上成为会员的非华裔只是其中的少数。印尼华裔总会的负责人之一是介绍他们的组织的：

1999 年印尼华裔总会成立，动乱（注：即 1998 年排华暴乱）之后成立的，全国总有 77 个分会，包括棉兰都有。主要工作不单单在华人这一（方）面了，我们主张走出去，多跟印尼主流社会接触，争取得到他们的认可。华人社团分得太清楚、太细了、太多了，所以我们总会是向外的，希望把华人带入主流社会，包括带到军队、穆斯林，到国会，到总统府都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其他华人社团有血缘的关系、地缘的关系或职业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些，我们主要在年青人参政议政方面会帮助他们很多，所以性质与其它华人社团应该是不一样的。²

我们了解到，印尼华裔总会在谷歌（GOOGLE）地图上无法通过中文名称搜索到，因为这一组织本身就没有中文地址和门牌。另外，该组织召开会议和开展活动时使用的主要语言是印尼语而非华语³。当印尼华裔总会接待中国官方的来访时，一般都需要向印尼的国家安全部门汇报和备案，其谨慎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在谈及印尼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该会的负责人之一说：

印尼的背景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与印尼华人的关系也不一样。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成为印尼公民了，所以在公共的场所参加公共的活动，就不能说支持中国之类的话了。关于这一点，侨联也好，侨办也好，我想他们也是很明白的。从心理来说，总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想法吧，所以中国的客人以及中国有什么活动在这里举行，我们都很乐意接待或参加。像刚才我们接待的就是昆明市公安局的，尽管公安局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中国那边的侨联通知我们接待他们。因为他们到这里需要邀请函嘛，所以我们就通过国家战略中心，由他们出面邀请，这是印尼国家安全局的一个下属单位。这个不是林绵坤的那个单位⁴，那是另外一个机构，以前叫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主要是监视华人的活动的机构。不过，现在这个机构的任务已经倒过来了，主要是要促进中印尼的关系。这个转变是两千年过后的事，也就是瓦西德开始执政的时候。⁵

1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某日晚上，地点：印尼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2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3 印尼著名的华文媒体人李卓辉在谈及此事时，总是感到十分遗憾：“华人的组织——华裔总会也不讲中文，真是太不像话了！”

4 林绵坤，曾担任印尼企业家协会总主席、印尼副总统顾问团主席。印尼一位资深华裔媒体人认为，林绵坤是 1960 年代最激进的反华运动分子之一，也是当时名声大噪的华裔学生领袖，曾带领学生冲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8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5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总之，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团相比，印尼华人社团与中国官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当前印尼的种族关系和政治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印尼排华将来还是会发生的”，这位华裔总会的负责人说。同样的，在参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方面，印尼华人社团的做法也是比较低调的。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公开地设置了自己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文网站，而在印尼东爪哇的泗水成立的“印尼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却没有自己的中文网站，其活动动态只能通过零星的新闻报道得以了解。这个唯一设立在泗水的地方性华人组织，其影响力并没有扩展到华人聚居的其他广大地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中印尼之间曾经长期断绝邦交关系和民间交往，而同时印尼与台湾之间的民间交往并未中断，因此目前有一些亲台的印尼华裔群体。大约 12000 多人的华裔在青年时期接受台湾的奖学金资助赴台“留学深造”并获得高中以上学历以及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学位，深受台湾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华裔回到印尼后组建了许多台湾校友会，遍布印尼各地。¹这个群体精通中文、保持中华文化传统，有中国情结但同时却深受西方或台湾政治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外交事务和中国两岸统一的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印尼台湾校友会的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的祖先都不是台湾的，我是梅县的，我们印尼的华人很少是从台湾来的，并不是因为祖先是台湾的才选择去台湾读书。我的父母是从梅州过来的，我是第二代。那些不会华语的印尼华人，他们一般很少去台湾读书，也就是印尼禁止华语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一代不会华语的华人很少去台湾读书了。我们留台校友也想回馈台湾，因为当年去台湾留学也是由台湾政府资助的。所以我们也算是回馈台湾，也同时帮助印尼政府，帮助印尼学生去台湾留学。印尼本身也有很多学生没有钱出国读书，他们没有机会升大学。

最近这些年我常常去中国大陆。当然中国比印尼好很多了，中国大陆发展得太快了，人家是坐火车，大陆是坐火箭呀。我是 2003 年发生“SAS”（非典）的时候去的中国大陆，那时我开始常常跑大陆，差不多我每个月都去大陆。过了一个月再去的时候，大陆那边已经不一样了。每次一去，又不一样了！哇！好快！好像人家讲那个阿拉丁的神话，一吹气，东西就出来了。政府做得非常好。

中国的缺点当然有，免不了的。缺点主要是文化方面的。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改进的。中国大陆，坐火箭，所以人的文化还赶不上啦。记得以前我们每次去大陆的时候会很生气的，想大发脾气的。因为服务得不好。以前我的朋友回来的时候，也跟我讲：我们住五星级的酒店，可是却是三星的服务。不过现在好多了，礼貌上也很好了，以前大陆真的没有礼貌，讲话太多，主要是文化的原因嘛，可能是因为他们念的书很少。不像台湾，台湾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他们很重视教育，很有礼貌。教育很重要啊，大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可是还是没有台湾那么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从文化上，当然大陆不能跟台湾比。

台湾政治是多党竞争，其实只是两个比较大的党竞争，国民党和民进党嘛。大陆的政治制度和台湾的政治制度是各有千秋。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只要他们为百姓着想就可以，作为老百姓安安静静，不多事，就可以了。我也不懂政治。至于大陆台湾统一的问题，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哈哈哈哈哈。我们也是中国人嘛，我们希望呢能够统一就统一，不能统一就不要互相伤害就好啦，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我们是印尼人了。²

显然，与中国人、世界各地华人一样，与亲台湾关系较亲密的印尼华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¹ 印尼留台校友会成立于 1981 年，目前留台校友会共有 9 个地区分会，即是雅加达，苏北（棉兰），苏南（巨港），西爪哇（万隆），中爪哇（三宝瓏）（莒），东爪哇（泗水），巴利（厘）岛，南苏（锡江），西加（坤甸）。目前正式会员有 5000 多人。

²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兴有着同样的期待。不过，他们在中国统一这个关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上却可能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希望呢能够统一就统一，不能统一就不要互相伤害就好啦，大家都是家人嘛！”，这句话可能代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中国梦”某个具体层面的回应。总而言之，印尼华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一样，是一个多元的族群，其中的华人、华裔民众或团体分处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观念，与中国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其内部的凝聚与纷争数十年来一直存在，我们不能对之一概而论。

（二）普通华裔民众眼中的“中国梦”

如上所述，东南亚国家的大多数华人由于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程度较高，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三个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关注和关心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第一、二代华人，第三、第四代及更晚一代的华人对中国的关注度则明显降低，很多人不知道或不了解“中国梦”，甚至不了解或不了解中国。由于在这三个国家的实地调研时间较短，仅四个多月，且深入访谈的对象也不多，因此这些访谈个案并不能代表相应国家普通华裔民众的观点。在此，我们重点就他们中对“中国梦”的不同回应进行描述和分析。

1、泰国

如上所述，泰国的华人社团精英对“中国梦”的回应相对是比较积极的，他们为中国崛起而自豪，同时十分关心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华总商会这样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华社也参与其中，泰国的多家中文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梦”也给予了大力的宣传。然而，占泰国华人绝大多数的华裔新生代较少参与华社的活动，他们也并非中文媒体的受众，对中国普遍缺乏兴趣。正如泰国某市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的主任说：

“中国梦”根本没有传到泰国，泰国的华人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梦”，像我这样去过中国培训了才知道的。真正要共筑“中国梦”的话，中国要派人过来，大使馆也好，领事馆也好，召集华人华侨经常搞些活动，“海外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国梦”，我相信这个口号是从2014—2015年就开始了，现在搞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不敢说。如果说像印尼那样，上千万的华人，新加坡也有不少华侨，我们这里也有台湾会馆，也有台湾人，我们把这些台湾人也都纳入到中华民族里面去，那么“中国梦”的影响力就会增大。我不是搞政治的，以我在侨团里面的经历来讲，我们中国以前有一句土话说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周边国家华侨华人的影响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如果我们去将他们动员起来，可能对“中国梦”的实现是比较快的。如果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对这个“中国梦”不感兴趣，要实现的时间就比较长。中国要号召海外华人一起共筑“中国梦”，还要做许多工作的。比如要去海外的华人会馆社团进行动员，因为这些社团组织还是有动员能力的，因为他们牵涉到很多华人的家庭。¹

这位华助中心主任出生在泰国，幼年时曾到中国读书、长大，然后又回到泰国生活至今已三十多年，目前他的孩子也准备到中国读研究生。他被中国国务院侨办聘为华助中心主任，每年提供两三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他反映，华助中心的职责原计划是为泰国的华侨华人提供各种帮助，但现在来华助中心接受帮助和服务的基本上都是短期来泰国的中国人（主要是游客），而不是华侨华人，因为后者基本上不需要华助中心的帮助。他认为，当地华人大多已经不怎么关心中国的情况了，中国给华助中心提供的经费也不足以调动更多的华人参与到“共筑中国梦”的事业中，因此希望加大经费的投入：

中国政府并不缺钱，但“中国梦”、“一带一路”也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我不敢说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外国国籍的，大家都听中国的话是不可能的，要华侨华人团结起来，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立一个或召开一个华人大会，但这个工作是需要经费的。我们会用最大的

¹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某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努力去办这件事，华人愿意去参加这个“中国梦”的会才能表明他们支持这个“中国梦”。我无法预测会有多少华人来参加这个会了。总之，经费是一个问题的。

开这个大会的话，可以开个大半天，一个是要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扶贫等，不光是来吃饭的。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泰国华人来参加，这个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泰国禁止华文教育，所以很多泰国华人已经不关心中文、中国了，他们基本上对中国的事情是丝毫不懂，而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现在要恢复，至少要过二三十年以后才见效。华助中心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团结多一些华人，中国政府需要投入经费、给教材、派老师，中国强大有这个能力了，所以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做一些事情，需要有经费。¹

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情况，这种态度可能在泰国大多数华裔新生代中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推之，对“中国梦”的漠然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大多已经融入主流社会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祖国的建设中，祖籍国对他们而言既遥远又陌生，他们大多只是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而已。一位五十多岁的第二代华人认为：

中国强大了，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有自豪感。我还有这种感觉，但孩子们没有这种感觉。比如体育比赛，我还是站在中国这边，包括中泰之间的比赛，我还是站在中国这边，但他们肯定是支持泰国这一边。我们泰国的华人，大多数对中国的事务包括南海问题都不关心的，他们才不管呢，只有那些懂中文的才会关心一些。像他信和英拉，他们其实是姓邱的。泰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华人，当然只是知道他们有中国血统，泰国人竞选总理，只要符合规定就可以。泰国有中国血统人绝大多数都已经同化了，泰国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人会去认同中国了。我们下一代肯定是不会关心中国的事情了。²

另一位七十多岁的第二代华人则认为：

中国现在站起来了，我们就高兴了，中国好了，我们就有自豪感了，但我们不会去公开地表达出来。但我们的下一代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去过中国，她们没有去过，所以对中国没有印象。

我们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台湾有一个“娼婆”，就是蔡英文，因为她是日本人支持起来的，我们南京中国人曾被日本人杀呀，所以我们很讨厌日本，她是卖淫的。把台湾收回来，这是一定的，它是独立不了的。一说独立，中国军队一下子都能把它拿下的，也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一下子就能把它收回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台湾人目前还是希望保持现状，“一国两制”是好的。这个老娼没有什么用的，像疯狗一样。我们骂老娼，不骂台湾人，因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国民党也希望中国统一的，只有这个老娼不想统一。³

尽管上述的访谈资料并不能代表总体的情况，但这些受访对象根据自己长期的观察和体会提出自己对泰国不同移民世代的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见解还是很有价值的，他们一致认为大多数华裔新生代普遍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关注或关心，这很可能基本反映了当前的事实。在泰国开展实地调研时，我们所接触到的泰国华裔新生代除了泰国北部“华人村”的新生代华裔之外，大多已不会使用中文，他们对中国的事情了解甚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是谁，对中国的发展情况也不感兴趣（关于这些，可参见前文有关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祖籍家乡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等内容），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像华人社团精英那样对“中国梦”有所回应的。

2、马来西亚

与泰国相比，马来西亚华裔普通民众对“中国梦”的回应则明显积极一些。毕竟绝大多数的

¹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某日下午，地点：泰国某市（此处需隐匿部分时间、地点）。

²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³ 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下午，地点：泰国曼谷市。

马来西亚华人都能非常熟练地使用中文，因此也不同程度受到中文媒体的影响。陈志明认为，东南亚华人与中国人存在一种文化相关性（Cultural relevance），种族意识较强的人虽然不在政治上认同中国，但却在文化上认同中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仍视中国为“祖国”。¹马来西亚的青年学者李慧易则认为，作为中国大陆影响海外华人的其中一项资源——华人媒体，在感受中国崛起后，华人媒体便介入了崛起浪潮，开始塑造中国图像、中国形象，以促进双方关系。“马来西亚政府数十年来对待华人的政策不公，遇上中国以其强大实力对外呼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难免海外华人潜在内心的中国情感可能再次激发。”²马来西亚华人同时也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马华公会也在公开地大力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并及时跟踪中国的发展。这些，或多或少地都对马来西亚华人产生了影响。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关注和积极回应“中国梦”主要是第一代、第二代居多，第三代也有一些。由于马来西亚华人都有较强的中文阅读与沟通能力，因此他们更容易了解中国的信息并时常关心中国的发展，也为中国的崛起而自豪。一位五十多岁的第二代华裔导游说：

中国这一两年给我的印象，习近平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做领袖之后让我们感到中国的强大。以前马来西亚有一个非法集团，经常带中国乡村的年轻人去欧洲当非法劳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一个普遍的乡村人要去欧洲当劳工，至少需要17万多马币，十年之内才能还本钱，那还要靠在那边规规矩矩地工作十年之后才能还得起这笔钱。现在中国人去欧洲，大受欢迎，十年之间欧洲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十年前当时法国的名牌店的客户是日本人，但现在都是中国人，让人觉得中国强大了，开始重视华文了，重视中国了。华人都有一种自豪感，以前中国人要过关都不容易，现在中国强大之后，马来人也不敢叫我们回唐山了。³

一位出租司机、五十多岁的第三代华裔也每天阅读中文报纸，并与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交流信息，他对中国当前的发展表示极大的赞赏：

我有空闲的时候就会去阅读报纸，另外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来马来西亚，所以我了解不少有关中国的事情。你们的习近平不错啊！他已经修改了那个宪法，他可以连任二十年。

中国现在好了，因为政策恰到好处，所以经济就起飞了。这对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是有影响，我们这里不少华人去中国寻找商机了。中国崛起后，马来西亚华人脸上也是有一点点光吧，毕竟都是华人嘛。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中国占有优势嘛。一定是美国会输的，中国会占有优势。

至于中国统一台湾的事情，中国是要统一的，最终台湾硬头皮也会答应的，最终还是要统一回去的。中国强大之后，台湾最后一定是会点头的。你看香港都已经同意了。其实不用想这么多的，现在人们的脑袋都很发达了，不会通过武力去搞掉一个地区的，只是行政上有一点点改变罢了，只是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罢了。⁴

从这次实地调研我们得到的印象是，相对于那些关注和关心当代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富强的五十岁以上的华裔，年纪较小的华裔对中国的兴趣明显要低许多。一位三十多岁的第三代华裔、经营着一家私营小旅馆的老板对我们说：

马来西亚华人不会把中国看作是祖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我的英语会好过我的中文许多。我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没有去过，我不觉得我与中国有什么关系。我认为

¹ 参见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版。

² 李慧易：《马来西亚华团领袖回应中国梦——公民与民族两身份之间》第54-56页，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15年。

³ 访谈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檳城市。

⁴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7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中国是很强大，但我不会觉得自己因此而骄傲。我是马来西亚人，中国强大跟马来西亚人有什么关系？它变得多强大都与我无关。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不代表其他华人，但我觉得大部分华人的想法会是与我一样的。¹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似乎年纪越轻，就越对中国缺乏兴趣。我们在吉隆坡通过偶遇抽样访谈了一些华裔青年。一位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代移民的二十多岁的华裔说，自己在大学期间自始至终接受的都是英文教育，学的是马来西亚的历史，没有学习中国历史，所以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很少：

“一带一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中国在马来西亚有投资项目啊。关于中国，我看过《三国演义》，我只知道这些。中国人对我来说算是我的远亲吧，我的祖国是马来西亚。我确实不了解中国，也很少关中国的事情。像我这样的马来西亚华人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祖国了，只有少部分把中国作为祖国的。还有你说的中国统一的问题，我是外人，这不关我的事啊。²

一些马来西亚华裔对于来自中国政府的关心，则较强的排斥心理。他们以文字的形式在《星洲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政府的关心或“呼唤”公开地表示排斥和批评：

黄惠康（注：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茨厂街巡防后，再有感性的语言：“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延续多少代，海外的华人、华侨，中国永远是你们温馨的娘家。”他的“娘家呼唤”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被解读为华人靠山，也被视为华人向中国伸诉得到黄大使的呼应。

红衫军领袖嘉马尤努斯煽情地说：“华人有中国，马来人只有马来西亚”以合理化“华人回唐山”论调所言有据。巫统最高理事及副农业与农基部长达祖丁更警告华人，如果再动辄告洋状，就会受到掌掴。他说：“马来西亚的华人不要妄想有‘大老板’会到来，有‘教父’从中国来帮忙他们。”

黄惠康提到的海外的华人、华侨（Overseas China）回娘家，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确让人对历史的误读而容易被居心不良者所扭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因此，黄惠康所指的华侨是中国公民，如果马来西亚还存在中国华侨，勉强而言是上个世纪那些从中国南来谋生落地生根，而至今还未获得公民身份的人，而中国早已对这些已逝世和步入晚年的数十万之众视为弃民任由自生自灭，完全放弃护侨之责。再有就是中国新娘，因多数还未入籍而成为大马公民，其华侨地位仍受中国关照。

大马华人在上世纪已放弃华侨身份而选择成为大马公民，后代亦是，即使想回去也投靠无门。因此，黄惠康“温馨的娘家”其实放空炮，对历史的弃民造成遐想，而以目前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任何娘家的实际体制呵护海外的华人和华侨，“不管延续多少代”回娘家已造成马来西亚华人遭受其他族群的猜疑。

一些人把黄惠康回娘家的呼唤配上习近平的照片载上社交媒体，与有荣焉暗示我国华人得到庇护。但有更多华人斩钉截铁与中国切断娘家关系而自称是马来西亚人。因此，黄惠康有必要选择适当的场合进一步讲解和厘清回娘家的含意。以免他的感性之言带来恶性循环。³

对来自中国官方的关心的排斥，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热情会招致马来人对华人国家忠诚度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马来西亚大多数华人已在政治上完全忠诚于马来西亚⁴。很显

¹ 访谈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檳城市。

² 访谈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下午，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³ 林放：“中国娘家放空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5年10月6日。

⁴ 实际上，马来西亚华人不仅对“娘家呼唤”表示排斥，对中国政府呼吁他们“做好马来西亚公民”也曾公开表

然，不少普通的马来西亚华裔民众对中国提出的“共筑中国梦”的召唤也是排斥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也承认自己的种族文化源自中国，但他们已不再“心系中国”。类似这样的、表达自己在政治上与中国无关同时又深爱马来西亚的文章时常出现在华文媒体中，在此我们仅略摘几段：

A：从国家和文化认同上，上几代华裔先贤至今都比任何种族来得清楚两者跟不存在任何冲突，只是一些极端分子硬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历经这过程的华人先贤，如果说他们心系中国还是有可能，也情有可原，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尤其他们开始慢慢融入整个大马社会，甚至可以在国家意识和文化上得到认同，因此他们也清楚了解回到中国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回去寻根，毕竟血缘的源头还是不能给忘了。然而新一代的华人开始出生在大马这块土地上，他们没有像上几代那样心系中国，情牵中国，大马这块土地才是我们的国家。平心而论，许多华人至今都不曾踏入中国半步，对寻根也没太大兴趣，如果中国真如政客所言是大马华人第二个家，这些华人应该可以被打靶了。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对夫家有所抱怨，和有所不满，至少娘家是她们的避风港，然而，中国不是大马华人的娘家，只有血脉的根源，当我们大马华人鄙视强国人的不良文化习惯时，就要明白马来西亚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祖国，别一方面鄙视，一方面又期待中国的支援。¹

B：身为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庆幸我与同辈们，不再惧怕二战的日军，也没灼上 513 事件的烙印，无论是被称为“Cina”还是误判为“China”，我的祖国只是马来西亚。²

C：是人没有不爱国的。是那个国家的人，就爱那个国家，除非你不被看作是那个国家的人，或者，你自己根本不把自己当作那个国家的人。马来西亚独立至今，华人不把自己当作马来西亚人的问题早已不存在。华人的祖先来自中国，一向有人担心华人身在大马，心挂中国，也始终会回到中国去。好了，中国的大门打开，大马华人先后“回”中国去，但是很快便回来，这后面的“回”才是“回家”，“回国”的“回”。你问哪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为什么不住下去，他不假思索应道：“才不要！给我一百万都不要，还是马来西亚最好！”对不起，请别再怀疑了我们都把马来西亚看作唯一的祖国，本来嘛！祖国哪会多过一个的？³

D：我个人最爱国的时候，就是数年前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为我国队伍打气，高喊“Malaysia Boleh”的时候，以前一直认为，这个国家不太爱我，有许多不公平政策加诸在我们身上，所以才去海外留学，但是在彼邦大马同学聚会的时候，聊天话题都离不开家乡，一毕业就回来祖国工作。如果你问我爱不爱国，是的，我爱马来西亚，即使不挂国旗，我也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一分子。生于斯，长于斯，未来也要死于斯。⁴

E：我们可是非常爱国的，而且还天天爱国，分秒都在爱国。不信我向你一一细数。作为学

示抗议。陈志明曾写道：“一些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偶尔发表一些无知的言论，呼吁那些已经认同了各自国家的东南亚华裔忠于各自的国家或应在经济上对各自的国家做出贡献，这些华人视此呼吁为耻辱。1990年，一位中国官员访问马来西亚时呼吁该国华人要做马来西亚的好公民，并为自己的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这个讲话如果是在1950年代华人仍然心向中国的时候是合适的，但是当时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完全认同自己的国家。这个多余的讲话引起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抗议。这位官员在离开吉隆坡时对此作了一些澄清。据报道，1992年4月在马里求斯召开的世界华人大会上，一位中国文化部的官员又提到马来西亚华人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由此再次引起马来西亚华人的愤怒。很显然，中国的官员需要真正了解海外华裔，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尤其是要了解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国家忠诚的状况。”参见 Tan Chee-Beng, 2000.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Language, Nationality and Identity”, in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I*, pp. 29-48,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¹ 苏德洲：“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5年10月9日。

² 张吉安：“支那、China与Cina”，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5年10月4日。

³ 邓如钦：“国庆日叫我回乡”，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0年8月31日。

⁴ 卢慧菁：“爱国之心”，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6年8月31日。

生，我们天天准时上课，听到国歌奏起时便肃然起敬，因为我们从小被培养，要尊敬象征国家的国歌与国旗，同时也要好好装备自己，以便长大后为国家效力。我们长大后，考取优异成绩，光宗耀祖之际，也让国家脸上有光。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深爱着她。¹

F: 自小，我们在飘扬的辉煌条纹下朗唱着“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我们熟悉的是诸如《Lenggang KangKung》这类马来童谣，唱的永远不会是内容夹杂者什么祖国的好女儿、五星红旗等字眼的歌曲。……当国歌在异地唱响，仰望冉冉升起的国旗，一颗心因感动而微颤。……这个国家的荣辱会是我们一世的牵绊。不论在出生证或是身份证的种族栏目上，马来西亚人永远是我们不变的身份。²

以上这类文章一般发表在马来西亚国庆日（8月31日）前后，马来西亚华裔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尽管这个时间段恰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接近，中文媒体在中国国庆日期间也会刊登有关中国国庆的新闻和中国领导人向海外华人发出共筑“中国梦”的信息，但除了在中文媒体和网络上看到一些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精英对“中国梦”有所回应外，我们没有发现马来西亚普通华裔民众的回应，相反，他们却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在中文媒体上一方面公开地申明自己不会“心系中国”，同时又表达自己对马来西亚的热爱（参见上述 A、B、C 三段文章摘录）。

3、印尼

在印尼华裔普通民众中，关注、关心当代中国发展和“中国梦”的也只是少数，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代能够使用中文的华人群体中。这个华人群体一般使用微信，并与中国保持着联系，而另一个在印尼华人中占大多数的、大致六十以下不能使用中文的华裔群体则使用脸书（FACEBOOK），其交往圈局限于印尼的华裔和印尼本地族群，与中国之间联系甚少，对中国的关注、关心也极少。我们在雅加达北区的华人聚居区偶遇到一位刚满七十岁的老华人，他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中国的发展也十分关心：

我是讲福建话的，我曾读华中，所以会普通话。我以前每年都去中国一两次，近来好几年没去中国了，有四五年了。中国的经济比印尼好了。中国强大了进步了对这里的华侨有好处。中国发展比印尼快，很进步，但穷人也很多，因为人太多了。中国投资项目，修建了一个大坝，还有高铁，雅万高铁。印尼本地有人反对了，他们不喜欢中国嘛，不过也有人赞成了。中国很多钱呀！阿拉伯王国也很有钱，但投资印尼的不多，只有中国投资的十分之一。

我也用微信，也用 FACEBOOK，是美国的，也是华人的群，我的女儿就用这个。我有时候看报纸，国际日报，不过很少看了。电视看一些中国的 CCTV4，CCTV15 唱歌的很多歌曲，每天晚上十点半看有关台湾的新闻。我的儿子也想回来，但他在台湾做得很成功了，能够买房子，买好车，我时常去台湾，去台湾我们不用签证，我去了很多国家，我认为新加坡最好啦，因为它人少，中国是好但人太多。中国现在有习近平主席很厉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话中国会乱的，他能够控制局面嘛。不过他的反对党肯定会有有的啦，我也支持他最近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度改变的啦，因为他做得好嘛。以前江泽民主席的时候并不关心印尼华人呀，印尼好像一个孤儿呀，现在不同了，习近平很关心东南亚的华人啊，他在讲话里面有对华人的关心啊。³

一位 72 岁的第二代华人、目前在雅加达经营一家小冰饮店的老太太，每天都关注和关心中国的新闻。她从小受亲中国共产党的父亲的影响，是唱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长大的，一直在亲中国共产党的华人社团开办的华文中小学读书。她说道：

现在印尼哪里能够跟中国比呀！你知道吗？印尼是多么落后的国家！我也常常看电视，在电

¹ 陈开德：“挂国旗与爱国意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06年8月31日。

² 何俐萍：“没有外来者”，《星洲日报·砂拉越评论》，转引自星洲网 2015-10-20，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055355.html。

³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9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视里看也知道中国很好的啦！我常常看那个 CCTV4，香港的凤凰台，我也看台湾的台，有一个台是中立的，《环宇新闻台》，我就爱看新闻，我最爱看新闻了，我常常看微信的腾讯新闻，我加的中国微信群就有两三个。蔡英文刚刚从美国回来，今天有一个小国就跟台湾断绝邦交了，是一个小国，今天早上，哈哈哈哈哈。为什么断绝邦交？哎呀！它说：我跟中国不是很好嘛？我又打不过中国，另外中国也有钱嘛，蔡英文有什么好嘛。

如果中国不是共产党，这么多党怎么治理国家呀，你看台湾这么多党，在国会里面又吵又打的。台湾电视，每天我都看的。中国这么多人口，如果（政治）有什么变动，很危险的，不能乱，这样很好！一个党就够了，不要像印尼那样，几十个党，整天吵来吵去，工作不会做，单单吵。他们每天上班就考虑怎么吵架。中国这样好，由一个党说了算，不用吵架，我常常看台湾打得半死，哎呀！那个惨呀，打到有人上医院。人家全世界看你呀。这看中国这么大，还是静静的，多好呀。如果有很多党的话，中国这么大，会分裂的。如果能够统一台湾，就给台湾两个或三个党存在就好啦。

不过，虽然我们这一代还能讲中文，对中国还有感情，但将来印尼年轻的一代华人既不想学中文，也对中国没有什么感情了。¹

以上两个受访者都是第二代华人，由于他们接受了中文教育，并受其长辈的中国情结影响，因此其一生对中国都是很关心的，但这个老年华人群体毕竟很快就要消失，他们所承载的浓厚的中华文化情结和中国情结到了新生代华裔那一辈恐怕是难以为继了。或许是因为太多的印尼普通华裔民众并不大关心中国，因此有时即便在印尼举办有关中国的重要活动，华裔媒体人也较少参加并未加以广泛报道。一位印尼资深的华裔媒体人说：

印尼一般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带一路”，我看华人也不知道。我是印尼新闻界作为华人去听习近平讲“一带一路”演说的。2013年10月23日习近平到印尼国会演说，当时提出了“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等问题。在国会的这个演说，发请帖给460个国会议员，100多个人民代表，加起来总共有500多个名额。可是那天到会的国会议员却不到100个，只有几十个而已。本来我可以带十个人去的，我是通过一个议员的关系，后来以议员的身份去的。印尼人根本就不想去。我在会场是坐在前面，前五排之一。习近平就从我前面走过，我就跟他握手，第一个是我跟他握，第二是议长，第三个是中国驻印尼大使，第四个是彭，第一夫人啊。印尼新闻界华人没有人去，有的都是中国来的新华社或者中央台的，你看看，多么可怜。一个国家元首来演讲，印尼的国会议员不要说一半啦，不到一百个人。二十 percent 都不到，座位也不满，所以我们就坐到前面去，不然前面就更空荡了。讲出来，印尼很丢脸嘛，人家国家元首来演说，你竟然没有办法叫你的议员来参加。每个议员都收到请帖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办公室，各有两个秘书的。他们是可以不来的，没有强迫要来的，议长也不会命令他们来的。所以这件事讲起来让人生气吧？他（习近平）的演说其实很好。²

这位受访者认为印尼华人也不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很可能绝大多数普通华裔民众确实如此。2018年8月，我们有意选择了不能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二十多位华裔（不包括华裔精英）进行了访谈，其中仅有一人说自己“知道一点点”，而当时“一带一路”建设已在印尼取得丰硕的成果。许多华裔受访者对当代中国发展情况的了解也并不多，有些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更谈不上回应“中国梦”了。在此我们也将相关的访谈记录摘录如下：

A（万隆某大学教职员工，约25岁；访谈通过印尼语翻译进行）：我的祖先什么时候移民到印尼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不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但我去过香港旅游，去

¹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² 访谈时间为2018年8月18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年去过台湾，哦，台湾也是中国（笑）。我也没有看过中国的电视节目和报纸。我与中国应该有关系吧，因为我的祖先是那里来的。另外，我也听了新闻，知道习近平讲过，他说如果印尼华人有什么麻烦，可以去中国避难（印尼语翻译此时补充道：“这句话我也听说过”）。¹

B（雅加达电子城皮革店老板，约 60 岁；访谈通过印尼语翻译进行）：我的祖先是来自海南的文昌来的。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妈妈也是在这里出生华人，我是第二代，爸爸从海南过来的。我现在看报纸主要是印尼文，有时候也看中国的电视、电影。主要是关心本地新闻。我知道中国现在的 president 是江泽民，毛泽东是第一的，邓小平最好了，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中国的统一问题嘛，这个我不懂。²

C（雅加达电子城相机店员工，约 25 岁；访谈通过印尼语翻译进行）：我是第四代了。我也不清楚祖籍地哪里的。五年前，妹妹（在印尼出生的）嫁给上海人了。妈妈可以讲华语的。但我认为我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知道中国比印尼发展好很多。我只看印尼的电视台，不看中国的电视台。我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是谁。我也不关心中国的信息。³

D（雅加达电子城钟表店员工，约 25 岁；访谈通过印尼语翻译进行）：我是第三代。祖先是客家人，广东那边。我们是从西加里曼丹过来的。来雅加达很久了。没有去中国，也不知道中国在哪里。因为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很少讲到中国祖籍的情况。我看的都是本地电视，所以对中国没有了解。我们只知道这些东西是中国制造的。我们西加里曼丹（靠近马来西亚的古晋）的华人去台湾的比较多，对中国了解很少。⁴

以上几位受访者是在雅加达、万隆等印尼主要城市通过偶遇选择的，是二十多位受访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对中国的了解以及相关的想法与华人社团精英人士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其主要差异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的缺乏兴趣，对中国的了解甚少，他们已成为本土化较高的华裔群体，不会中文也不了解中华文化，这很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印尼华裔的基本状况。在中国崛起、掌握中文所带来的益处更多的背景下，许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但所有的受访者都对下一代华人的中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感到忧虑。我们也感到，下一代印尼华裔似乎正与“中国梦”和中国渐行渐远，近二十年来许多人所关注的以中华文化遗产为表征的“再华化”是否能真正拉近这个代表着未来的华裔群体与中国的距离，确实仍存在比较大的疑问。

四、东南亚华裔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梦”给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崭新形象，海外华人如何想象和期待这一美好的愿景？这似乎与他们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评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0 年前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中国梦”宏伟蓝图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东南亚华裔是否对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给予较高的评价？具有中华血统的海外华裔给予中国的评价是否会高于对美国和日本的评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 2012 年的一项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

该项调查以留学中国高校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试图通过这个特殊的海外华人群体对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评价来了解东南亚华裔青年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⁵。我们选择两广的高校作为调查点。广东和广西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三大侨乡，也是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关系的前沿地带，是招收东南亚留学生较多的省区，具有较大的代表性。而了

¹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²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7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³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7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⁴ 访谈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7 日下午，地点：印尼雅加达市。

⁵ 需要注意的是，该调查样本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们仍不认为应将样本调查的结果推论到整个东南亚华裔群体，更不能推论到所有的海外华人。

解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一个较好的途径是选择东南亚非华裔留学生作为参照系。因此，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中包括了来自东南亚的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¹。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我们还从填答问卷的被访问者中选取一部分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进行访谈。在两广地区院校共访问了80多位东南亚留学生、学生干部、老师以及与东南亚留学生有接触的人员，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情况及其对当代中国形象评价的资料。本节对核心议题的分析则主要建立在问卷调查数据、深度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表 4-2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问卷调查的样本分布

国别	样本总人数 (n=)	占总样本量比例 (%)	回答是否华裔样本					
			回答是否华裔人数 (n=)	占回答总样本的比例 (%)	华裔		非华裔	
					样本数 (n=)	占本国样本量的比例 (%)	样本数 (n=)	占本国样本量的比例 (%)
文莱	5	0.4	5	0.4	3	60.0	2	40.0
缅甸	56	4.7	52	4.7	41	78.8	11	21.2
柬埔寨	30	2.5	25	2.2	8	32.0	17	68.0
印尼	250	21.1	223	20.0	180	80.7	43	19.3
老挝	67	5.6	41	3.7	18	43.9	23	56.1
马来西亚	120	10.1	119	10.7	117	98.3	2	1.7
菲律宾	27	2.3	27	2.4	21	77.8	6	22.2
新加坡	15	1.3	15	1.3	15	100.0	0	0.0
泰国	219	18.4	177	15.8	82	46.3	95	53.7
越南	400	33.6	326	29.2	29	8.9	297	91.1
合计	1189	100.0	1010	100.0	514	50.9	496	49.1

资料来源：两广地区东南亚留学生问卷调查（2012年1月）。表中未明确是否为华裔身份的有179人，占总样本数的15.1%。

我们参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界定的软实力概念及其采用的对一国软实力或国家形象调查的测量方法²，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五个维度来衡量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国家形象进行评价。这五个维度又分别包含几个具体的测量指标：政治方面包括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3个指标；军事方面包括军事实力1个指标；外交方面包括干涉别国主权程度、人道主义援助2个指标；经济方面包括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前景3个指标；社会文化方面包括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3个指标。调查问卷即根据这12个指标设计，每个指标在0-10的范围内打分，除了“干涉别国主权程度”项0分表示不干涉、10分表示干涉非常多之外，其他11项均为：0分表示非常差，10分表示非常好；此外，评价指标中还有就“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的判断。每一个指标，不仅要求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对来华前、来华后的中国印象打分，同时还要求对美国、日本、印度及其来源国的印象打分，以便比较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是否有差异、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否有变化，以及他们对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家形象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

问卷数据显示（如图4-1），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评价，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11项指标（不含干涉别国主权项），来华前后有显著差异，来华后的评价低于来华前，来华前后对中国形象的评分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低，且他们给

¹ 该问卷调查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抽取广西、广东的高校，选取两广留学生较多的15所学校作为样本院校。然后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东南亚留学生样本，在样本学校根据东南亚各国留学生在总体中的比例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89份，其中有1010人回答了是否为华裔，华裔514份，占50.9%；非华裔496份，占49.1%（详见表4-2）。

²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oft Power in Asia*, April 2008.

来源国、美国及日本的评分均高于中国。

（一）政治形象

问卷数据显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治形象（包括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三个方面）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97分降至来华后的5.50分；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均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37分升至来华后的6.49分），只稍高于其对印度的评分（5.42分），但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23分）和日本的评分（7.20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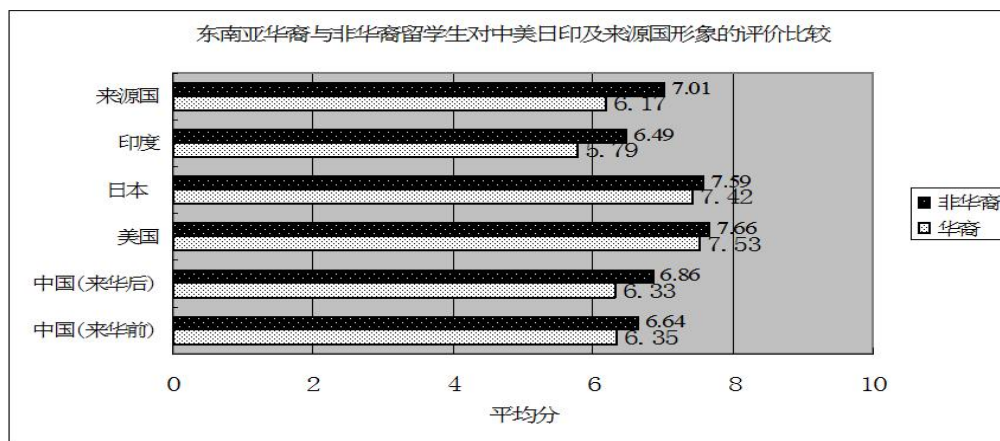


图 4-1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的评分比较¹

1、关于政府廉洁程度的印象

有498位华裔、471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分别对来华前后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分来华前后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低，评分从来华前的5.91分降至来华后的5.50分，其中，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来华前的5.36分降至来华后的4.52分，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5.67降至4.90分。只有新加坡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4.93分升至来华后的6.00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44分稍升至来华后的6.57分。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则从来华前的6.27升至来华后的6.41。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12和0.000）。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评分，不仅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6.88分）和日本的评分（6.85分），而且也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5.98分），仅高于其对印度的评分（5.16分）。访谈中，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廉洁状况的评价也较低。广西民族大学汉语硕士泰国华裔陈同学和吴同学（均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孔子奖学金）都认为：中国太腐败，政治环境不太理想，毕业后不准备留在中国。

表 4-3 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差异

国家 衡量维度	中国 (来华前)		中国 (来华后)		美国		日本		印度		留学生 来源国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华裔	非华裔
政治形象	5.97	6.37	5.50	6.49	7.23	7.39	7.20	7.39	5.42	6.14	5.95	6.96
军事形象	6.96	7.12	7.18	7.52	8.00	8.09	7.23	7.58	5.94	6.66	5.80	6.82
外交形象												
干涉别国主权	5.89	6.56	5.93	6.94	7.33	7.47	6.19	6.89	5.36	6.25	5.19	6.27
人道主义援助	6.48	6.64	6.65	6.77	7.25	7.32	7.26	7.54	5.92	6.75	6.44	7.27

¹ 此表是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的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前景、国民素质、科技发展水平、影视音乐吸引力等 11 项的评分的平均分，不含“干涉别国主权”项。

经济形象	6.22	6.59	6.33	6.92	7.65	7.85	7.86	7.94	6.26	6.83	6.39	7.03
社会文化形象	6.14	6.47	6.01	6.59	7.53	7.65	7.53	7.49	5.4	6.09	6.25	6.96
总体形象*	6.35	6.64	6.33	6.86	7.53	7.66	7.42	7.59	5.79	6.49	6.17	7.01

注：（1）各项在 0-10 范围内打分，除“干涉别国主权”项的 0 分表示没有干涉、10 分表示干涉非常多外，其他各项均为 0 分表示非常差，10 分表示非常好。*不含“干涉别国主权”的内容。

2、关于政府行政效率的印象

有499位华裔、469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23分降至来华后的5.70分）均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56分升至来华后的6.71分）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10和0.000）。而且，在华时间越长，华裔留学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越低（p值=0.002，Beta=-0.009）。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分高于对印度的评分（5.55分）和其来源国的评分（5.63分），但远低于对美国的评分（7.29分）和日本的评分（7.39分）。第三，不同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有所差别。除了老挝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76分升至来华后的6.06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44分稍升至来华后的6.45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均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其的评分从5.54降至4.50，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6.10降至5.29，给分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4.67分降至来华后的4.00分。

3、关于人权状况的印象

有493位华裔、469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人权状况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有明显的差别，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无论是来华前还是来华后均明显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76降至来华后的5.31，而非华裔留学生的给分则从6.29升到6.35。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来华前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而且，华裔留学生在华时间越长，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越低（p值=0.034，Beta=-0.064）。

图 4-2、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对中国形象各方面的评分比较¹

¹ 本图说明：（1）除“干涉别国主权”项 0 分表示没有干涉、10 表示干涉非常多外，其他各项 0 分表示非常差，10 分表示非常好。（2）“前”：指来华前的评价；“后”：指来华后的评分。（3）图例数字表示测量项目：

第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远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53分）、日本的评分（7.35分），也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6.37分），仅比其对印度的评分（5.54分）高。除柬埔寨华裔留学生外，其他东南亚9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均低于其对来源国的评分，甚至曾经历过1998年风暴的印尼华裔留学生对印尼人权状况的评分（6.47分）也高于其对中国的评分（从来华前的6.10分降至来华后的5.67分）；来源于因军人专制而被西方国家制裁的缅甸华裔留学生对缅甸人权状况的评分（5.77分）也高于其来华后对中国的评分（5.60分）。

第三，东南亚10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分有些差别，除老挝、越南华裔留学生来华后评分比来华前有所提升（老挝从5.00分升至5.59分，越南均为6.32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均有所下降，其中，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给分最低，从来华前的5.16分降至来华后的4.49分，其次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给出的从来华前的5.90分降至来华后的5.00分。笔者询问在中山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菲律宾华裔女研究生：“在民主方面，你认为菲律宾和中国哪个更好？”她说：“菲律宾更自由一点。菲律宾上网没有限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跟普通原著民一样，华人也可以参加选举。”广州美术学院马来西亚华裔郭同学则说：“在民主自由方面，马来西亚比中国好，马来西亚言论自由，可选自己的政党，有人敢说话。而这里是共产党领导，有牢骚也不敢说。中国贫富差距太大，马来西亚贫富差距不会像广州这么大，像大学城建设得很漂亮，但周围农村很穷。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更穷。而马来西亚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对土著人有优惠政策和补助。”

（三）军事形象

有490位华裔、465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军事实力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两个群体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分均较高，华裔留学生评分从来华前的6.96分升至来华后的7.18分。除菲律宾、缅甸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分别从6.52分降至6.24分、从7.30分降至7.23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分均比来华前有所提升。其中，最高分是新加坡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从来华前的7.67分升至来华后的8.40分；最低分是文莱华裔留学生给出的分数，来华前后均为5.33分。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更高一些，从来华前的7.12分升至来华后的7.52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两个群体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值为0.166），但来华后的评价有显著差异（p值为0.004）。第二，东南亚十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军事实力来华前后的评分均高于其对印度（5.94分）和来源国（5.81分）的评分，但低于其对日本（7.23分）和美国（8.00分）的评分，在他们看来，中国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且呈不断增强之势，但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美国仍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非华裔留学生的看法基本类似。

（四）外交形象

关于外交形象，主要从干涉别国主权和人道主义援助两个方面来测量。

1、关于干涉别国主权方面的印象

有487位华裔、448位非华裔东南亚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分从来华前的5.89分升至来华后的5.93分，除文莱、泰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印象来华后比来华前有所好转外，其余各国华裔

1=政府廉洁程度；2=政府行政效率；3=人权状况；4=军事实力；5=人道主义援助；6=干涉别国主权；7=产品质量；8=企业家精神；9=经济发展前景；10=国民素质；11=科技发展水平；12=影视音乐吸引力。（4）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来华前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印象”、“来华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来华前、后对中国在贵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印象”以及“中国的影视吸引力”等项指标上，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sig. (2-tailed) 位于 0.166 至 0.900 之间；其他各项指标的 sig. (2-tailed) 均小于 0.05，表明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存在着显著差异。

留学生来华后的印象均变差。而非华裔留学生则从来华前的6.56分升至来华后的6.94分。两个群体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价来华后均比来华前差。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干涉别国主权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 p 值均为0.000）。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评分低于其对美国的评分（7.33分）和日本的评分（6.19分），但高于其对印度（5.36分）和来源国（5.19分）的评分；而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的评分低于对美国的评分（7.47分），高于对日本（6.89分）、印度（6.25分）和来源国（6.27分）的评分。这表明，在华裔留学生眼中，中国干涉别国主权比美国和日本少，但比印度和来源国多；而非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干涉别国主权比美国少，但比日本、印度和来源国多。

2.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印象

在问卷，“人道主义援助”即“当某个国家有灾难时，其他国家给予这个国家医疗、食品等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有489位华裔、447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印象评分，统计结果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均有所提高，分别从6.48分升至6.65分、6.64分升至6.77分，华裔留学生评分稍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p 值分别为0.199和0.366）。除新加坡和菲律宾华裔留学生来华后比来华前的评分有些下降（分别从6.20分降至5.60分、从6.24分降至6.10分）外，其他东南亚8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评分均比来华前高些，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评价比较正面。其中，缅甸华裔留学生给分最高（从来华前的8.05分升至来华后的8.33分），其次是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的给分（来华前后均为7.83分），与中国在缅甸、柬埔寨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呈正比。第二，在华裔留学生眼中，美国和日本的人道主义援助比中国做得好（评分分别是7.25分，7.26分），也比印度和来源国做得好（评分分别是5.92分、6.44分）。

（五）经济形象

关于经济形象，从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前景三个方面来测量。

1、关于产品质量的印象

产品质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形象的重要表现，它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有493位华裔、470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产品质量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差（从5.38分降至5.16分），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 $Sig=0.000$ ， $Beta=-0.125$ ）。而非华裔留学生的印象来华后比来华前的评价稍有改善（从5.98分升至6.18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 p 值均为0.000）。

第二，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排列是：日本的产品质量最好（8.20分），其次是美国（7.88分），再次是来源国（6.42分）和印度（6.09分），评分最低的是中国。调查要求留学生列出中国目前亟需改善的方面，被调查对象均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产品质量列入其中。暨南大学缅甸华裔某同学说：“虽然缅甸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但很耐用。在缅甸销售的中国产品虽然很便宜，但用一段时间就坏了，而日本产品虽然价格贵一点却很耐用，所以，缅甸居民大件家电一般买日本产品，有钱一点的家庭也一般用日本和泰国产品，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才喜欢买中国产品。在我的家乡，日本援助修建的一座桥梁很牢固，而中国援助修建的一条公路，通车才几个月就要修补了，因为沙子上面铺的水泥比较少。”同校泰国华裔黄同学说：“在泰国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物品，价钱便宜，也很实用，质量也可以，主要是衣服、鞋子等日常用品，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处于低端的产品；如果要买高档一点的，一般都买日货、韩货、美国货，但是平时买的用的还是中国货比较多。”同校印尼某同学称：“来中国之后就一直用中国产品。”

不过中国产的牛奶不是很好。我一直喝国产的，每次回家都会带来，同学喝了也觉得还是印尼的比较好。至于服装，印尼的比较耐用些，中国的很容易烂。家用电器日本的比较好，我妈的一个朋友卖了长虹电视机，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但我家跟她同时买的那台日本电视机，一直用到现在。”老挝华裔同学阿宝说：“中国产品分好几个等级，在老挝，同样低价钱的衣服，中国产的质量要比泰国产的差很多，但是贵的衣服质量就好很多。”非华裔留学生也有同样的印象，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广西中医学院范同学说：“中国产品广告虚假，出口的也有不好的。中国的水果农药太多，好看但不好吃。而越南的虽然不好看，但很甜很好吃。”

第三，尽管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普遍较低，但不同国家学生的评价也有差别。其中，评价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 4.33 分降至来华后的 4.00 分），其次是菲律宾（从 4.86 分降至 4.05 分）、马来西亚（从 4.73 分降至 4.25 分）、新加坡（从 5.33 分下降至 4.40 分）、越南（从 6.04 分升至 6.08 分）和柬埔寨（从 6.50 分降至 6.00 分）。总的来看，中南半岛国家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比东南亚海岛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高些，这可能与其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融入世界经济程度有关。

当然，也有不少华裔留学生喜欢中国产品。一位暨南大学马来西亚华侨学生干部常在网上买搞活动用的小礼品，称中国的“网购”很好，可选择的東西很多，既方便又便宜。

2、关于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印象

良好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拼搏、诚实、守信等方面。有 489 位华裔、464 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来华后（6.05 分）差于来华前（6.21 分），且在华时间越长给分越低（ $\text{Sig}=0.003$ ， $\text{Beta}=-0.088$ ）。而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6.79 分）好于来华前（6.59 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004 和 0.000）。第二，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来源国企业家精神的评分中，日本分最高（7.66 分），其次是美国（7.43 分），再次是来源国（6.48 分）和印度（6.16 分），中国企业家得分最低，与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评分是一致的。广西民族大学泰国华裔吴同学说：“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盈利为第一，而不考虑质量。出口泰国的一些农具质量差，一般是卖给贫穷一点的农民，而富有一点的人买日本或台湾产的农具。中国有很多盗版的手表和包包，且要价很高，我曾经将一款包包从 2400 元讲价到 400 元。”第三，来自不同东南亚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分有所不同。除了缅甸、越南和泰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来华后好于来华前（分别从 6.97 分升至 7.00 分、从 6.12 分升至 6.41 分、从 5.96 分升至 6.04 分）、老挝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评分持平（6.29 分）外，其他国家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其中，文莱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从 5.67 分降至 4.67 分）降幅最大，其次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从 5.67 分降至 5.05 分、从 5.59 降至 5.33 分、从 6.83 分降至 6.17 分）。总体上看，中南半岛国家华裔留学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印象好于东南亚海岛国家华裔留学生的印象。

3、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

有 490 位华裔、466 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印象打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来华后好于来华前（分别从 7.08 分升至 7.77 分、7.19 分升至 7.8 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348 和 0.785）。第二，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分均高于其对印度（6.54 分）、美国（7.65 分）、日本（7.71 分）及来源国（6.27 分）的评分。第三，东南亚十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分均高于 7 分，其中柬埔寨华裔留学生给出最高分（来华前后均为 8.33

分），给分最低的是文莱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 6.00 分升至来华后的 7.00 分）。这表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均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暨南大学缅甸华裔杨同学亦称：“中国发展实在太快。刚来时华文学院附近还是荒野，但亚运会前后建起了许多大楼和设施。以前知道中国发展快，但没想到有这么快，发展速度真是惊人。”此外，有 240 位即 47% 的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快，来华留学对自己事业发展有利”是来华留学的主要原因；而非华裔留学生有 184 位即 37.6% 作了肯定的回答，比华裔留学生低了 10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更看重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形势，来华留学对自己和家庭事业有较好的发展预期。柬埔寨华裔黄同学在谈起他为何选择到中国留学时说：“父母和我都认为，要出国留学只去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两国相比，美国上升幅度不会太大，而中国上升幅度会很大，留学中国可以了解中国，中国市场很大，以后柬埔寨与中国经贸关系会很有潜力，所以我来中国留学。”

（六）社会文化形象

关于社会文化形象，从国民素质、科技发展水平和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三个方面来测量。

1、关于国民素质的印象

有 489 位华裔、455 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国民素质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来华后明显低于来华前（从 5.76 分降至 4.78 分），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 p 值 = 0.000， β 值 = -0.166）。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高于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 6.42 分稍升至来华后的 6.44 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后两个群体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均有显著差异（ p 值均为 0.000）。第二，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国民素质的评分中，中国国民素质得分最低。除了越南华裔留学生的评分来华后稍好于来华前（从 6.88 分升至 6.96 分）外，其他东南亚 9 国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评分均比来华前有所下降。其中，给分最低的是菲律宾华裔留学生（来华前 4.95 分，来华后 3.62 分）；来华前后评分降幅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从来华前的 5.05 分降至来华后的 3.89 分）。其次是印尼、新加坡、老挝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从 6.46 分降至 5.13 分、从 5.73 分降至 4.60 分、从 5.31 分降至 4.44 分）。降幅较小的是缅甸和泰国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分别是 6.10 分降至 5.59 分、从 5.01 分降至 4.49 分）。总的来看，东盟老成员国（新、马、印尼、泰、菲和文莱）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分明显低于东盟新成员国（越、老、柬、缅）华裔留学生的评分。

一位在中山大学攻读汉语专业的菲律宾华裔研究生说：“中国人爱插队。坐地铁时，车上的人还没下来，就抢着上车了。有的地方不干净，如吃饭的地方不太讲究卫生。在菲律宾也只有在唐人街有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老一辈华人可能还不太讲卫生，但青年华人已经很讲卫生，主要是菲律宾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暨南大学泰国华裔黄同学说，“来到中国后发现人们有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我不太习惯。比如说说话声音很大，人多推撞，随地吐痰，厕所有异味比较难受。最不习惯的就是这里的服务态度，感觉非常不好，比如去银行办个卡，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那些职员，他们都不太想理你，在超市买东西也是一样。我之前去过香港，感觉就是天差地别。我发现香港的乞丐也是很有秩序的，他们不会向你讨钱，即使你给他他也不要，而在这边经常会有乞丐乞讨，这和政府的福利政策是相关的，香港做得很好，当然，可能中国大陆人太多，政府也很难照顾得了那么多。总之，就是觉得中国发展得太快，进入一个新时代，但人好像还没跟上，可能上一代人就是这样，不过年轻一代会好很多，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会不一样。”广州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华裔某同学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讲卫生。但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位主任医生在广州大医院的大厅里随地吐痰，连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讲卫生，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文专业的马来西亚华裔硕士说得更为生动：“有一次留学生与中国大陆同学

聚会，一位大陆男生竟将长长的鼻涕挂在树上，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不问同学要手纸呢？”还有的华裔留学生遇到小偷、被骗的情况。暨南大学一位缅甸华裔留学生刚到广州时，曾接到一个电话请他汇款到某个账户上，他老老实实在地将钱汇到电话所报的账户上，后来才发现是被骗了。

2、关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印象

有494位华裔、463位非华裔东南亚留学生对来华前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印象评分，问卷数据显示：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评分来华后（7.14分）比来华前（6.57分）高，而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差别不大（从来华前的6.82分升至来华后的7.16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来华前两个群体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有显著差异（p值为0.033），而来华后两个群体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值为0.900）。第二，在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的评分中，印度得6.34分，来源国得6.08分，日本得8.30分，美国得8.21分。在华裔留学生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比印度和留学生来源国高，但比日本、美国仍差一大截。

3、关于影视音乐文化的吸引力

一国的影视音乐文化及其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其产品是否受欢迎也是衡量其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受欢迎的一个指标。关于中美日印及留学生来源国的影视音乐吸引力问题，只有广东7所学校的526位东南亚留学生（其中408位华裔，118名非华裔）进行了评分，根据问卷数据统计结果和访谈资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影视音乐吸引力的评分（6.10分）稍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6.18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显示，两个群体对中国影视音乐文化吸引力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p值为0.758）。暨南大学汉语专业的泰国华裔黄同学称：“以前在泰国因不懂中文，不怎么看中国的节目。但我爸爸很喜欢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尤其喜欢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剧，觉得它们制作得很细致。我来到中国后，也看了很多电视节目，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上网看一些中国电视剧、电影、娱乐节目，也会听中文歌。如看过‘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发现在中国家长会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节目相亲，这在泰国是比较少见的。”广西民族大学汉语专业硕士泰国吴同学说：“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天龙八部》等。也看一些娱乐节目，比如‘快乐女声’，中国目前的女性都走中性化的路线，比较流行中性的风格。”

第二，华裔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及其来源国的影视音乐吸引力的评分比较接近，他们最喜欢美国影视音乐产品（评分分别是7.37分和7.49分），其次是日本（分别给了6.97分和6.65分）和来源国（分别给了6.04分和7.06分），印度得分最低（分别给了4.08分和4.88分）。而对来源国影视音乐产品的喜好，非华裔留学生比华裔留学生的给分要高出近1分，说明非华裔留学生作为原著居民更喜爱本土文化产品；而华裔留学生更喜欢西方文化产品。暨南大学印尼华裔王同学对笔者说：“我首先喜欢看日本动漫，如《火影》等；其次是美国电影，一般在电脑上下载看，也喜欢看韩剧。而中国的动漫不好看，看过一点《喜羊羊》。不喜欢看印尼的电视剧，太长，不紧凑。”

第三，东南亚十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影视音乐吸引力给分高低不同。其中，给分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4.90分），其次是新加坡华裔留学生（5.92分），可见这两个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多的华族学生群体反而对中国影视音乐的评分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裔留学生；而文莱和缅甸华裔留学生的给分较高（分别为7.33分和7.13分）。

（七）关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但也有猜疑和担心，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的新闻媒体甚至不断宣传“中国威胁论”。而留学中国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经过在中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他

们就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持什么看法呢？我们的调查结果是：

第一，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问题，在514位被访的华裔留学生中，38.9%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16%的人认为是“威胁作用”，40.7%的人选了“不好说”，23人（4.5%）没有回答。有496位非华裔留学生亦填答了此问题，其中，32.3%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15.7%的人认为是“威胁作用”，46%的人选了“不好说”，有30人（6.0%）没有回答。这些结果说明，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对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问题上，比非华裔留学生持有较为正面的看法。

第二，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就中国发展对世界影响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印尼华裔留学生中有46.1%的人认为起“稳定作用”，是东南亚十国华裔留学生中比例最高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也有39.3%的比例。认为中国发展对世界起“威胁作用”比例较高的国家华裔留学生有老挝（27.8%）、柬埔寨（25%）、越南（24.1%）。选择“不好说”超过50%的有文莱（100%，个案数少于5个）、柬埔寨（50%）、缅甸（51.2%）、新加坡（60%）等国华裔留学生，“不好说”既有可能变为“稳定作用”，也有可能是“威胁作用”，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也许该比例就会改变。在访问中，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关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广西民族大学的泰国华裔（祖籍广东汕头人）吴同学说，“中国发展起来会对世界有威胁作用，因为中国政府对国民的福利较差，所以发展后也不会对世界人民起更好的作用。”而暨南大学的印尼华裔王同学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是稳定作用，就自己的感觉来看，中国不会称霸，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

图 4-3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认为中国与其来源国发展密切关系的领域

（八）关于中国与来源国关系的发展预期

关于中国与华裔留学生来源国的关系发展预期，有495位华裔留学生回答了此问题，其中，有71.9%的人认为在经济方面，58.2%的人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43.6%的人认为在外交方面，34.1%的人认为在民间交往方面，17.0%的人认为在政治方面，7.7%的人认为在军事方面。与此相对，非华裔留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3.7%认为在经济方面，59.7%的人认为在文化教育方面，32.5%的人认为在民间交往方面，32.3%的人认为在外交方面，18.1%的认为在政治方面，11.9%的人在军事方面，中国与来源国可以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两个群体对中国与其来源国关系的发展预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更看好中国与其来源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对中国与其来源国的政治、军事关系的发展预期华裔留学生比非华裔留学生较为保守。

（九）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因变量是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均以0—10分表示，属于定比变量或连续变量。评价的项目分别是：政府廉洁、政府效率、人权状况、国民素质、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总体形象则是对上

述各个项目评价分值的加总。

表 4-4 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形象评价的因素

	政府 廉洁	政府 效率	人权 状况	国民 素质	产品 质量	企业家 精神	总体 形象
性别（虚拟，男=1）	.051	.067	.083	.163***	.046	.077	.106*
已经在中国的时间	-.078	-.036	-.106*	-.131**	-.119**	.003	-.105*
获得中国奖学金（获得=1）	-.003	-.002	.003	.071	.001	.037	.027
汉语水平	.000	-.102*	.032	.130**	.025	.008	.017
是否与中国学生同住（是=1）	-.086	-.156***	-.133**	-.071	-.119**	-.169***	-.156***
是否参加校学生会（是=1）	.010	.039	.092 *	.033	.083	.046	.062
N（样本量）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F	1.16	3.08	2.87	3.84	2.41	2.19	3.33
R Square	.019	.049	.046	.061	.039	.036	.056

注：*** p < 0.01, ** p < 0.05, *p < 0.10。

表 4-3 的数据表明，在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中，与女生相比，男生倾向于对中国的总体形象、国民素质给予较好的评价。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到达中国的时间（以来华的年数为计）越长，就越倾向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国民素质、产品质量和中国的总体形象等给出较低的评分，尤其是对国民素质和产品质量的评价较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31（p < 0.05）、-0.119（p < 0.05）。值得一提的是，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未获得者对中国形象的评价没有差异，换言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不会因为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奖学金而对中国的形象有较好的评价。汉语水平（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也会影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某些方面形象的评价。例如，汉语水平越高，对中国国民素质的评价越高、对中国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价越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0（p < 0.05）、-0.102（p < 0.10）。与中国学生同住一室的华裔留学生倾向于对中国形象给出较低的评价，数据显示，曾与中国学生同住的华裔学生比起那些从未与中国学生同住的华裔学生，对中国总体形象、中国政府行政效率、中国的人权状况、产品质量和企业家精神等的评价明显较低。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否参加学校的学生会组织，与他们对中国的形象的评分没有明显的关系（详见表 4-3）。

（十）小结

以上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如下：

第一，在对中国的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前景、产品质量、企业家精神、科技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影视音乐吸引力等11个方面的评分中，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后的评分均低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分。而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在不干涉别国主权方面的评价好于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他们认为“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起“稳定作用”的比例高于非华裔留学生。

第二，东南亚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对中美日印和来源国的国家形象的总体评分排序相似，美国得分最高，其次是日本，第三是其来源国；中国居第四位，仅比其对印度的评分高。

第三，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对中国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企业家精神、产品质量、国民素质等方面的印象均比来华前差，尤其是国民素质、政府行政效率、人权状况等方面的评分降幅较大，且在华时间越长评分越低，在中国越久越不喜欢中国的影视音乐，这些均属于软实力范畴。而对中国的军事实力、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前景、科技发展水平等硬实力方面，华裔留学生和非华裔留学生来华后的印象均好于来华前，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说，华裔留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后，对中国硬实力方面的印象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他们对软实力方面的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差了。另外，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否获得中国奖学金与其对中国的国民素质、人权状况、产品质量、政府廉洁程度、政府行政效率、中国发展对世界

的影响等方面评分高低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华裔留学生并不因获得中国奖学金而比未获得者对中国这些方面有更积极的评价。

第四，来自东南亚十国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略有不同。总体上看，来自中南半岛国家的华裔留学生比来自海岛国家的华裔留学生的评分高一些。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总体评分最低，他们大都除了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前景、人道主义援助、军事实力等硬较实力的评分来华后比来华前有些许提高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评分来华后均低于来华前，分数也较低。而且，这一类被调查者大都能讲较流利的中文，保持较多的华人特性和中国传统文化。新加坡、菲律宾华裔留学生的评分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之，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总体评价比非华裔留学生的评价差，相对于来华前的印象，来华后他们对中国软实力方面的印象反而变差。这一总体结果与王正绪等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反。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由于来华前后了解中国的途径不同，从而形成印象上的显著落差。到中国留学之前，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主要通过间接渠道了解中国，因此获得相对“比较美好”的中国印象。问卷数据显示，在华裔留学生来华前了解中国的途径（此题为多选题，各项百分比相加会超过100%）中，有55.5%的人通过亲朋好友口述了解中国，52.7%的人通过电影、电视剧了解中国，41.8%的人通过学校教学了解中国，40.4%的人通过大众传媒（报刊、电视、网络等）了解中国，20.9%的人通过书籍了解中国，13.9%通过当地中国游客了解中国，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中国仅有3.7%。访问所得信息与问卷统计结果相符。广州美术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郭同学称：“我家订有华文报刊，所以得以经常阅读华文报刊。”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老挝、菲律宾的华裔留学生称，他们在母国上华文学校和孔子学院，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了解到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可见，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在心目中构建了中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文明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电影电视、亲朋好友口述、学校教学和其他大众传播渠道获得的。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后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新闻信息？（此题亦为多选题，各项百分比相加会超过100%）问卷数据显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期间，有50.6%的人通过中国网页，33.7%的人通过中国电视，33.1%的人通过室友同学，30.2%的人通过母国网页，29.4%的人通过上课，24.7%的人通过父母亲朋，11.5%的人通过母国电视，15.0%的人通过中文报刊，10.7%的人通过港台电视报刊，5.6%的人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新闻信息。可见，中国网页是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华期间了解新闻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次，中国电视、室友同学、课堂教学等也是华裔留学生了解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是，在通讯、网络发达的今天，华裔留学生来源国对他们仍有重要影响，来源国网页、父母亲朋也是华裔留学生了解新闻信息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总之，华裔留学生来华后，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中国社会产生“零距离”接触，他们主要通过中国传媒了解中国信息。但亲眼目睹中国实际情况后，对中国形象软实力方面的评价却有所变差，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二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中国的关系也影响着华裔留学生对中国的评价。海岛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南半岛国家虽与中国传统关系较好，受中国影响较多，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低，这些都成为影响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因素。

三是中国在对外宣传中构建的中国形象可能与现实中的中国形象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在来源国的华文学校和孔子学院学习过中国历史文化，来华前心目中构建的中国形象是“礼仪之邦”，但来华之后，感到真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有差距。暨南大学的柬埔寨华裔黄同学亦称：“在来中国之前，我主要从台湾的电视剧、电影以及大陆的古代剧了解中国，以为中国很文明，但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还是有差异，比想象中的差了一些。”

综上所述，作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代表群体，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是海外华人中对中国了解较多、并愿意在中国接受教育的群体，但并不因其具有中华血统、保持较多中国传统文化、能流利地使用中文而非华裔留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有更积极的评价。针对这一情况，就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是否能在传播和构建中国良好形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来华前主要通过电影电视、亲朋好友口述、学校教学和其他大众传播渠道了解中国，来华后对中国软实力方面的评价变差。这一客观现实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对外宣传应该全面、客观，把中国好的、不好的方面都展示给世人，以构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当然，中国在改善环境、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企业家社会责任、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也须做出更多努力。当然，我们的样本仅源于两广地区院校，还不能完全代表来华留学的华裔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人整体，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检验，希望更多有兴趣的学者在其他地区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

五、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华人社团精英对“中国梦”的回应较为积极，他们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相关言论，并开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活动。但这些“远距离民族主义”实践的组织和参与者主要是少数华人社团精英，普通华裔民众较少参与。印尼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团精英则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认为在言论或行动上回应“中国梦”，尤其是公开组织和参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以及其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动，易于触及政治敏感地带并招致本国政府和社会的质疑。而这三个国家华裔普通受访者大多对中国当前的发展动态缺乏兴趣，较少与中国社会产生互动，因此对“中国梦”缺乏了解或态度相对淡漠。

对当前中国形象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华裔对未来“中国梦”的预期，我们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东南亚华裔学生对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等方面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中国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软实力的评价却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甚至比其对住在国的评分还低。

东南亚一些著名华裔学者对中国向海外华人发出“共筑中国梦”的呼吁持有负面或消极的评价，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东南亚华裔不会积极响应中国的号召，东南亚华裔参与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建设也只是出于谋利的目的，并非源自“爱国主义”情怀；对“中国梦”积极回应的一些华人社团精英尽管只代表了华人口口的少数，但他们的声音往往因其声名卓著而异常突出，从而有可能误导住在国政府和社会对其他多数华人的国家忠诚产生疑问。另一些华裔学者则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更多的只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政治方面的回应是有限的。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东南亚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中国梦”的回应以及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评价。这些描述和分析建立在相关文献资料、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实地调研材料以及我们对在中国留学的东南亚华裔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基础之上。前一种资料主要是住在国的华文报刊、会馆文字资料以及当地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等，第二种材料主要是对当地华裔的偶遇访谈记录和对部分华人社团的访谈记录，第三种材料包括对两广地区 15 所院校的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包括华裔留学生和非华裔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地总结主要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主要结论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尤其聚焦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在这些已取得东南亚住在国国籍的华人中，一部分人具有纯粹的中华血统，另一部分是华人与当地族裔混血的后代，还有极少数不具有中华血统但强烈认同华人身份并已被当地华人认可。我们试图从住在国华人人口的总体上去分析和归纳结论，但鉴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和实地调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分类比较研究，才能尽可能地弥补因这些局限性所带来的总体推论偏差。我们按移民世代将华人分为老一代华人（包括第一、二代华人）和华裔新生代，按社会阶层将华人分为华裔精英（包括华人社团精英、华裔学者）和普通华裔民众，从而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别的华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探讨他们在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以及对“中国梦”的回应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下是我们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

结论一：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华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比较淡薄，尤其是华裔新生代已将住在国出生地视为自己的故乡、家乡，对祖籍国中国及其祖籍地的寻根意愿较低；对中国祖籍家乡有较强认同的，主要是第一、二代等老一代华人以及部分其他移民世代的高龄华裔；在赴中国寻根问祖的活动中，华裔精英的表现比普通华裔民众较为突出，或许是因为新闻媒体对前者的关注更多。相较而言，马来西亚华人比泰国、印尼华人具有较强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在泰国、印尼华人中占较大比例的大多数华裔新生代由于缺乏中文交流能力和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其中国祖籍家乡观念已荡然无存。我们认为，由于老一代华人人数的逐渐消失以及东南亚国家华人新移民所占比例极低，因此这几个国家大多数华人的祖籍家乡观念逐渐本土化（将住在国出生地视为故乡、家乡）并与祖籍国中国和祖籍地渐行渐远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华文教育的复兴、“再华化”现象的兴起、中国有关部门大力开展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及其他致力于拉近新生代华裔与祖籍国——中国距离的活动，已难以改变这一趋势。

结论二：在海外华人是不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问题上，东南亚华人的理解和观念差异较大。有人将中华民族视作中国的政治民族或国族，而另一部分人则视之为华夏种族或炎黄子孙，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些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大多是老一代华人、华裔新生代中中文交流能力较强和具有较强烈华人身份认同的人。而那些具有中华血统但华人身份认同意识较弱或不认同华人身份的人，认为自己并非中华民族成员。泰、马、印尼三国华人社团中的一些老一代精英人士不仅丝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而且还在公共媒体中呼吁华人凝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这方面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精英表现最为突出。

这三个国家多数普通华裔受访者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认知模糊，并对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缺乏兴趣。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则表明，在中国的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与中国学生（或公民）之间普遍缺乏亲近感和“同胞”认同，但却与来自于本国的其他种族学生存在较强的共同体意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华裔新生代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一些在东南亚国家深具学术影响的华裔学者与不少华人社团精英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东南亚华人已经成为住在国民族（如马来西亚民族、印尼民族和泰国民族）的一部分，而中华民族仅包括中国公民（含海外华侨）在内，海外华人并非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结论三：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华人社团精英积极地回应“中国梦”。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相关言论、开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活动，是他们回应“中国梦”的主要行动，这些“远距离民族主义”实践活动主要由少数华人社团精英组织和参与。不过，印尼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团精英则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言论或行动上回应“中国梦”尤其是公开组织和参与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以及其他支持中国的活动，易于触及政治敏感地带并招致本国政府和社会的质疑。

这三个国家的普通华裔民众受访者大多对中国当前的发展动态缺乏兴趣，较少与中国社会产

生互动，因此对“中国梦”缺乏了解或态度相对淡漠。

鉴于对当前中国形象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华裔对未来“中国梦”的预期，我们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中国留学的东南亚华裔学生对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水平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等方面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等软实力的评价却明显低于对美国和日本相应指标的评价，甚至比其对住在国的评价还低。

东南亚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国向海外华人发出“共筑中国梦”的呼吁持有负面或消极的评价，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东南亚华裔不会积极响应中国的号召，东南亚华裔参与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建设也只是出于谋利的目的，并非源自“爱国主义”情怀；对“中国梦”积极回应的一些华人社团精英尽管只代表了华人口口的少数，但他们的声音往往因其声名卓著而异常突出，从而有可能误导住在国政府和社会对其他多数华人的国家忠诚产生疑问。另一些华裔学者则认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梦”的回应更多的只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政治方面的回应是有限的。

总结上述三个方面的结论，我们认为，随着老一代华人人口的迅速消失、新生代华裔日渐远离中国以及迁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占华人人口的比例极低，这三个国家的大多数华人在日益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并在政治上认同住在国的同时，正与中国祖籍家乡、中国社会渐行渐远，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缺乏认同，较少或不关心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也对“中国梦”缺乏兴趣；与此同时，与中国渐行渐近的东南亚华人只占少数。这些结论与王赓武、陈志明、廖建裕等东南亚华裔学者有关东南亚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论断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也认为这些结论已大致地接近事实。

我们这项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仲裁”国内一些学者与部分东南亚华裔学者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的争议。经过几年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研究结果基本支持了后者主要观点，而前者对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的想象、认知与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由于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存在的局限性，上述这些结论尚需更深入的后续研究加以检验，我们期待学术界同仁的批评。

二、政策建议

相对于欧洲、非洲等其他大洲的华人而言，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较长，目前在华人人口结构中华裔新生代比例最大，中国新移民所占比例极小。华人新移民与中国之间维持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的中国祖籍家乡观念更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高，对“中国梦”的关切和期待也更多。而在东南亚华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华裔新生代则已与中国渐行渐远，他们在上述几个方面都难以与新移民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应根据东南亚华人口结构的这些特点制订相应的政策方案，以适应海外华人与当代中国关系变化的新格局。

1、理性地看待大多数东南亚华人与中国渐行渐远的事实和发展趋势。海外华人逐渐远离中国并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与世界各国移民融入、忠诚于新的国家并在政治上、情感上逐渐远离祖籍国的趋势没有什么差别。正如梁英明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几十年来已不再有新的中国移民进入东南亚各国，因而在当地出生的华人比例正在不断增大。这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必然以他们的出生地为永久的家园，他们同遥远的祖籍国的关系也将日趋淡化”¹；炎黄子孙的血统观念也对这些华人丧失了吸引力²。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大多数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不再与中国祖籍家乡和中国社会产生联系与互动、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感甚至不再

¹ 梁英明：“中国改革开放与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² 梁英明、周南京：“略论中国血统主义的历史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认同华人的身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梦”缺乏关注或关心，这些都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应将这个发展趋势视为正常现象，指责那些远离中国、不再认同华人身份或不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华裔新生代为“数典忘祖”是没有意义的。应充分认识到包括东南亚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是具有中华血统的外国公民，但他们并非中国人、中国公民或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梁英明教授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海外华人社会不是中国社会的延伸或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中国不应希望海外华人“心向中国”；“尽管在海外某些华侨华人仍存在上述过时的认识，但它显然并不代表大多数海外华人的认识，也不是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的方向”。¹ 我们也没有必要将海外华人视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因为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不包含已成为他国民族（国族）组成部分的海外华人的。尽管不少国家将海外“离散族群”视为海外本民族成员（national diaspora），并将它纳入本国的民族（国族）共同体，以实施去领土化的民族建构（deterritorialized nation building）战略²，但这并不适合早已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中国。

2、在面向东南亚国家华人的侨务工作中，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如统战部门和侨务机构应逐步淡出，同时应突出和发挥中国侨联等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的作用。我们认为，统战部、侨办等政府机构主要的服务与联系对象应是侨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华侨），而侨联等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与联系对象则主要是已成为他国公民的海外华人。这样的调整是为了适应东南亚地区华侨人口日益减少而华人人人口日渐增多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海外统战或侨务工作的政治敏感性。长期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间社会和政府对华人的国家忠诚度一直不同程度地抱有怀疑态度，激进的排华势力不时兴风作浪³，导致这些国家的华人在与中国官方接触时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谨慎，即便像马来西亚那样的种族关系相对缓和的国家，华人对中国官方“主动亲近”的言行也保持高度的戒备甚至对某些中国官员的“不当言行”公开提出抗议⁴。

总之，要进一步明确统战部、侨办等中国政府机构的海外服务对象主要是华侨而非华人，针对海外华人的侨务工作应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来承担。鉴于侨联同样具有中国官方的背景，因此应尽可能发挥那些无政府背景（或无公共财政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如宗亲会、同乡会等血缘、地缘性民间团体）对海外华人的联络作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国政府机构或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涉侨机构直接与作为外国公民的华人主动接触所带来的潜在不利因素，从而消除海外华人及其住在国的疑虑。

3、规范涉侨宣传工作，避免东南亚华人及其住在国的忧虑和怀疑。尽管东南亚华人仍保留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族群特征，但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不等于他们也认同当代中国文化，更不等于对中国存在政治效忠。他们已创造出本土化的、有别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华族文化，大多数人的祖籍地、故乡或家乡认同已指向住在国而非中国，他们也已成为政治上忠诚于住在国的公民。因此，（1）不应通过新闻传媒刻意渲染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亲缘关系，不夸大东南亚华人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将外籍华人到中国投资、旅游或探亲宣传为“爱国爱乡”或“回报祖国”，这样做可避免海外华人及其住在国误解和疑虑，符合我国实行的睦邻友好外交原则，也符合海外华人社会的实际情况。（2）不应将海外华人称为“侨胞”，或将海外华人笼统称为“旅××华侨华人”，将他们的团体称为“旅××同乡会”，认为海外华人只是在某国的旅居者。这些不恰当的用语同样会引起华人和住在国的误解和忧虑。数十年来不少东南亚知识界华裔精英反

¹ 梁英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² 参见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³ 廖建裕：“印尼反华人势力伺机而动”，新加坡《联合早报》2019年11月1日。

⁴ 参见本报告第四章第三节。

复指出，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人自认为已扎根自己的祖国和故乡，并非“侨居海外”。¹

4、数十年前中国适时地放弃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原则，解决了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应继续坚持。我们应采纳梁英明教授的建议，对所有海外人才一视同仁，不专门为东南亚华人办理“华裔卡”以提供特别的方便。这样即可避免东南亚国家再生疑虑，也能避免其他种族的海外人才感到受歧视²。同样，海外华文教育应定位为不分族裔的教育活动，并非专门服务海外华侨华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住在中国产生中国政府有意使海外华人“再华化”或“重新中国化”的忧虑，有利于和平友好外交关系的发展。

最后，我们认为面向海外华人的侨务工作应首先关注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应尽可能避免其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等一些易于招致住在中国“政治忠诚质疑”的活动，也决不利用海外华人干涉别国内政。鉴于我国老一代华侨华人研究者早已就相关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政策建议，故我们再次引用周南京、梁英明两位教授曾经提出过的重要建言作为本报告的结语，这些建议既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互信、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

祖籍国同海外华人的关系是基于民族感情和相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必须以亲情、乡情和友情为纽带，而不再是基于政治和法律的从属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对祖籍国（中国）承担原来的海外侨民应该承担的政治义务，不能要求海外华人参与祖籍国（中国）的国内政治事务。以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海外华人和社团的标准，实际上是过去对海外侨民实行的统战政策的延续，是不符合当今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方针和政策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做法既不利于海外华人“落地生根”，也不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长远利益。³

海外华人社会在政治上同中国保持距离，对他们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以作为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和拥有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而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天下华人是一家”、“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富贵资源”等等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的提法。华人已经属于不同的国家，在历史的演变中，各国华人出于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已做出了各自的不同选择。我们不应把历史主观主义地凝固在某一点上，始终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来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和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⁴

¹ 上述两点均为梁英明、周南京两位学者多年前曾提出的建言，参见梁英明、周南京：“略论中国血统主义的历史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同时亦参见本报告第四章第二节。

² 参见游润恬：“北大教授梁英明：中国要理智看待海外华人立场”，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2月22日。

³ 梁英明：“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及其民族融合问题：历史与现实”，《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⁴ 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载于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18 期

《水果小贩：洛杉矶的街头摊贩、非法行为和族群社区》

Rocío Rosales 著，加州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书籍简介：《水果小贩：洛杉矶的街头摊贩、非法行为和族群社区》呈现了年轻拉丁裔街头小贩的社会世界。这些被称为“Frutereros”的水果小贩在洛杉矶街头用手推车出售水果沙拉，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由于地方和联邦法律禁止街头贩卖，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法律带来的限制和挑战。

基于六年的实地考察，作者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小贩的日常斗争。在此过程中，她考察了他们的同乡社会网络（paisano）如何既帮助又剥削他们。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如何使他们生存下来，而作者认为这种对族群社区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因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运作往往更为复杂。这本书揭示了这些复杂性，并提出了“族群笼子”（ethnic cage）的概念，用以解释社区的希望和痛苦。该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拉美社会学分会 2021 年度杰出图书奖。

作者简介：Rocío Rosales 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长期关注族群和移民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拉丁裔移民及其在美国的社区生活。

书籍介绍：《水果小贩：洛杉矶的街头摊贩、非法行为和族群社区》是一项围绕洛杉矶街头的拉丁裔水果小贩展开的民族志研究。作者进行了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不仅考察了洛杉矶街头的摊贩市场，还深入到这些小贩在墨西哥的家乡。基于丰富的调查数据，这本书揭示了在洛杉矶这个残酷的移民环境中，同乡情谊（paisanaje）如何既帮助又伤害新来的无证移民。

这项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移民社会网络中的同乡关系（paisano network）。在洛杉矶街头的水果摊贩行业，移民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都非常依赖同乡的支持。书中展示了在美国的拉丁裔同乡如何招募新来的移民，他们有时甚至资助后者非法进入洛杉矶，并为之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当这些小贩出摊售卖水果时，他们帮助彼此运输沉重的手推车到工作地点，并向街头的其他摊贩通报警察和卫生部门的严查情况。工作之余，他们也在同乡聚会上相互交往。这类社交活动可以为同乡提供社群和资源支持，对于那些身边可能没有太多亲属的新移民而言尤为重要。共同工作和相互交往有时也会导致浪漫关系的产生，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同乡网络中的社会关系。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作者发现移民社会网络并不总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关系。她将移民社会网络复杂化为“族群笼子”（ethnic cage）的概念，挑战了传统的以“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模型为代表的族群团结论。“族群笼子”这一概念描述了新来移民在与同乡的合作、互助以及利益竞争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同乡可以帮助新移民找到摊贩工作、住房和食物，但新移民可能好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并且会遭受老板的言语暴力。一些移民因为迁移行程和家庭需求（例如医疗费用）积累了债务，他们在工作环境中感到压力和沮丧。与其他同乡的个人冲突可能导致人际关系受损，这将使得他们很难找到摊贩工作和住房的机会。因此，虽然同乡社会网络可以在一个新的国家为新来移民提供资源、机会和保护，但这些同乡也控制着新移民和他们在墨西哥的家人的生计。

这本书还揭示了移民社会网络是如何在残酷的移民环境中运作的。水果摊贩作为非正规经济中无证移民的现实处境，使得同乡社会网络的使用和滥用如此普遍。在作者收集数据期间，洛杉矶市禁止在人行道上摆摊，警察局、公共工程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会对街头摊贩进行罚款、逮捕，并销毁他们的货物和推车等。支付罚款、购买新货物和新推车会让这些小贩背上更多的债务。此外，如果街头小贩没有合法销售的证件、身份证明，或者无证驾驶，他们就有可能面临逮捕和驱逐出境的风险。正是为了应对地方和联邦的法律政策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些水果摊贩严重依赖他们的同乡社会网络。

除了对洛杉矶街头摊贩市场的调查，作者还前往了这些水果摊贩在墨西哥的家乡，见证了移民的汇款如何变成新房子。但她发现，并非所有移民都可以给家乡的亲属汇款，因为汇款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在移民前后的经济状况，包括他们的债务、在街头小贩中的等级地位，以及获得强大社会网络的机会。那些在家乡就已经很富裕的老板和移民能够定期汇款，而穷人在美国进行同样的操作时则面临困难。通过跨国研究，这本书展示了墨西哥家乡的不平等如何在洛杉矶得到复制和再生产。作者还发现一些街头小贩不愿意和家人说他们在美国遭受剥削和虐待的经历，因为他们担心受到老板的报复和羞辱。由于这些负面消息没有传回家乡，从墨西哥前往美国从事街头小贩生意的迁移路径一直非常稳固。

这本书挑战了以往研究对于移民社会网络的传统理解。在理论层面，作者超越了对社会资本的正向功能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网络更为细致和更具结构性的考察。书中提出的“族群笼子”这一概念突显了移民社会网络具有帮助与剥削并存的双重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街头摊贩行业、移民个人，以及他们的社区生活。作者还将街头摊贩的生存体验置于残酷的移民环境和跨国语境中讨论，正是这些背景因素塑造了移民社会网络的双重性、流动性和矛盾性。在方法层面，为了准确、全面地了解跨境移民的工作和生活，这项研究使用了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的数据收集技术。作者在洛杉矶和墨西哥开展了为期六年的多点民族志调查，通过与街头小贩的家人、社区领袖、劳工组织成员等不同群体的访谈，广泛收集了移民原籍地和目的地的数据。总的来说，本书推进了我们对于移民纽带和跨国社区复杂性的理解，为族群生计、社会网络、劳工运动、移民社区和跨国研究等相关领域做出了贡献。

本文编译整理自：

Santellano, Karina. 2021. "Fruterios: Street Vending, Illegality, and Ethnic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4(8): 1464-1466.

Bustamante, Juan José. 2022. "Fruterios: Street Vending, Illegality, and Ethnic Community in Los Ange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8(1): 309-311.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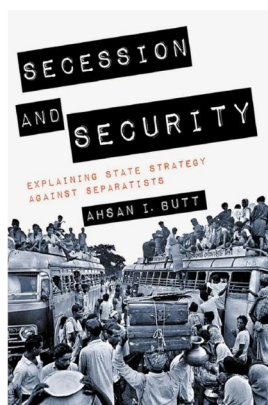
Portes, Alejandro, and Kenneth Wilson. 1980. "Immigrant Enclave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2): 295-319. 移民飞地：迈阿密古巴人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分析

- Edin, Per-Anders, Peter Fredriksson, and Olof Åslund. 2003. "Ethnic Enclaves and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Immigrants—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329-357. 族群飞地和移民的经济成功——来自自然实验的证据
- Sanders, Jimmy M. and Nee, Victor. 1987. "Limits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the Enclave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6): 745-773. 飞地经济中族群团结的局限性
- Rosales, Rocío. 2013. "Survival, Economic Mobility and Community Among Los Angeles Fruit Vendor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9 (5): 697-717. 洛杉矶水果小贩的生存、经济流动性与社区
- Rosales, Rocío. 2014. "Stagnant Immigrant Social Networks and Cycles of Exploit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14): 2564-2579. 停滞的移民社会网络与剥削的循环
(编译: 马乐美, 责编: 吕想, 排版: 胡琼)

【《国外族群研究动态》公众号】第 19 期

《分裂与安全：解释国家对分裂主义者的政策》

Philip Roessler (著)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



书籍简介：二战以来，分离主义冲突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战争类型。这些战争源于一个简单的矛盾：民族主义团体想要一个家园，但这个家园所在的领土，属于一个不愿将之拱手相让的国家。

本书考察了国家在面对分离主义运动时的策略，尤其是对暴力的使用。借助 110 多篇采访，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档案和报纸档案，这本书认为，对外部安全的强调可以解释各种历史背景下分离主义暴力存在或缺乏的原因，包括巴基斯坦对待孟加拉分裂主义者的态度、印度对待阿萨姆邦、旁遮普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分离主义的态度、奥斯曼帝国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互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态度等。

本书获得了 2019 年国际研究协会国际安全研究分会的最佳图书奖。

作者简介：Ahsan I. Butt，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民族主义、政治暴力和亚洲南部。他的作品多见于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Politics and Religion*, 和 *Security Studies* 等著名期刊。《分裂与安全：解释国家对分裂主义者的政策》是他的第一本书。目前正在写作他的第二本书《将我们绑定在一起的谎言：民族主义和历史教育》（“*The Lies That Bind Us: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Education*”）

书籍介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自治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是当代国际体系的核心，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二战后激增的国内冲突，包括许多分裂战争，对威斯特伐利亚

主权原则和许多国家的存续产生了威胁。然而，在面对分裂主义运动时，国家的反应往往并不一致，对某些分裂分子态度温和并予以妥协，对另一些则使用铁腕无情镇压。Ahsan I. Butt 写作《分裂与安全：解释国家对分裂主义者的策略》一书的核心，就是要为国家对暗中威胁其主权的分裂主义者的反应的多样性寻找原因。

Butt 在论证的第一部分，即全书的第一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处理，探讨了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和分裂主义运动之间的概念联系。Butt 认为，能够足以决定一场分裂运动是否会被东道国镇压的第一个变量，就是该国是否认为同意独立会导致未来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战争。这有可能是出于领土和/或身份的原因与新独立的国家发生的冲突，也可以是与其他现有国家发生的冲突。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出现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很小或没有，那么它就会愿意与分裂主义者进行妥协和谈判。然而，如果国家认为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那么它就会寻求清算独立运动。如果国家认为有必要对独立运动采取行动，那么第二个变量，即第三方势力对分裂主义者的支持程度（不论是实际的还是感知的），将会决定镇压的暴力程度。

接着，他对关于分裂主义和内战的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认为它们缺乏不同时空语境下的解释力，普遍没有认识到地缘政治在塑造东道国对分裂主义运动的行为中的作用。他的论点不自觉地呼应了 Dos Santos 在《亚洲南部的军事入侵与分裂》（*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secession in South Asia*）一书中的观点，都十分关注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是如何引发分裂主义冲突的。然而，Butt 与 Dos Santos 的方向略有不同，他认为国家对分裂主义运动的镇压程度取决于其获得的外部支持程度，而不是国际体系。

在本书余下的部分，作者提供了大量详细的案例研究，以证实他关于国家如何应对分裂运动的理论。在第二章中，Butt 探讨了为什么巴基斯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孟加拉人和俾路支人的分裂主义分子采取了不同的国家战略。第一次在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因为长期的印巴冲突和印度对孟加拉运动的广泛政治和军事支持，在巴基斯坦政府看来，印度已经是他们的主要地区对手，因而对与之有联系（无论真实与否）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近乎种族灭绝的严厉镇压。相比之下，俾路支分裂主义分子与印度在地理上并不相近，因此不可能得到第三方的重大支持——尽管阿富汗这个弱得多的国家确实为一些人提供了庇护。因此，在没有更大的外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巴基斯坦认为两年后在俾路支省发生的类似的分裂运动主要是国内问题，对俾路支人的反抗所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像在巴基斯坦东部那样具有侵略性或暴力性。

在第三章中，Butt 对印度政府对 1984 年至 1994 年期间活跃在旁遮普、克什米尔和阿萨姆三地分裂运动的战略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唯一一个涵盖了所有他所确定的三种镇压方案的案例研究。印度在处理阿萨姆的分裂主义运动时相对克制，是因为它几乎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领土完整也没有因此受到实质性威胁。相比之下，对于克什米尔的叛乱，印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在 Butt 看来，这是因为当地暴力程度较高，而且巴基斯坦广泛参与了分裂运动。印度政府进而认为，第三方势力对克什米尔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不仅是针对印度的代理人战争，而且是对其民族身份和国家地位的意识形态与领土双重挑战。旁遮普的叛乱则介于二者之间，起初印度政府态度包容，与分裂分子，什罗马尼-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的政治代表签署了协议，而随着巴基斯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锡克教（Sikh）分裂运动中来，印度很快就放弃了温和的手段，改为侵略性胁迫（aggressive coercion）。

在第四章，Butt 解释了奥斯曼帝国在 20 世纪初对其亚美尼亚人口的从改革到种族灭绝的政策变化。他将这一政策转向归因于不断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这些变化使“所谓的亚美尼亚问题”复杂化。起初，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和平的政策，以打造出更加现代化的奥斯曼国家与身份，并且有能力处理好亚美尼亚人的需求。但 1915 年左右，情况开始恶化。再加上奥斯曼政权的内部问题，亚美尼亚基督徒对帝国新的也更狭隘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产生的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长久以来的威胁本就对奥斯曼国家的存续构成了挑战，而亚美尼亚人向俄罗斯

军队提供支持以换取回报的交易更加剧了这种外部威胁，迫使奥斯曼当局对亚美尼亚人采取了广泛的胁迫措施。

最后，在第五章中，作者探讨了亚洲以外的四个分裂运动案例，借以检验其理论的普遍性，其中两个是和平且成功的，另两个是暴力且失败的。在两个和平案例的研究中，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离婚（Velvet Divorce）”和1905年挪威与瑞典的分裂，东道国之所以能反应平淡，主要是因为缺乏外部安全隐患，且邻国相对和平，这有助于斯洛伐克和挪威的分裂主义分子分别与捷克和瑞典领导人进行和平谈判，为分裂铺平了道路。而在另外两个案例，即整个二十世纪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和十九世纪的美国内战中，东道国对分裂运动的暴力镇压至少部分归因于各自的东道国希望化解实际或潜在的第三方干预。就美国内战而言，英国对南方民族主义者提供援助这一可能，对美国的领土地位（territorial status）构成了实质性的外部威胁，这迫使联邦领导人对南方采取强硬态度，进而导致军事升级。

作者花了8年的时间广泛咨询、交流和采访了从学者到国家官员在内的诸多专家，广泛的实地调查让作者能够选取不带偏见的有效信息，收集了广泛的证据。得益于此，他的论证也工整、令人信服，且有权威性。另外，Butt的理论还受限于特定的时空，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产生效力。因此，这本书是作者采用对读者友好的语言风格所做的，非常有启发性和揭示性的分析，让人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Butt这项开创性研究对国家为什么对分裂主义分子采取不同的策略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解释。《分裂与安全》一书以其学术严谨性、深入的分析、易读性和客观性，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研究做出了贡献，成为任何处理亚洲和其他地区分裂主义叛乱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之作。

本文编译整理自：

Hussain, M. (2020). *Ahsan I. Butt. 2017. Secession and Security: Explaining State Strategy Against Insurgents*.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126-129.

Mohan, S. (2018). *Secession and security: explaining state strategy against separatists* (Vol. 94, No. 5, pp. 1179-118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延伸阅读：

Hechter, M. (1992). The dynamics of secession. *Acta Sociologica*, 35 (4), 267-283. 分离主义的动态

Butt, A. I. (2017). *Why do states fight some secessionists but not others? The role of external security*.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4), 324-345. 为什么国家与一些分离主义分子战斗而不是另一些？外部安全的作用

Roessler, P. (2016). *Ethnic politic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logic of the coup-civil war tra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非洲的民族政治和国家权力：政变-内战陷阱的逻辑（3月17日推送）

Dos Santos, A. N. (2007).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secession in South Asia: the cases of Bangladesh, Sri Lanka, Kashmir, and Punjab*.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亚洲南部的军事入侵与分裂：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案例

Varshney, A. (1991). India, Pakistan, and Kashmir: antinomies of nationalism. *Asian Survey*, 31(11), 997-1019. 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民族主义的反常现象

（编译：贾一鸣，责编：吕想，排版：胡琼）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87期均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网页下载：

<http://www.shehui.pku.edu.cn/second/index.aspx?nodeid=1820>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